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


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Journalism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從組織雇員到獨立記者：

三位新聞工作者的專業意理形塑與實踐

Roads to Self-employment—The professional ideology
and practices of three independent journalists



郭佩君

Kuo Pei-Chun

指導教授：林麗雲 博士

陳順孝 副教授

Advisor: Lin Lih-Yun, Ph.D.

Chen Shun-Xiao, Associate Professor

中華民國 99 年 5 月

May, 2010

謝辭

這本論文的起點，開始於去年七月我從台東回來後。那時一個人去台東放空，租了機車沿著台 11 線一路往北騎，而路的另一邊，是廣袤無際的太平洋。當時，就算迷路也好，橫衝直撞也罷，我還是獨自完成一趟難忘的旅程。

寫作論文的過程和那趟旅行有些相似。不去想著什麼時候會寫完，十個月的時間好像沒有自己想像得長。當然多半時候是痛苦的，邊哭邊寫的時刻居多。也因為太孤獨，這段期間的唯一慰藉，是每天仔細觀察學校的花花草草，第一次認真記錄流蘇的花開花謝。

今年三月中旬，當我為論文做最後衝刺時，活大旁的流蘇開了。直至四月初我完成論文初稿，春雨隨著清明假期的開始，一連下了好幾天。當雨勢停歇，天氣放晴，樹上的片片雪白卻也悄然消逝無蹤；不過，我已能辨認出哪些樹是流蘇。正如同寫完論文後，我也已經不同於去年在台東的自己，知道該如何從低潮中走出，才看到春雨之後的那道燦爛陽光。

這一路走來，支撐我不斷往前奔跑的重要力量，是家人和好友的陪伴：親愛的爸爸媽媽，感謝你們毫無保留的愛，總是百般包容我的任性，而且永遠都對我這麼有信心（不論我是多麼貶低我自己）。謝謝外婆，很高興能在您 81 歲時，親口對您說，「我畢業了！」同時，我也想和哥哥說聲對不起，謝謝你辛苦地容忍我陰晴不定的個性。北上念書至今，除了受到哥哥的照顧，也謝謝照嫻——始終安靜、可靠地——陪我走過那段自我放棄又消沉的時期。

三年研究生涯，我曾經短暫離開，滿懷不安重回學校。最後能順利完成學業

的關鍵，倚賴著許多人的幫忙：麗雲老師和阿孝老師的指導、昌德老師在口試時的建議，還有冠和慧倫、以及 R96 其他同學的關心，謝謝你們。另外，我也要感謝瑀希、俐穎、黃嬪敏和廖千智。儘管我們不常見面，你們不但沒有忘記我，還不斷為我加油打氣。也謝謝 Here Café 和親切的老闆娘姐姐，提供一個讓我飛快完成逐字稿的安靜空間。

最後，謝謝我的三位受訪者——江大哥、小豬姐姐和小美。你們對我的影響不只是這本論文的完成，還包括如何看待記者工作、對於生命的種種態度和思考。遺憾的是，由於我的文字能力有限，以及配合論文寫作的要求，很抱歉我無法在研究中完整呈現這些感動。但是，我想以一段話送給你們，也作為本篇論文的序言：

「沒有人點亮一盞燈，是為了將它藏在門後；光的意義在於創造更多光，在於打開人的視野，揭露周遭的奇妙景象。」（這是 Paulo Coelho 在《波特貝羅女巫》裡寫的一段文字）

書寫的過程雖然已經結束，但我還想告訴自己：無論未來會遇到多少阻礙和挑戰，請一定不要忘記，我曾經可以這麼的勇敢堅強。

郭珮君

2010 年 5 月 5 日下午 寫於台大總圖

摘要

除了在主流媒體工作，新聞工作者的記者生涯是否還有其他選擇？本研究在這樣的提問下展開，探討從主流媒體出走的記者，如何以自由新聞工作者的身分，繼續實踐其新聞理念。並且，他們又是用何種方式支撐採訪所需，在理想和現實中取得平衡。

是故，本文提出兩大研究問題，第一、這些選擇離開媒體、從事獨立報導的新聞工作者，他們抱持的專業意理如何形成與轉變。第二、離開媒體後，他們的維生方式與勞動樣貌為何？

結果發現，三位自由新聞工作者受到過去採訪經歷與個人理念的影響，皆抱持參與者意理。離開媒體後，他們為公民媒體寫稿、透過部落格發表新聞，繼續實踐其新聞理念。另一方面，本文也發現三位受訪記者分別透過搬家、接案，和寫書來賺錢維生，並且以組合式工作的形式維持其自僱生涯；但尋找工作機會時仰賴技藝、聲譽資本，同時收入狀況也不夠穩定。

最後，由於本研究採用生命史研究途徑與敘事研究方法，透過受訪者的自我敘說，能夠進一步理解專業意理分類背後，記者個人的理念選擇與自身職涯發展的關係，從而探究出參與者意理的實踐現況。本研究也欲藉此開闢傳播者研究的新途徑，研究結果提出集體組織與部落格營利的未來建議，亦作為自由新聞工作者維生規畫的參考。

關鍵字：專業意理、自由新聞工作者、生命史、敘事研究

Abstract

Do journalists have other choices than working in mainstream media?

The main focus of this thesis is to examine how reporters, after leaving mainstream media, continue to practice their profession in the new role of freelance journalist.

This study attempts to address the following research questions. First, what are the professional ideologies of freelance journalists? Second, how do freelance journalists make a living after leaving mainstream media and become self-employed? What is their labor process as an independent journalist?

According to the study, all three freelance journalists, influenced by their career experiences and journalistic ideals, are all participant advocates. By publishing news in civic media and on personal blogs, they continue to realize their journalistic ideals. In the process of pursuing their goals, they rely on their professional reputations to obtain job opportunities, earning small, unsteady income from writing books and publishing news articles.

The thesis explored the professional ideologies and practices of journalists using the life history and narrative research approaches. The thesis seeks to make contribution to the communication studies by offering a nuance picture of independent media workers and the future of media.

Keywords: Professional Ideology, Freelance Journalist, Life History, Narrative Research

目錄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i
誌謝.....	ii
中文摘要.....	iv
英文摘要.....	v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問題意識.....	1
第二節 研究問題.....	8
第三節 研究重要性.....	10
第二章 文獻探討	12
第一節 記者專業意理.....	12
第二節 自由新聞工作者.....	20
第三節 小結.....	32
第三章 研究方法	34
第一節 生命史研究途徑.....	34
第二節 敘事研究.....	38
第三節 研究範圍界定與選取.....	42
第四章 研究詮釋—記者的職涯圖像	47
第一節 江一豪的職涯圖像.....	47
第二節 朱淑娟的職涯圖像.....	81
第三節 周富美的職涯圖像.....	115
第四節 綜合分析.....	148
第五章 結論	164
第一節 研究發現與討論.....	164
第二節 研究貢獻與限制.....	178
參考文獻	184
附錄一：訪談題綱	192
附錄二：訪談時間地點	200
附錄三：受訪者大事紀	201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問題意識

2008 年卓越新聞獎公布平面媒體類的入圍名單，在新聞採訪報導獎的項目裡共有 5 篇入圍作品。相較於其他 4 位入圍者是來自於大家耳熟能詳的媒體機構，有位記者顯得非常特別。因為，他是公民媒體——《苦勞網》的特約記者。他的報導擊敗眾多主流媒體，在 129 件參賽作品裡脫穎而出，擠身至僅僅 5 名的入圍名單中。這位記者的名字叫江一豪。

江一豪的特別之處在於，他是記者，也是搬家工人。他不是主流媒體的記者，而是擔任《苦勞網》無給職的特約記者。江一豪的入圍作品是報導人與土地的故事，總共有三個系列。報導對象分別針對東菱電子關廠員工、三鶯部落居民，以及被遺忘在緬甸的中華民國「國民」。這三者看似毫無相關之處，卻都遭遇了相同的處境——被迫離開自己居住的家園。這樣的題材在主流媒體報導的出現機率不高，也意味著江一豪的新聞理念與主流媒體的不同。

事實上，在從事搬家工作之前，江一豪曾經當了三年多的記者，《蘋果日報》是他待的最後一家商業媒體，但因為與報社思維格格不入，只待了短短兩個月就離開。如今，江一豪仍然還是記者，關心社運、勞工的他，辭職後擁有更多的報導自由，甚至實際參與社會運動。身為三鶯部落自救會顧問的江一豪，更將自己親身參與的三鶯部落抗爭過程，以第一人稱的方式，用文字記錄下那些他所看到的人事物，這也正是他入圍作品的報導起源。

江一豪的報導題材和敘事手法，與主流媒體客觀中立的新聞處理原則，以及第三人稱的寫作規範不盡相同。而他身為公民記者與搬家工人的雙重身分，也彰顯出記者角色的另一種可能。因為，儘管他走下商業媒體的舞台，不等於是他記者生涯的落幕；在個人部落格、在公民媒體《苦勞網》裡，江一豪的記者角色並

未中斷。確切來說，他只是轉換了一個方式，在網路平台裡繼續報導新聞，繼續實現新聞理想。

如同江一豪的故事，抱有理想的記者在商業媒體不斷遭遇挫折，這些挫折不盡然是工作上的不如意，更多是在面對新聞倫理與主管要求的兩難時，經歷妥協或抵抗的煎熬。

例如針對被詬病已久，卻愈來愈明目張膽的置入性行銷，曾任職於《聯合報》，目前擔任《台灣環境資訊中心》特約記者的朱淑娟（2009）撰文痛陳：「我相信只要是記者，都想望一個純淨的編採環境，好好採訪、好好給人民真相。然而當事與願違，又往往無法大聲說不。那不單單只是必須領這份薪水，等著給兒子繳學費這麼簡單而已，因為你總想，或許妥協一點點，可以換取更大的空間，只要你還站在舞台上，總還是有機會可以好好採訪、給人民真相……。」¹

然而，如果不甘妥協，而是選擇直接抵抗組織目標或職務分派，卻也因此常常成為新聞戰場上犧牲的一方。一如前《自由時報》記者周富美，因為不滿環保署閉門舉行環評會議的決策，為了捍衛新聞自由與資訊公開的理念，因而與環保署官員發生衝突。最後，她不僅被環保署行文禁止再入內採訪，她的理念亦得不到報社相挺，反而被轉調內勤。這樣的職務轉換，形同被暫時中止記者職務。無法接受組織職務分派的周富美，最後選擇辭職。

上述這種妥協或抵抗的無力心態，是身為組織雇員的記者們所遭逢的普遍困境。換言之，靠媒體為生的新聞工作者，在組織目標、個人謀生壓力，與新聞專業理念中掙扎，有時不得不向組織靠攏，選擇妥協。但是，社會期待與自我認同也會在這靠攏過程中對許多人產生心理壓力。而對於那些深刻認同新聞專業的記者來說，除非選擇辭職，否則內化的專業標準與社會期待會用力拉扯他們，對此深感為五斗米折腰的無奈（張文強，2009：9-10）。

¹ 朱淑娟是針對 2009 年五一勞動節前夕，政府單位在某報紙買版面刊登救助失業有成的假象，抨擊媒體不再報導真相，被媒體監督的有權者反倒成為真相的詮釋者。朱淑娟這篇文章亦被《蘋果日報》追蹤報導，相關新聞請見 http://tw.nextmedia.com/applenews/article/IssueID/20090529/art_id/31666259。

雖然辭職並非記者面對此困境的唯一選擇，前《中時》記者林照真（2006：24）曾提及，「在惡劣的新聞處境裡，記者不應以『離開新聞界』做為改革媒體的第一步，應該在媒體內好好活著，絕不輕言離開。」然而，依附於媒體組織的商業角色，是否是記者新聞實踐場域的唯一選擇？假設這個答案是否定的，那麼，離開媒體後的新聞工作者，又如何繼續實踐新聞理念、延續其記者生涯？

對此，早在 1953 年，美國著名的調查記者 I.F. Stone 就已經親身實踐。他因為被麥卡錫主義波及被列入黑名單，被迫離開報社。是故，他便自行創辦《史東周刊》（*I.F. Weekly*），獨立報導。而《史東周刊》從 1953 年一直到 1971 年，刊物發行時間持續十八年之久，發行量甚至曾達到七萬本。經歷組織雇員到獨立記者的身份轉換，Stone 的例子也證明了記者離開主流媒體，並自行創辦報刊、獨立報導的可能性。

如今，像 Stone 一樣創辦媒體對外發聲，已能夠在網路世界裡實現。藉由簡便的部落格，個人媒體（如：《史東周刊》）的開創變得更容易，許多公民／獨立媒體也在其中蓬勃發展。因此，當媒體環境愈來愈讓記者們感到有志難伸，不少像江一豪一樣難以容身於主流媒體的新聞工作者，因此選擇離開（不論是被迫或主動辭職），或者透過部落格，或者擔任公民／獨立媒體特約記者，繼續發表新聞作品。

這些商業媒體出身的新聞工作者，經歷了從組織雇員到獨立記者的身份轉換，這樣的職業轉變讓人好奇：第一，他們究竟是一群什麼樣的記者，出走之後，他們報導的新聞與從前有何不同，本文因此欲了解這類型記者心中的新聞專業與記者角色。第二，這樣一個獨立撰稿的新身分，是否有可能讓記者從目前獲利凌駕於專業的媒體環境中破繭而出？換句話說，記者得以不再經歷妥協抵抗的掙扎，不需以組織雇員的身分寫稿報導；而能以獨立報導的工作形式開展記者新生涯。本研究故基於這兩點，對上述的記者類型深入探究之。

而本文所關切的研究對象，恰可挪用「自由新聞工作者（freelance journalist）」

的概念，來形容該類型記者的新身分。但在探討台灣自由新聞工作者之前，應先釐清自由工作者（freelance）的工作類型。

所謂自由工作者，依照《牛津英語辭典》的定義，是指自僱（self-employed）的工作者，且沒有長期、固定的服務客戶。是故，自由新聞工作者即為以自由工作的類型，從事新聞工作的記者。而本文欲探究的記者，就背景而言，是像江一豪這樣，曾經服務於主流媒體、辭職後獨立撰稿，繼續從事新聞工作。但自由新聞工作者報導新聞的工作模式各有不同，如江一豪是擔任公民媒體《苦勞網》的無給職特約記者，在個人部落格同步發表新聞。此外，也有記者辭職後選擇繼續擔任主流媒體的特約記者，並藉此賺取收入。

兩種不同的個人新聞工作模式，與其各自選擇的維生方式有關。無償提供新聞給《苦勞網》的江一豪，是以從事搬家工作維持採訪所需。而選擇與商業媒體保持彈性雇傭關係，並藉此作為收入來源的新聞工作者，又是另一種維生選擇。換言之，自由新聞工作者因此呈現不同的新聞工作模式。

要特別說明的是，雖然自由新聞工作者有許多種工作類型，但本文的研究旨趣是為了探究「商業角色是否為記者實踐場域內的唯一選擇」，以及瞭解那群「從主流媒體離開的記者，他們如何以獨立記者的身分展開新生涯」。因而在自由新聞工作模式的選取上，著重於記者在商業媒體之外的獨立報導身分，故排除了仍然擔任主流媒體特約記者的報導角色。

換句話說，本文無意（也無法）將研究結果推論至整體自由新聞工作者的概況。如此區分個人新聞工作模式的原因，是基於研究者對於記者「如何擺脫組織雇員的工作困境，以獨立記者身分，取得行動者主體位置」的探究。

這些記者的特別之處在於，他們或許是不願繼續在商業媒體裡，承受妥協與抵抗的煎熬，或是疲憊於持續採用「在主流媒體激進」²的方式，尋求突圍報導

² 「在主流媒體激進」一詞，出自於《當代》雜誌 102 期對一位社會主義者 Kent MacDougal 的介紹。關於他如何在《華爾街日報》、《洛杉磯時報》等資本主義報業工作超過 20 年，也描述其「在主流媒體／報業激進」的理念。

的機會。因此，他們最後選擇辭職（不論主動或被動）來換取完整的報導自由。但記者工作生涯並不在遞交辭呈的那一刻嘎然終止，他們作為獨立撰稿者的新身分也隨之展開。這群記者的職業新生涯呈現何種面貌，而一路走來，他們抱持的新聞專業意理是什麼，都因此讓人欲一窺究竟。

表 1：自由新聞工作的不同背景與工作模式

新聞工作模式 \ 媒體背景	有媒體工作經驗	無媒體工作經驗
	公民媒體特約記者	藉由部落格作為新聞發表平台
公民媒體特約記者	本文研究對象	
藉由部落格作為新聞發表平台		
主流媒體特約記者		

是故，如上表 1 所示，為了聚焦於「從主流媒體出走，以獨立記者的身分繼續報導新聞」的這群記者，研究者故將表 1 以「媒體工作背景」和「新聞工作模式」，來區分自由新聞工作者的不同背景與工作模式，總共有六種類型。但由於本文著重於其中兩種類型：他們擁有媒體工作經驗，並以擔任公民媒體特約記者，或是藉由部落格作為新聞發表平台，藉以延續其新聞工作生涯。換言之，本研究排除沒有媒體經驗的公民記者，以及擔任主流媒體特約記者的新聞工作者。而對於有無媒體工作經驗的區分，如上所述，是為了著重於本文研究對象從主流媒體離開的背景。

另一方面，本文將「公民媒體特約記者」與「藉由部落格作為新聞發表平台」

作為研究對象工作模式的選擇，是欲了解這群新聞工作者「獨立」且「自僱」的工作性質。尤其他們因無法在主流媒體實現理想而辭職，轉而以網路作為發表新聞的平台，例如刊載於個人部落格、或公民媒體中。與之區別的「主流媒體特約記者」，雖然亦屬無固定雇傭關係的自由新聞工作者，是自由工作的其中一種類型。然而，由於本文研究對象是以獨立／公民媒體為新聞理念的實踐場域，這與仍然和主流媒體維持工作聯繫關係的特約記者相較，在理念與實踐的本質上已不盡相同。

因此，本研究乃關切個人新聞事業，藉由網路（部落格或公民媒體）作為新聞發表平台的獨立工作模式，欲探討這群記者擺脫組織雇員的框限後，如何藉由獨立撰稿的新身分實踐其專業意理。並且，基於上述區別出的研究對象類型，本文選定的獨立記者雖然無法推論至全體自由新聞工作者；不過，他們仍代表自由新聞工作者的一部分面貌。因此，本文在書寫上仍以自由新聞工作者稱呼之，同時亦冠以獨立記者的名稱，以彰顯其獨立撰稿、不再是組織雇員的身分。

而所謂「獨立」，不只意味這些記者的工作身分不再附屬於主流媒體，另一個重要意義在於，他們自立門戶、自營維生。本研究故關切獨立記者「獨立」報導後的經營維生模式。尤其，當記者離開主流媒體，開始在網路個人／公民媒體裡開展新生涯，他們開創出的模式（不論成功或失敗）因此讓人關注。

同時，那些無法實現於商業媒體的新聞理想，又是如何在他們心中形塑而成，在其過去的記者生涯、和之後的獨立撰稿新身分中實踐，也同樣令人好奇。因為，若辭職的原因之一，是為了做更多在主流媒體無法做的事（如江一豪），那麼，記者出走後的理想實現過程，以及記者本身的價值信念，都因此值得被記錄。

然而，任何方式的獨立，都很浪漫；任何浪漫的方式，都要付出代價（Handy，2001）。換言之，雖然這些記者因為離開媒體而得到獨立報導的自由，但他們也同時失去了組織提供的庇護——固定的薪水、名片上付予的社會價值，甚至是安

穩的感覺。因此，儘管自由新聞工作者能實踐獨立報導的理想，卻仍遭遇如何維生的考驗。開展新生涯之後的他們，經歷勞動條件與工作環境的轉換，目前遭遇何種勞動處境，以及對此所採取的生存策略與維生方式，是本研究欲探討的焦點。

再者，這些自由新聞工作者開創的個人媒體形式，是發展於今日的網路時代。他們和 Stone 創辦的實體報刊相比，處於不同營運模式的二者，在維生方式與報導實踐上的選擇，因此不甚相同。今日自由新聞工作者的實踐面貌，故有待深入了解。

另一方面，在報導實踐上，本文欲探究的第二個焦點，是新一代自由新聞工作者的專業意理。由於本文研究的這些自由新聞工作者，都曾經是記者，曾經在主流媒體遭遇組織雇員的工作困境。尤其又經歷這樣的記者職涯轉換後，本研究因此欲了解他們對記者的角色期望、對專業意理的看法，是如何形塑與實踐。並且，因為專業意理的形塑與記者的個人信念、遭遇的生命經驗，以及實踐過程的經歷息息相關，所以，本研究將以自由新聞工作者的職業發展脈絡為基礎，從他們的職涯故事中，了解其專業意理形塑過程。如此一來，也才能細膩地研究出這些自由新聞工作者是一群什麼樣的記者，以及是如何變成這種記者的歷程。

由於過去對自由工作這項新型態的工作類型了解有限，獨立記者亦不同於一般新聞工作者的角色類型與勞動條件，因此，對於他們辭職之後的維生方式，他們堅持的新聞專業意理，以及探究他們究竟是哪一種類型的記者，有其研究價值。因為這些人最特別的是，不論辭職之後會遇到多少困難，他們還是一腳踏進了自由新聞工作者這個陌生的領域，這樣的勇氣一如 Bob Dylan (2006: 303)³所言：

「前方的道路將會崎嶇艱難，我不知道它通往何方，但我還是踏上
這條路。眼前即將出現一個奇怪的世界，亂雲罩頂，閃電頻傳。

³ 巴布·狄倫(Bob Dylan)是二十世紀美國相當具有影響力的民謠歌手，也被視為是 60 年代美國民權運動的代言人。

那個世界，許多人不理解，也從來沒能弄懂。我卻直直走了進去。

那是個寬廣的世界。」

Bob Dylan 在自傳《搖滾記》裡，回顧自己的音樂路和人生的重大轉折，在書的結尾時，他以這段話自述過去對音樂、對人生的每個選擇。同樣地，自由新聞工作者選擇的路，也一樣充滿未知、困難重重。然而，本研究無意美化自由新聞工作者的形象，或是將他們的生活態度視為一種模範；主要的研究宗旨是爲了深入了解這群人的職涯故事、專業意理、勞動樣貌，提供記者和有志於新聞傳播的後輩，一條不同選擇的道路。

第二節 研究問題

本文研究的自由新聞工作者，他們從主流媒體裡辭職，轉換跑道至網路平台，繼續從事記者工作，開展不同形式的記者生涯。經歷角色（主流媒體記者 vs. 獨立撰稿者）與勞動條件（固定薪水 vs. 獨立維生）的轉換後，他們如何實踐心中的專業意理，如何經營個人媒體，開展自僱生活的維生模式，是本文欲深入探討的主要面向。

在專業意理上，本文著重於自由新聞工作者的專業意理形塑過程。但過去針對記者專業意理的相關研究，大都從記者專業意理的分類（中立的守門人意理、參與性的鼓吹者意理）基礎上展開：例如田志剛（2001）觀察記者與消息來源互動的情況，張舒斐（1997）使用問卷調查法，研究電視新聞記者的專業價值觀，鄭宏斌（2007）則是探究台灣報社地方記者組織溝通滿意、專業性、工作滿意的關聯性。然而，多數研究都是使用量化方法，無法進一步得知記者專業意理的形成過程，亦忽略了記者的生命經驗如何與工作場域互動（管嫻媛，2008）。

並且，正因為本文研究對象經歷工作場域的轉換，不同的工作條件與採訪經驗，影響了他們如何形塑專業意理。是故，探討自由新聞工作者的新聞理想、過

去在媒體場域裡遭遇的阻礙，以及目前如何將理想付諸實踐於報導中，才能細膩地勾勒出自由新聞工作者的專業意理圖像。

而在自由新聞工作者的生存策略上，由於他們是以個體戶的角色獨立謀生，維生條件不如在媒體工作時安穩，因此有必要探討自由工作者遭遇的勞動處境與採取的因應策略。從謀生上來說，Handy (2003) 認為，這種自僱 (self-employed)、沒有一定合作對象或業主的工作者，缺少了固定收入後，應從事不同類型的工作，擁有多個收入來源，就像投資組合一樣，過一種「組合式生活」(portfolio working)。但是，Handy 研究的自由工作者案例，是立基於英美的社會脈絡下；台灣的自由新聞工作者，處於不同環境的社會條件，他們採取的謀生方式，與面對的不同勞動問題，有必要再深入了解。同時，Handy 意指的自由工作，含意較為廣泛，本文基於研究對象特性，故聚焦於自由工作者中的文化勞動類型，做進一步地探究

在營運模式上，不管是經由個人部落格或是發布於公民媒體，本文的研究對象皆透過網路平台發表新聞。因此，除了像 Handy 建議的接案謀生之外，自由新聞工作者能否直接從網路平台的經營中獲利，或是在不影響自由寫作的前提下，使自己獨立報導的新聞產生營利的價值……都是自由新聞工作者必須持續摸索的營運模式。

另一方面，比較自由新聞工作者的維生方式後，本研究也試圖歸納他們共同面對的勞動難題，並從其不同的生存策略選擇，了解自由新聞工作者擁有的不同特質與資本，如何影響其維生條件，從而深入探究他們目前的勞動樣貌。

綜合以上所述，本文提出兩個主要研究問題：**第一，從組織雇員到獨立記者，自由新聞工作者的專業意理如何形成與演變？第二，實踐新聞專業意理的過程中，自由新聞工作者離開媒體後的維生方式與勞動樣貌為何？**

本研究採生命史 (life history) 研究途徑，著重於受訪者職業生涯歷程的轉換過程裡，在時空脈絡、個人生命經驗等因素的影響下，如何形塑其專業意理，

以及在勞動型態改變後的生存之道。並且，記錄並研究自由新聞工作者的職涯歷程，才能讓記者的辭職不只是一個句點，而繼續探究他們如何展開新生活，也才能知悉他們追尋理想的過程裡遇到的阻礙和因應之道。因為，不論最後實踐理想的結果成敗，他們的故事都有被記錄的意義，讓自由新聞工作者的生命圖像得以呈現出來。

第三節 研究重要性

Stone 經營《史東周刊》的例子證明了個人媒體發聲的影響性，新興的 Web2.0 科技也讓創辦媒體變得更簡單。因此，在主流媒體鬱鬱不得志的記者辭職後，他們可以在網路上發表商業媒體忽略的議題，補充報章雜誌忽略的多元觀點。在身分上，他們比一般公民記者更專業；然而，仍以報導新聞為職志，卻不再擁有每月穩定薪水的自由新聞工作者，與服務於媒體的記者相比，在維持生計上顯得更加辛苦。是故，當這些自由新聞工作者尚在找尋謀生與營運方法時，他們實踐新聞理想的過程與開創出的新聞經營模式也因此讓人關注。而本文也因此對於獨立記者維生模式的探討上，具有重要意義。

另一方面，就新聞事業的發展而言，自由新聞工作者存在的意義之一在於，當「一人媒體」不再是空想時，對於大眾／主流／商業媒體失望的記者，他們可以在網路上繼續實踐新聞專業理想，不需再經歷妥協或抵抗的兩難。並且，當目前新聞事業（尤其是報紙）不斷面臨讀者流失之際，一股對於商業媒體的反動也開始產生。例如有些記者辭掉原本在主流媒體的工作，投入非營利新聞經營模式（non-profit model）的創立（*Poynter Online*, 2009. 09. 29）。和本文研究對象相同的是，他們都以網路作為刊載平台，超越黨派和報社立場的包袱，享有更多報導自由。雖然不同於本文研究的自由新聞工作者之個人經營模式，但兩者的存在都為新聞事業的發展，開啓更多可能的想像。因此，在研究對象的選擇上，本文對於個體戶式獨立記者的選取，亦有其指標意義。

另外，本文採用的方法途徑也與過去研究不同。以往對於新聞工作者的探討，有些是專注於記者的職業角色，有些則是從組織社會化的角度，研究組織溝通、承諾與記者工作滿足的相關，或是研究記者在組織中面臨的困境，如何調適、克服。然而，這些研究大都使用量化方法，無法凸顯個別記者的角色在媒體組織裡的掙扎與抗拒。因為，人的理念與實踐並非單獨存在社會裡，是在個人生命經歷當中，不斷與社會各種政經文化結構互動下形成（蔡士敏，2008：9）。

是故，本文使用生命史研究途徑和敘事研究方法，透過自由新聞工作者職涯歷程的敘事，更具像地呈現出他們面對環境、媒體場域的改變，在專業心態變遷與因應策略上所展現的能動性與主體性。因此，本研究可補足台灣新聞史對這類記者研究的缺乏，而他們在網路上開創的新模式，也能對一些有志於當記者，卻因為當前的媒體環境而卻步的人來說，產生或多或少的啟發和影響。



第二章 文獻探討

基於第一章提出的兩個研究問題，本文探討自由新聞工作者的專業意理形塑過程與實踐，以及他們在自由工作領域裡的維生模式與勞動樣貌，因此在第二章文獻探討裡，分為兩部分來討論。第一節是針對記者專業意理，探究其概念和分類，並回顧過往相關研究。第二節則聚焦於自由新聞工作者，探討自由工作的淵源、勞動概況，以及工作者於其中遭遇的不同勞動困境。

第一節 記者專業意理

壹、新聞專業意理：概念與分類

所謂新聞專業意理，是指作為「專業人員」(professionals)的記者，經過長時期培養出來的價值系統，內化成為其日常新聞製作的一種指引。專業意理並且具有相當大的自主性，有它自己的規律，雖然偶爾和組織的功能互相牴觸，但大抵上兩者相輔相成的(李金銓，2005：35)。專業意理的內涵則包括了記者對於媒介功能及記者角色的「信念系統」(belief systems)，以探討「記者的專業價值」(the professional values of newsmen)和「記者責任」(journalistic responsibility)為主(蕭蘋，1989：6)。

過往對於新聞專業意理的研究，早在1963年，Cohen(1963)即針對各國駐華盛頓外交記者進行研究，發現了記者對自我角色有兩種不同的看法，分別是中立報導者(neutral reporter)和參與者(participant)。許多研究者因此陸續探討記者的新聞專業意理，也同樣發現新聞記者的確存在不同的角色觀，例如Johnstone et al.(1976)提出的「中立者」與「參與者」之分類。

大致來說，導致這兩種不同記者角色觀的產生，與大眾傳播媒介的特性有關。由於大眾傳播介於其他社會制度和公眾之間的位置，所以大眾媒介所扮演的

職業角色就產生了許多矛盾、衝突。其中最常見的角色衝突就是「中立、報導」及「主動、參與」兩種不同的新聞專業意理（蕭蘋，1989：16）。

但是，中立／參與的二分法顯然不夠嚴謹，因而 Weaver&Wilhoit（1986）又將記者角色細分為「資訊傳佈者」（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role）、「解釋者」（interpretative role）、「對立者」（adversary role）。將專業意理從二分法增加至三種分類的關鍵，是因為他們將 Johnstone 等人分類的「參與者」，再區分為兩種，即「解釋者」與「對立者」。而這三種不同的記者角色觀，有其各自的歷史脈絡，分述如下：

一、資訊傳佈者

這類型的記者強調客觀，認為記者的目的是要傳達事實給閱聽人，故新聞報導必須呈現純粹的事實，排除個人對事件的價值判斷。換言之，記者須區分事實與意見，使新聞報導僅限於客觀的事實。常見的做法例如：倒金字塔的新聞寫作方式、第三人稱語氣報導、兩面並陳，以及引述當事人的話。這類角色觀的記者對於客觀的重視，亦基於其對自由報業哲學的認同，認為民主社會應由民眾自己做決定。因此，這類型的記者重視上述的傳統新聞寫作方式，並逐漸形成共有的新聞價值感（楊志弘，1991）。

然而，新聞記者所謂的事實，大多數是社會上強而有力的機構聲明，包括文件、紀錄、正式活動、官員的說明等等，不須進一步查證。即使新聞記者親眼目擊的事件，也因為基於客觀性的新聞處理模式，因而經常借助社會機構的權威，予以證實或評論，致使社會機構所發布的聲明與意見，淪為新聞報導的客觀事實（黃新生，1990：31-32）。因此，對於這種自主性低、依賴消息來源的情形，Cohen（1963）曾提出警告，他認為報紙如果愈中立，它就會限制自己只能記錄事實，而無法提供解釋的資料，報紙也就愈容易成為「政府的工具」（instrument of government）。

二、解釋者

相較於資訊傳佈者以傳達事實為目的，解釋者的基本理念則認為，由於許多新聞事件的性質複雜，如果只是依照倒金字塔、5W1H 的形式報導，閱聽眾無法清楚了解事件的重要性。因此，記者還應負起分析事件的責任，或陳述個人意見。不過，雖然解釋者的記者角色會陳述個人意見，但並不表示是將自己的意見強加給讀者，這也正是解釋者與對立者之間最大的不同之處(Weaver&Wilhoit, 1986)。

解釋者的記者角色認為，媒介的主要任務就是守望環境及連繫環境的各個部門。因此，記者的角色就不僅是「呈現真實」而已，他還要揭發全部的真實，盡力尋求相關的新聞，強調「調查性」、「分析性」的報導，故關連性(relevance)才是記者追求的主要新聞價值。為了瞭解新聞背後隱藏的意義，使用社會科學、其他不同學科的方法，或是精確性報導的概念，都是屬於解釋者角色的特色(蕭蘋，1988:19)。

三、對立者

對立者和解釋者的不同之處在於，它除了和解釋者一樣分析、揭露事實之外，還會主動參與政策決定的過程。

對立者角色的參與方式有兩種，一種是「政策的鼓吹者」(advocate of policy)，用報導來表達對某一政策的支持或反對，以達到影響政府或公共部門的效果。另一種是「政府的批評者」或「對立者」(critic or adversary of government)，這樣的角色意味著他們是站在政府的對立面，自詡代表公眾，監督政府的決策、呈現政府未完成的事務給人民知道。對他們而言，記者不應只是旁觀者，還應該是人民的保護者，新聞報導也不只是一種工作，還是一種使命感。這類記者想利用新聞工作來改變世界，相當類似於中國傳統「士」那種「天下興亡為己任」的價值觀(楊志弘，1991：50-51)。

然而這類型的記者數量不多，Weaver 認為原因在於，記者若長期對政權持對立態度從事報導，可能使政府將其列為拒絕往來戶，之後既不肯對該類記者透

露與施政有關的任何資訊，也不願意與記者溝通。最後，失去消息來源的下場，將會導致記者在報導上陷入「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窘境。因此他並不看好這類型專業意理的實踐，認為其無以為繼，只能算是記者對自身與政界關係的一種英雄式的浪漫空想（轉引自游明儀，2003：29-30）。

Weaver 指出對立者記者角色數量不多的原因，其實也反映出中立的、資訊傳佈者的角色是記者最為偏好的專業角色，而客觀性也被多數記者視為是最重要、核心的專業價值（Johnstone et al., 1976）。

追究客觀性的起源，可往前追溯至 1984 年美聯社成立。美聯社為了使當時不同政治立場的各報訂閱其電訊稿，遂逐漸以價值中立、超黨派的方式報導新聞。此舉引發其他媒體的效法，也慢慢形成客觀性的概念——要求新聞必須達到中立、客觀和平衡。客觀性的概念故成為新聞工作者判斷、選擇新聞，以及寫作時的指導原則。然而，所謂新聞客觀性的理想背後，最終還是為了本身的商業利益，以獲取最大群讀者的購買為最大考量（黃新生，1990；李祖舜，2003）。

但是，不管是倒金字塔的寫作方式、兩面並陳、意見與事實分開等新聞常規，都沒有人能明確指出究竟有多少要素是實踐客觀性所不可或缺者，也沒有人能保證即使做到上述的每一點，必能達到客觀性的目標。但由於這些做法逐漸成為新聞製作的例行程序，是新聞記者蒐集、報導新聞的準則（黃新生，1990）。而呈現出來的新聞究竟有無符合客觀性的要求，目前台灣各報黨派壁壘分明的立場傾向，客觀性理論與實務呈現的差距，可見一斑。

達到客觀性標準的困難，其實也意味專業意理在理想與實踐之間，存在某些落差。要實踐專業意理，必須先審視記者工作的客觀環境是否支持之。而記者將此意理應用至報導工作的實際情況，也考驗著專業意理的可行性高低（游明儀，2003）。對於在網路上發表新聞的自由新聞工作者而言，由於他們的報導多為主流媒體忽略或扭曲的議題，報導的手法與商業媒體或有些許差異。尤其對於從未被客觀公正對待的弱勢團體而言，記者謹守中立客觀的新聞意理，也許只是再複

製社會上既有的權力結構，使發聲權薄弱的一方更難將訴求透過主流媒體傳遞出來。

並且，客觀中立不僅是無法恪守或遵從的絕對標準，在實際採訪情境中，記者個人也常受到個人關懷、與採訪對象的特殊關係或責任的影響，而無法保持絕對的客觀無私。管嫫媛（2008：27）因此以「關懷倫理」的概念，探究記者的專業意理如何受到實際的採訪經驗、情境，以及對於受訪者產生關懷情感的影響。相較於對其客觀中立的探究，此舉反而更能理解記者的新聞專業實踐與專業意理的形構。

以上先介紹三種記者角色分類，再對客觀中立意理進行反思。得知記者專業意理有其不同的信念依循，而實際報導採訪與客觀的工作環境，也皆影響專業意理實踐的可行性，藉此回頭思考記者角色的扮演。同時，更進一步思考採訪過程中遭逢的人事物與記者個人情感關懷，對其新聞專業意理內涵的影響。

是故，本文對於自由新聞工作者的研究，不僅探討他們對記者角色的看法，亦對於他們經歷組織／個人二者不同工作條件的身份轉換，以及其所經歷的採訪經驗，如何影響、形塑，並實踐其專業意理信念。

貳、記者專業意理相關研究

過去有關記者專業意理的研究，大多採西方脈絡下的專業意理分類。研究對象除了一般記者之外，大部分是針對隸屬於平面媒體的外交記者、政治記者；相較之下，對於電視記者、公民記者，或是本文研究的自由新聞工作者的專業意理研究則不多。而在專業意理的分布情形上，西方記者多數偏向解釋者，但 Weaver & Wilhoit（1986）強調記者的多元角色概念，認為只有極低的記者傾向絕對單一的角色。國內記者則偏向資訊傳佈者和解釋者。另外在研究方法上，過往多使用量化方法，採用專業量表測量記者屬於哪一類型，或將三種專業意理角色內涵概念化為問卷題目，再將結果作量化分析。

國內對於記者專業意理研究也多採量化方法，例如蕭蘋（1989）研究環保記者的專業意理取向及影響因素。她採問卷調查法，以台北、台中、高雄六縣市的環保記者為研究對象，利用統計方法進行資料分析。結果發現，台灣環保記者的專業角色傾向為「資訊傳播者」。

韓香芸（1992）則研究電視新聞從業人員的專業取向與其個人特質的關連性。她對台視、中視、華視三家電視台的記者與主管進行問卷調查。分析後發現，電視新聞人員教育程度、工作職務的不同與其專業性的高低有顯著的差異。並且，不同工作職務的電視新聞人員，他們對於專業意理角色的認知亦有差距——資訊傳佈者以文字記者最多(佔 37.4%)，解釋者以攝影記者為最多數(佔 37.5%)，對立者則以地方記者為主(佔 41.2%)。

除了將三種專業意理角色概念化為問卷調查的題目之外，亦有研究者使用專業量表調查之。例如施致平（1991）為了探討體育記者的專業意理與新聞製作流程對體育報導的影響，他參酌 McLeod & Hawley 編定的專業量表，製作調查問卷。研究發現，在專業意理面向上，體育記者之專業意理與其新聞專業教育、體育專業教育有顯著關聯。

張舒斐（1997）同樣採用專業量表，探究電視新聞記者專業價值觀、工作壓力與工作滿足的關連性。經由統計分析結果發現，在電視新聞記者個人專業價值觀方面，電視新聞記者最重視「專業責任」，「專業自主」次之，再者為「專業知識」，「專業承諾」則最不受重視。

大致來說，上述這些探討記者專業意理的量化研究，所得到的結果雖然豐碩，但是這樣的做法往往只能得到粗略的分類結果，雖得知記者是屬於專業意理中的哪一種類型，然而單憑這些分類結果，無法了解記者成為某一專業角色的形塑過程是受到哪些內外因素影響。換言之，即便資訊傳佈者的記者角色是主流，而對立者是非主流，卻無從得知不同專業意理的養成過程為何，以及記者選擇不同角色實踐理念的原因。

另外，國內也有使用質化研究方法的專業意理研究。如楊志弘（1991）混和深度訪談、文獻資料、調查問卷等質化量化雙重途徑，探討台灣報社總編輯的職業角色，並將其放到報社的科層組織來觀察，分別分析其「角色行爲」（role performance）和「角色期望」（role expectations）。同時也從職業社會學的角度，討論職業角色的「幅度」（scope）和「蔓延性」（pervasiveness）。研究結果發現，台灣報社總編輯的專業角色認知，較傾向「資訊傳遞者」角色，其次是「解釋者」角色，而「對立者」最少。

李祖舜（2003）則採深度訪談法，探討報紙政治記者對於所處的外在環境與媒介組織的認知，以了解政治記者對於專業角色的看法，探索內、外在環境對政治記者實務工作與新聞專業表現的影響，及其面對這些影響因素所採取的因應策略。結果發現，記者的新聞專業不敵政治正確，新聞價值觀變得多元分歧，部份堅持專業自主，拒絕來自組織內外的影響與壓力；部份則是主張階級權力掛帥、不問新聞專業、只問利害關係。而在政治記者與組織互動上，發現政治記者的工作滿意度普遍不高，也經常面臨工作困境，對此，他們的因應策略包括「自我心理建設調適」、「消極不作爲、以不變應萬變」、「堅持新聞專業、固守政治立場」與「調整職場生涯規畫」。

以上這些以質化方法進行的記者專業意理研究，雖然不是將記者依照專業角色概念化的分類，但研究範圍侷限於記者在媒體科層組織裡受到的影響、因應的策略，忽略了記者個人生命經驗的重要性。由於記者角色的內涵，深受其個人特質與所處社會脈絡的影響，並在媒體組織的互動中不斷變動，進而做出各種不同實踐。因此，除了用質化方法探詢記者在不同環境條件下做出的種種實踐，尚須進一步從記者個人的生命經驗中，挖掘這些實踐背後的更深層因素，以了解個人經驗與特質是如何影響與形塑一個記者的專業意識養成過程（管嫫媛，2008）。

是故，質化的記者專業意理研究逐漸將焦點轉向個人的生命經驗，例如蔡士敏（2008）以生命史方法，以參與「自立事件」的七位核心記者為研究對象，探

討這些人為何在普遍缺乏勞動意識和團結能量的記者圈，願意挺身而出主導「自立事件」，以了解他們是一群什麼樣的記者，以及他們的專業意理。並透過文獻分析和深度訪談法，建構出他們的職業生涯圖像。研究發現，這群《自立》記者受到「社會情勢」和「教育經歷」的影響，形塑不同的專業意理——傾向「鼓吹型」和「解釋型」記者。「自立事件」後，他們的自身性格、不同的專業意理、以及社會與媒體環境提供的機會與限制，也影響了他們的職業生涯抉擇。而透過這群《自立》記者生命故事，發現個人生命、組織和環境這三大因素非可截然劃分，三者在人的生命歷程中皆展現錯綜複雜的影響力量。

又如管嫻媛（2008）則以 1980 年代主跑社會運動線的五位《自立》記者為研究對象，同樣採取生命史研究途徑，並援引關懷倫理的概念。一如關懷倫理是在實踐過程中產生的倫理，她主張專業意理亦是在實踐中形成，且會隨著情境而改變。因此，她遂探討五位《自立》記者抱持何種專業意理，形塑的過程，以及如何在實踐中形成之。研究發現，雖然五位《自立》記者都經歷了類似的時代背景（1980 年代台灣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特殊氛圍），但個人的感受和經驗又有所不同，因而形塑其不同的專業意理內涵。且個人在每次關鍵採訪事件中，經由實踐專業意理而產生的關懷倫理，也影響他們在實踐專業意理的表現上有所差異。基本上，五位《自立》記者都屬於「鼓吹者」角色，但在介入的程度、深淺位置上則有不同。

蔡士敏和管嫻媛的研究，開闢另一種研究記者專業意理的形式。撇開專業量表和專業角色的三種分類，也不只關注於記者角色在媒體場域裡受到的影響，他們進一步從記者個人的生命經驗裡，抽絲剝繭找出記者不同專業意理實踐背後的深層因素，了解這些個人經驗和特質如何影響與形塑其專業意理的養成。如此一來，這些記者才能跳脫出中立／鼓吹的一分兩半，抑或是資訊傳佈／解釋／對立的三分法，真正能看清他們是一群什麼樣的記者，補足過去對記者主體能動性（subjective activity）研究的不足。

雖然社會學家 Max Weber 曾說，新聞工作者的宿命是——他們缺乏固定的社會分類，且彷彿屬於一個賤民階層，外人總是根據記者之中品行最差的來評價他們（錢永祥譯，1991: 195）。然而，藉由探討記者抱持的不同專業意理，以及專業意理在實踐中的變動過程，其實能夠具象化記者在其中的奮鬥歷程，讓大家看到他們的努力。因此，本研究對於自由新聞工作者專業意理的探討，亦基於對記者能動性的重視，故從職涯生命歷程的角度著手，探究這些記者們一路從主流媒體走向網路個人媒體的這段過程，他們在專業意理上的形塑、轉化與實踐。

第二節 自由新聞工作者

壹、淵源與概念

今日自由新聞工作者一人作業的淵源，可往上追溯至新聞事業發展的最初。早期的新聞事業是以個人或小型報業為起點，主要的辦報原因是為了傳達自己的理念。因此，媒體規模普遍精簡，資金來源大部分是靠個人資產或募款為主，故一人或兩三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即可辦報。辦報者甚至身兼數職，編、採、寫一手包辦，報紙內容大都以評論為主。雖然幾乎無利可圖，但卻能充分地完成其辦報理念（陳順孝，2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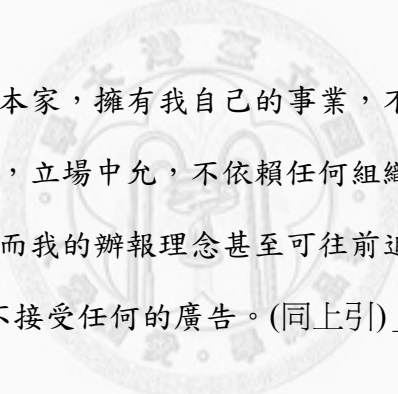
探究中西方新聞事業的起源，中國報業的發展始於士人報業，例如王韜、梁啟超等人接連創辦報刊鼓吹變法維新。他們的性質在新聞事業上，屬於以論說為主要功能的小型報業，透過刊物內容傳達理念。在西方，早在 1729 年，以印刷工人起家的富蘭克林創辦其首份報紙——《賓夕法尼亞報》。開設印刷工廠的他不僅獨立印刷報紙，更自己撰稿、編版，可說是名符其實的個人工作者。

然而，當新聞媒體步入商業經營的模式後，在人員編制、機器設備上的規模逐漸擴大，個人根本無力辦報。但有雄厚財力的資本家創辦媒體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牟利，煽色腥的小報內容逐漸取代了過往文人論政的理念傳達。是故，愈來愈多記者因為自己努力撰寫的新聞未獲青睞，而感到有志難伸，個人報業的年代似

乎只成為過往的美好回憶。

但是，本文第一章提及的 Stone，他證明了個人報業的形式不只存在於遙遠的美好過去，而是能真正實現於今日。換言之，Stone 的成功也暗示，儘管商業媒體林立，規模也愈來愈大；但記者不必然都得在主流媒體工作，記者是能夠獨立作業，創辦小型報刊，一肩扛起一人媒體的工作。

雖然 Stone 辦報所處的 1950 年代，受制於商業媒體的情況與現在不甚相同；但他亦親身經歷從商業媒體記者轉換為獨立記者的過程，了解新聞工作者在媒體中處處受限的無奈。因此 Stone（1963）認為，若記者不再是媒體組織裡的小螺絲釘，而是自行創辦個人媒體的老闆時，他們才能真正免除這些壓力的限制，實踐其新聞理想。是故，自由新聞工作者的概念其實可從 Stone 的自述裡探尋：



「我是個獨立的資本家，擁有我自己的事業，不受雇於人。我也是個全然獨立的報人，立場中允，不依賴任何組織或政黨的支持，只對我的讀者負責。而我的辦報理念甚至可往前追溯至富蘭克林一人，因為我和他一樣不接受任何的廣告。(同上引)」⁴

從 Stone 的自述可推知自由新聞工作者的兩個涵義，第一，他是自僱（self-employed）的，自己就是其個人媒體的老闆。第二，他是獨立報人（independent newspaperman），意指自由新聞工作者毋須組織或政黨的支持，只有讀者才是他服務的對象。依賴讀者訂戶維生的 Stone，更言明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廣告。甚至梁啟超也認為，經濟獨立是報刊獨立的保證，因為：「凡辦報者於營業收入以外，別求不可告人之收入，則其報館不得自存……無論受何方面金錢之補助，自然要受該方面勢力支配，最少亦受牽掣（張之華主編，1999：170）。」換言之，自由新聞工作者的辦報淵源不僅可追溯至士人報業時期的獨立精神，距

⁴ 原文為：I am an independent capitalist, the owner of my own enterprise. I am a wholly independent newspaperman, standing alone, without organizational or party backing, beholden to no one but my good readers. I am even one up to Benjamin Franklin – I do not accept advertising.

離今日還不算太遙遠的 Stone 亦擺脫政商束縛，以個人報業的形式傳達自己的理念。

時至今日，實踐個人報業的理想可以不再需要像 Stone 一樣籌措資金、創辦實體報刊；藉由網路科技，不管是記者或是普羅民眾都能在網路上擁有自己的媒體，自由發表個人看法。這樣的轉變對於在媒體裡鬱鬱寡歡的記者來說，不啻是新的契機。而新聞事業發展至今，從早期的個人報業進展至商業媒體後，也似乎乍見了轉型的曙光。換句話說，網路科技轉變了新聞事業的型態，也改變了在媒體中的新聞工作者面貌，使記者有機會開展一種新形式的工作生涯。

一如本文的研究對象，由於他們是透過網路作為新聞發表平台的自由報導者，雖然和 Stone 等人一樣堅持新聞專業理想，新世代自由新聞工作者卻展現出不同以往的工作樣貌。然而，終於能夠為理想自由寫作的他們，也仍然遭遇不同情況的勞動困境。自由新聞工作者的勞動樣貌，故有待深入探討之，一揭其未知的面紗。

貳、自由工作的勞動樣貌

一、自由工作的組合作形式與成功案例

自由新聞工作者屬於自由工作者中的一環，本文研究的獨立記者，亦以自由工作的形式，即無固定雇主的方式過活。因此，要了解其工作與勞動樣貌，首先應探討自由工作的工作模式——「組合式工作」。

管理學者 Charles Handy (2002) 對自由工作一直抱持樂觀的態度，他認為，所謂工作並非只有靠固定收入、在大機構中的一種類型，人們其實還有其他選擇，例如自僱式工作，沒有一定的合作對象或業主。而他更以「組合式工作」來形容自由工作者的生活——從事不同類型的工作，擁有多個收入來源，就像投資組合一樣。

他也進一步描述組合工作類型：「我的工作中有些讓我著迷，如寫作；有些出自於關心，如義工；有些能賺錢，沒錢我就不做；有些則純粹出於狂熱，如烹

調或園藝；有些是雜務或責任，如房屋修繕（Handy，1998：300）。」 Handy 描述的組合工作生活，其實也是對工作的重新定義。因為自僱，意即自己雇用自己，並從各種工作匯聚而成的組合中，賺取金錢及獲得成就感。相較於有老闆、有固定合約的安穩全職工作，這樣的生活雖然有其不確定性，卻擁有更多的自由和職業熱誠（同上引）。

因此，他自創「大象」與「跳蚤」的比喻。過去人們熟悉的雇用關係，是隸屬於單一組織，Handy 將這種大型組織比喻為「大象」。脫離「大象」，成為個體戶，他把這樣的自由工作者稱為「跳蚤」。早在二十幾年前，他預測這將成為愈來愈流行的生活方式。

網路的普及和技術的進步，不僅讓在家工作不再是幻想，愈來愈多人具體實踐獨立工作的理念，實現 Handy 所預測的跳蚤生活。獨立工作領域的範圍也因此更為擴大，例如程式設計、電腦繪圖、插畫，以及文字工作者等不同工作內容。本文的研究對象，他們將報導內容形諸於文字，透過網路散布，這樣的角色是獨立工作領域裡的自由新聞工作者，同時也改變了傳統新聞的生產方式。是故，以下將以兩位自由新聞工作者的成功案例，藉此與 Handy 的論述相呼應。

第一位是美國知名部落客 Joshua Marshall，他的部落格「論點備忘錄」（Talking Points Memo）⁵ 被公認為全美最有影響力的四大政治性部落格之一。Marshall 曾是《美國前景》（*The American Prospect*）的記者，這是他在組織體制裡的唯一工作經驗。他至今仍以星巴克為辦公室，替報紙雜誌（如《紐約時報》、《大西洋月刊》、《華盛頓月刊》）等舊媒體寫稿為生，並靠部落格這個新媒體來實現他獨立自由媒體的夢想（王健壯，2004 年 12 月 18 日）。值得注意的是，Marshall 的報導曾經讓 2002 年即將接任多數黨領袖的共和黨參議員羅特下台，2008 年他更以一篇關於美國司法部不當免職八位聯邦檢察官的調查報導，獲得喬治·波克獎最佳法律報導（George Polk Award for Legal Reporting）（*New York*

⁵ “Talking Points Memo”網址：<http://www.talkingpointsmemo.com/>

Times, 2008. 02. 25)。

Marshall 報導的影響力之大，也意味自由新聞工作者獨立自主的新聞能補充主流媒體忽略的議題，提供人們不同觀看的視角。尤其對於爭議事項，人們更需要不同觀點的新聞。

因此，第二位要介紹的自由新聞工作者，是一位居住在巴格達、化名為「Salam Pax」的青年。2003 年美國入侵伊拉克之際，在美國步步入侵、家鄉烽火連綿裡，Pax 經由他的部落格「Where is Read？」⁶，真切地敘述自己在巴格達生活的點點滴滴。Pax 透過其冷調幽默的文筆，傳達出不同於主流媒體的在地觀點，因此迅速引起廣大的關注，之後被翻譯為多國語言出版成書，他甚至也開始替《衛報》撰寫專欄。從自由工作的角度而言，仍保有獨立工作身分、且依然保留真實姓名的 Pax，是一位達到個人日誌、全球發聲的自由新聞工作者（周易正，2003 年 10 月 26 日）。

Marshall 和 Pax 的成功，回應了 Handy 對於自由工作者勾勒出的圖像，同時也彰顯網路的影響力，使自由新聞工作者的工作形式有機會成為未來新聞事業的另一種可能。然而，自由工作的維持除了仰賴工作者的個人能力與信念之外，還必須面對現實維生的考驗。就算是提倡跳蚤生活的 Handy，亦指出自由工作者的獨立生活並非只有那美好的一面。尤其對於經歷組織與獨立工作職涯轉換的工作者來說，雖然「老闆、從屬關係、例行公事」的戲碼消失，現實生活的打擊和謀生的不確定感也隨後而來（Handy，1997）。是故，自由新聞工作者在網路上實踐理想的背後，他們終究必須面對生活上的種種考驗。

自由新聞工作者是否得以維生，關係著他們開創的營運模式，與擁有的勞動條件。以英、美的自由新聞工作者為例，他們不僅人數眾多，甚至進一步在網路上成立組織團體，共同面對維生上的問題。在英國，Freelancejournalist.co.uk⁷和

⁶ “Where is Read?”網址：http://dear_raed.blogspot.com/

⁷ 網址：<http://www.freelancejournalist.co.uk/>

National union of Journalists (NUJ)⁸都是知名的自由新聞工作者組織。

Freelancejournalist.co.uk 的創立人 David Nicholson 就是一位資深的自由新聞工作者。Nicholson 成立一個需求線(need online)，合作客戶包括 *The Guardian and The Independent*, *The Financial Time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等，為自由新聞工作者提供工作機會。

NUJ 則是英國的記者組織，自由新聞工作者也涵蓋在它的保護範圍內。NUJ 提供一個讓媒體游牧族交流的平台 (freelance networks)，讓他們可以互相討論工作的情况和資訊，並且也有法律服務，針對自由撰稿人的合約、酬勞、保險……提供諮詢。甚至還架設 fees guide 網頁，讓自由新聞工作者了解不同媒體通路的行情、價碼，增加和客戶談酬勞的優勢。上述的這些服務，都是為了保障自由新聞工作者的勞動權益，讓他們得以維生，實踐其理念。另外，美國的 Society of professional journalists (SPJ)⁹亦提供類似的服務。

從 Marshall 的成功案例，一直到英美的自由新聞工作者組織，可發現自由工作的維持與茁壯仰賴於個人努力、營運模式的建立，以及集體力量與社會條件的支持。換言之，由於 Handy 的觀點是基於英美的脈絡下，故他對於自由工作者的建議（如：從事不同類型的工作、擁有多個收入來源），尚須探究在不同脈絡的社會裡實踐的可行性。另一方面，以文字作為專業的自由新聞工作者，他們和一般廣義的自由工作者相比，在勞動情況上展現的差異性，更有待進一步了解。

是故，本文從勞動樣貌與生存策略的角度探討台灣的自由新聞工作者，期盼藉此和英美的情況相對照。但由於過去文獻幾乎很少專門以自由新聞工作者為主題的研究，而國內近年來與自由工作者相關的研究，研究對象分別是漫畫家（劉昌德，2004）和紀錄片工作者（林昶宏、劉昌德，2009）。因此，本文擬先分析台灣這兩類不同領域自由工作者的勞動概況，歸納他們共同面對的勞動困境，據此再深入探討自由工作者的勞動本質。

⁸ 網址：<http://www.nuj.org.uk/innerPagenuj.html?docid=157>

⁹ 網址：<http://www.spj.org/>

二、台灣的自由工作者

（一）漫畫家

劉昌德（2004）以台灣漫畫家為研究個案，分析近年來數位科技對文化工作者的影響。他特別將漫畫家以「文化工作者（cultural workers）」一詞代稱，而非「藝術家（artists）」，他的用意是強調漫畫家的勞動已經被資本滲透，使勞動者必須經由出售勞動力來謀生——無論這種形式是薪資或是外包契約（sub-contracting）關係。

因此，該文首先分析漫畫家作為文化工作者的勞工屬性。劉昌德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出發，回顧 Wright 如何修正有產／無產階級二分法概念。Wright 把不具生產工具的受雇勞工，依照對組織管理、技術聲望兩項資產的控制程度，將薪資勞工階級分為九類。其中，包括文化工作者在內的專業勞工，尤其依賴技術聲望資產的控制權，據以提高自身在勞動市場的交換價值。因此，擁有較高聲望的文化工作者，較能與資本家議價。但由於聲望的稀有性，以及受到受僱形式多屬不固定雇用關係的自由契約（freelance）影響，大多數文化工作者的勞動條件低落，收入甚至遠低於其勞動力付出。

對此，劉昌德研究發現，台灣漫畫家除了工作不穩定、收入偏低之外，屬於自由契約工作者的漫畫家，因為沒有一定雇主，根據相關規定，無法參加勞保或健保，因此缺乏社會保險的保障。另一方面，網路等新科技的出現，雖然讓出版變得更為簡便，使漫畫家得以成為出版個體戶（self-publisher），並藉此累積其技術／聲望資產。然而，數位科技也使得漫畫創作的製作技術更為統一，漫畫家的實質勞動比以往更容易轉化成簡單的抽象勞動，反倒使資本家能進一步加強對其剩餘價值的剝削。換言之，當資本家依然掌握生產流通的控制權，網路與數位科技對台灣漫畫家勞動條件的幫助仍然有限。

（二）紀錄片工作者

另一個研究個案是探討台灣紀錄片工作者的勞動特性與勞動條件。林昶宏與

劉昌德（2009）共同研究公部門的補助與提供的映演管道如何影響台灣紀錄片的產製，同時也調查台灣紀錄片工作者的勞動樣貌。

和上一篇研究的漫畫家相比，紀錄片工作者同屬「藝術家」、「文化工作者」，以及「自由工作者」。換言之，紀錄片從業人員沒有特定雇主，多數都屬於約聘創作者（contracted artists），亦屬技藝勞工的自由契約（freelance）關係。這樣的勞雇關係也使得他們雖然掌握生產過程的工具，但不擁有最後的商品販售與再製權利，也就是智慧財產權。是故，林昶宏與劉昌德在文獻回顧時引用 Elliot 的話，指稱所謂的創作自由，往往只是大部分自由工作者之惡劣勞動條件的遮羞布，而藝術創作者的「自由」形象，不過是「浪漫主義與波西米亞式」（romanticism and bohemianism）的假象罷了。

而對於這樣惡劣的勞動條件，該篇實際研究後發現，由於公部門給付的工資低廉，且能提供的工作機會有限，外包勞工因此無法從紀錄片工作獲得足夠收入，必須兼職來補貼己用。在自主性方面，許多紀錄片工作者也常常感受到公部門不專業的管理或干預。然而，這些創作者憑藉對紀錄片工作的高度熱情，即使他們不滿意其工作處境，也仍然充滿成就感。研究結果也建議，增加這些「影視外包勞工」的工作機會與收入，是改善紀錄片工作者的可能途徑，也是目前本土紀錄片發展的重要課題。

三、小結

上面兩篇關於漫畫家和紀錄片創作者的研究，可以歸納出台灣自由工作者共同面對的勞動處境。

第一，由於在契約形式上屬於自由契約關係，沒有特定的雇主，囿於法令限制，無法參加勞、健保。紀錄片工作者一直到 2006 年成立「紀錄片從業人員職業工會」¹⁰後，透過工會代辦勞健保，參與的會員終於能享有勞、健保的保障。

¹¹然而其它自由工作者如何維護自身在社會福利上的權益，讓人憂心。

¹⁰ 2006 年 9 月成立，紀錄片工會網頁：<http://blog.roodo.com/docunion>

¹¹ 台灣的職業工會擁有代辦勞健保的功能，針對無法以個人身分投保的自由工作者，目前的解

再者，他們作為約聘創作者（contracted artists），只享有創意部分的擁有權，雇主則享有對創意再生產的權利。換言之，自由工作者無法享有創意產品的智慧財產權。第三，也正因為合約中的工資並非購買創意工作者的勞動力，而是對創意工作者的聲譽、才氣等市場價值的測量。換言之，自由工作者因此尤其仰賴技術／聲望資本。聲望愈高，不僅較能獲得工作機會，甚至因而能享有更多的創作自主性。然而，實際上，聲望的稀少難求，使多數的文化工作者的勞動條件甚至比一般勞工還低落。

從以上三點可看出台灣自由工作者的勞動處境亟需提升。因為同樣屬於約聘創作者，英美的自由工作者能以集體形式增加和資方談判的實力，保障其工作權。相較之下，台灣自由工作者以單打獨鬥的個體戶角色行動，不僅影響其勞動條件，自由工作營運獲利模式的建立也因此尚未發展成熟。

參、自由工作者面臨的勞動困境

雖然台灣和英美自由工作領域的發展成熟度不同，但同屬短期約聘、接案性質的自由工作者都面臨上述類似的勞動處境。因為，仍舊屬於勞工的他們，依然必須以勞動交換獲得酬勞。然而，在勞動力交換的過程裡，資方的權力支配無所不在，且往往凌駕於自由工作者之上。從上述對於漫畫家與紀錄片工作者的研究也顯示，自由工作領域中的文化工作者，他們的勞動處境更顯艱困。而本文研究的自由新聞工作者仰賴文字做為謀生工具，與文化工作者的性質雷同。因此，以下將探究文化工作者的勞動本質，藉此深入理解本文的研究對象。

一、文化工作者

對於文化工作者這類的創意勞動，Ryan（1992：134-138）從對特定生產工具的掌控、對創意過程的控制，以及對原創性的掌握三個項目，加以檢視創意勞動者展現出何種不同的工作性質。在研究結果中，Ryan 將創意勞動區分為約聘的創意工作者（contracted artists）和專業的創意生產者（professional creatives）。

首先，約聘的創意工作者包括了自由撰稿人（freelancer）和明星，他們的合約狀況屬於從屬約聘（sub-contracting），意指他們擁有創意部分的擁有權，公司則具有對創意再生產的權力。是故，合約裡工資的擬定是根據對創意工作者之聲譽、才氣等市場價值的測量，而非購買創意工作者的勞動力。Ryan 因此認為，約聘的創意工作者在勞動過程中的定位，是作為提供即時創意商品的一種個人化勞動（personalised labour）。

相較之下，專業的創意生產者（professional creatives），和約聘的創意工作者相比，他們具有固定職位和薪資，工作是依循理性管理。是故，雖然他們擁有的創作自由較少，並處在科層的工作條件中，但在收入上卻比約聘的創意工作者更有保障。因為他們的待遇是依據工會與企業協定之最低標準來衡量，而不是測量個人的勞動價值（如：聲譽）。因此，Ryan 將專業的創意生產者在勞動過程中的定位，歸類為個別化的勞動（personified labour）。

從 Ryan 對於約聘創意工作者的研究，可看出文化工作者對聲譽、才氣等市場價值的依賴，擁有這類資本的多寡甚至影響其簽訂合約時的接案價碼，而 Ryan 也將自由撰稿人和明星劃歸於這一類。因此，進一步研究約聘創意工作者可發現，以明星而言，屬於個人化勞動的藝人，其仰賴聲譽資本的原因，主要是因為在薪資結構上，藝人不像一般受雇勞工擁有固定的基本薪資；他們的薪資來源取決於唱片的銷售版稅、戲約的集數，或通告費用等，是一種「上多少、賺多少」的計件制方式。這種計件制的薪資結構，讓藝人在勞動上屬於臨時性的聘雇關係（contingent or temporary employment relationship），係指非全時、非長期受聘雇於一個雇主或一家企業的關係（林富美，2006a：230-238）。

然而，藝人除了面對一個不固定的聘雇關係之外，又因其勞動涉及自身的表演才華，尚需面對市場銷售的考驗，故合約的擬定更以藝人的知名度來衡量其市場交換價值。因此，在僧多粥少的藝人勞動力市場結構裡，藝人想成功，本身必須努力，但同時也仰賴機運與人情網絡，才能累積更多聲譽資本（同上引：239）。

一如藝人在薪資、勞動力市場結構下面臨的處境，同屬約聘創意工作者的自由新聞工作者亦有類似的情況，但在文化勞動本質上與藝人的狀況有些微差異。因為，知名度對藝人之所以重要，是由於他們必須面對嚴峻的市場銷售考驗；而自由新聞工作者對聲譽、才氣的仰賴，是基於其文化商品的創作與一般商品的製造不同。文化商品的創作靈感源於勞動者的內在需求，傑出作品之想像力與熱情常超越理性、常規；然而在作品完成前，卻無法確定文化工作者的內在想像能否成功地轉化為具體創作品。換言之，管理者很難透過制式化的流程評量其最終勞動產出。是故，文化工作者對於知名度、聲譽和才氣的依賴，亦突顯文化勞動面對的市場不確定問題（林富美，2006b：49）。

當勞動價值無法確切量化，也因此造成愈大牌（即愈具知名度）的文化勞動者擁有愈多的市場交換價值，有利於爭取勞動市場的產製機會。然而，儘管在這樣的條件限制下，文化工作者由於擁有不同專業知識、人脈、個人聲望等資本，他們受到上述的限制程度也因此不甚相同（Caves, 2000，轉引自林富美，2006b：50；黃順星，2007）。因為，在勞動場域裡，市場權力誠然框限了文化工作者的勞動酬償，但文化工作者亦能根據其在場域裡的所屬位置與自身擁有的資本，¹²選擇有力的生存策略。換句話說，文化勞動其實是一協商、交流的過程，文化勞動者如何和管理者取得其勞動價值與商業價值的共識，不僅涉及個別勞動者的處境、定位與產製的現實，也彰顯了文化工作者的能動性（林富美，2006b：75）。

是故，自由新聞工作者採取的生存策略與其擁有資本的關聯，是本文欲發掘的重點之一，而研究者對自由新聞工作者勞動處境與生存策略選擇的重視，也是基於關切自由工作的未來發展。因為，雖然文化工作者擁有較多的創作自由，但創作作品獲得的酬勞卻與能否維生、維持自由工作密切相關，這點也是整體自由工作領域同樣面臨的考驗。是故，如何建立一個穩定、獲利的維生模式，關乎整

¹² Bourdieu 在場域理論裡，提出場域是一個交織各種力量與位置關係的活動空間，個人擁有的資本與其在場域裡的行動反應有關。而資本包含四種類型：經濟資本、文化資本、象徵資本與社會資本。其中經濟資本是指可立即、直接轉換為金錢的財產；文化資本為語言、思考、行為模式、價值與教養，常透過教育資歷的形式表現；社會資本是藉助於其佔據的社會關係網絡所掌握的資源或財富；象徵資本則包含了名望、地位、權威等能力（林富美，2006b：76-77）。

體自由工作的未來發展。因此，本文接續以營運模式的角度，分析自由工作者的勞動條件。

二、維生模式的建立與自由工作者勞動困境的解決

不同地區自由工作者發展出的維生模式，與其所處社會提供的支持條件有關。如同之前提及的英美自由新聞工作者組織，他們不僅社群壯大，人數眾多，各媒體也歡迎獨立撰稿人的作品，甚至有不少網站是教導人們如何做一位自由新聞工作者。

相較之下，在台灣，自由新聞工作者仍以個體戶式的角色謀生，維生方式尚在摸索階段，更無法擁有像英美自由工作者與客戶談判價碼的優勢。處於不同脈絡下的台灣自由工作者，勞動權益的保障和英美相比更顯低落。是故，在台灣，如何建立一個穩定、獲利的維生模式，並擴大集體合作的力量，是解決自由工作者勞動困境的關鍵。

並且，前面回顧台灣紀錄片工作者的研究亦顯示，紀錄片工会的成立有助於保障自由工作者的社會福利權益。因此，繼紀錄片工會之後，日前一群文化、藝術工作者，包括蔡明亮、湯皇珍、陳界仁等人，向台北市勞工局提出申請，希望能增加「創作者」職業類別，成立「創作者職業工會」。他們的用意是要將創作者的職業涵蓋範圍從目前的藝術創作類，擴大至文學、建築、服裝等領域，藉此讓文化工作者不被勞健保排除在外，擴張社會福利的保障範圍。另一方面，工會亦可作為一個凝聚的平台，讓分散各地的創作者團結起來，增強自己與資方談判、接案的實力（易禹昕、徐沛然，2009年9月22日）。

自由工作維生模式的建立與工作者勞動困境的解決，皆與自由新聞工作者的勞動處境息息相關。因此，本文對自由新聞工作者的研究，不僅可補充台灣自由工作者的研究範圍，亦能藉由他們不同維生方式的選擇，思考自由工作者勞動困境的解決之道。

以上針對自由新聞工作者的文獻討論，首先探究自由新聞工作者的淵源與概

念，並從成功的自由新聞工作者案例中探尋其理念與成功要件，接著再分析自由新聞工作者的勞動本質。但由於自由報導者的勞動樣貌與整體自由工作者的工作情況習習相關，並且直接以自由新聞工作者為研究對象的文獻難尋。因此本文先探討自由工作者的整體勞動狀況，輔以漫畫家與紀錄片工作者的研究，將範圍縮小至了解文化工作者（含自由新聞工作者在內）的勞動本質，再據此分析自由新聞工作者共同面臨的勞動困境。

而當文獻總結出自由新聞工作者同樣面臨契約價碼、工作機會，與社會福利等勞動窘境時，文中也提供幾個國外盛行的自由新聞工作者組織，藉由介紹這些組織的經營與服務，作為台灣自由工作者建立維生模式，或者未來成立集體工會的參考。

第三節 小結

本文研究的自由新聞工作者，他們在個人部落格、在公民媒體發表新聞，這種一人作業的形式可以往上追溯至個人或小型報業的年代。同時，他們經歷組織雇員與獨立工作者的職業轉變後，開展出自由新聞工作者的新身分，也讓記者的職業生涯有了不同的選擇。

因此，接續第一章提出的兩個研究問題，並結合第二章的文獻探討，總結出本文對獨立撰稿者的研究包含兩大面向：第一，自由新聞工作者專業意理的探討。如先前文獻所述，由於專業意理是在變動中形成，本文欲探索自由新聞工作者於其記者職涯歷程中，這段期間經歷的生命樣貌，如：採訪經驗、工作環境與勞動條件改變，如何影響他們在專業意理上的轉換、形塑，與實踐。而探討自由新聞工作者專業意理的演變，也能從中了解他們是一群什麼樣的記者，並補足過往對這群記者研究的欠缺。

第二，在自由新聞工作者的面向上，是欲探討這些擁有不同技藝、聲譽等資

本的獨立撰稿者，如何在勞動市場上謀存，遭遇哪些相同的勞動困境，發展出何種不同的生存策略，藉此了解和比較個別勞動者在文化勞動中的處境。

本文研究對象，僅是所有自由新聞工作者的其中一部分，但也同時身處於整體自由工作和文化工作者的領域裡。因此，這些以個人媒體為基地、繼續報導新聞的獨立撰稿者，他們來自於主流媒體的背景與一人媒體的新聞工作模式，雖然無法代表全體自由新聞工作者的勞動概況；但這些獨立撰稿者面對的勞動困境與採取的生存策略模式，對於仍是組織雇員的記者、或者從事不同工作形式的自由新聞工作者而言，也許能對記者生涯與獨立工作的未來開啓更多可能的想像。是故，這群獨立撰稿人繼續實踐新聞專業理想的職涯故事，將是文中接下來愈發掘的焦點所在。



第三章 研究方法

基於本文的研究動機與研究問題，本文將採用生命史研究途徑與敘事研究方法，探討離開主流媒體的自由新聞工作者，他們辭職前後的記者職涯歷程與採訪經驗，如何影響其專業意理的形塑與實踐。而他們面對自由工作謀生上的挑戰時，又如何在其新展開的職業生涯裡尋求不同的維生策略。因此本章將介紹生命史研究途徑的特質、重要性與限制，再說明如何以敘事研究方法進行資料呈現與詮釋，以及本文的研究對象選取。

第一節 生命史研究途徑

壹、生命史研究途徑的定義

生命史（life history）是一種生命的書寫，如同口述歷史、生命故事、自傳等研究方法一樣，均屬質性研究中傳記研究法（biographical method）的一種（Denzin, 1989：7）。簡單來說，生命史是將生命歷程放在歷史脈絡中來研究的一種方法，書寫焦點是對生命歷程的重新建構，並希望透過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互動，共同建構並呈現出這些生命經驗具有的意義與意涵（黃月純，2001；Egger, 1994；康萃婷，2002：23）。

在生命史研究中，研究對象被視為積極的說明者。研究者透過訪談與對話，深入探究他們的主觀世界與生命經驗，並透過建構他們的生命，說明人生命的經驗內容與意義（Gubrium & Holstein, 1995；王麗雲，2000：267–269）。因此，生命史的主旨在於描述人們如何經歷社會上遭遇的經驗和事件，從當事者自己的情感和觀點去解釋其處理社會經驗的脈絡（Langness & Fa, 1965；轉引自師瓊璐，1999）。

追溯生命史研究的歷史，最早起源於二十世紀初，但後來因為實證主義的興盛，生命史研究的信效度、研究對象的代表性因此備受質疑。直至 1970 年後，隨著後現代主義、後結構主義的興起，多門學科才開始重新重視生命史研究的應用，特別是對於了解與說明弱勢團體（如女性與少數族群）的生命史與觀點上，它具有知識的解放功能。生命書寫於是被當作一種工具，協助個人建立自我的主體性，助其了解自己的生命受到哪一些知識或權力關係的影響。故能從這些結構性因素的解構過程裡，重新認識自己，從而積極改變自己的命運（王麗雲，2000：273、278-279）。

貳、生命歷程與生命史研究途徑

生命歷程可被概念化爲一連串環境變動和有機體反應，換言之，是探討個人與情境互動的結果（Skinner, 1953；Runyan.W, 2002：113）。

生命歷程研究對於個人與其所處社會歷史環境交互影響的探究，與生命史著重於生命經驗與歷史脈絡的關連，有異曲同工之妙。但生命歷程研究具有四大要素：強調時間與空間位置、生命的關連性、個人力量，以及時間的安排。不同要素也衍生出不同的研究取向，生命史研究即是代表生命歷程研究中對個人力量的重視，進而發展出的研究途徑。除了重視個人力量之外，生命史研究也具有生命歷程研究的其他特色，例如對整體、對歷史、對脈絡因素、對個人適應策略的重視，故能了解個人對於外在環境與外部變遷的應付策略（王麗雲，2000：268）。

生命史所欲揭示的個人生命歷程發展，研究層面可分爲完整的、部分的，或是著重在某個轉捩點，某些重要事件造成的影響。換言之，研究者可選定其關心的主題，有意義的聚焦，書寫的重點不在於藝術的呈現，而是針對研究對象的事實資料以及對其生活世界的詮釋（Denzin, 1989：29；王麗雲，2000：268）。

而不論研究層面如何選取，生命史研究的重要性不只在於更清楚地理解研究對象的生命歷程，個人的改變與自我認同的形塑（Hitchcock & Hughes, 1989），更

是爲了了解個人結構性的自我意識（structured self-images）。因爲在許多時候，一些事件、觀點的產生並不一定會有十分明顯的因果關係；相對的，它是模糊且複雜的。藉由將研究對象的口述生命故事置於時空、社會環境等脈絡之下，研究者不但可以了解，對研究對象而言，社會世界之中的角色及規則是如何產生意義，並且可以從他們的生命經驗及想法觀點之中看到社會的變遷——即生命史研究所呈現的歷史連續性（Goodson & Sikes, 2001；Hatch & Wisniewski, 1995；轉引自康萃婷，2002：24）。

另一方面，經由對受訪者生命歷程的時空定位，了解其與歷史、社會脈絡因素的互動關係，也才能知曉他們面臨的限制和可能出路（王麗雲，2000：285）。是故，對本研究而言，生命史強調的生命歷程、著重的脈絡因素，恰能吻合本文研究宗旨，能夠發掘自由新聞工作者究竟是哪一種記者，也可彰顯他們是如何與社會文化結構互動、衝突、妥協，甚至是原本被人忽略的聲音與課題（康萃婷，2002）。

在生命歷程方面具有重要意義的生命史研究途徑，對於研究者本身而言，也因此重新定位自己在研究中的位置——不再將重心放置於自己看到的他人或世界是什麼；而是透過他人的生命歷程敘述，了解他們的世界，並將自己放置在他人的位置上，觀看生命中的重要事件與事件對於個體的意義（熊同鑫，2001：111）。

參、生命史研究的限制

生命史途徑的研究常被批評效度不高，認爲只能蒐集部分的解釋、推論性不夠，也被人懷疑故事的真實性，以及時間上的限制（王麗雲，2000）；然而，這些批評也正是生命史研究途徑爲了彰顯受訪者主體性所帶來的反面效果。因爲，包括生命史研究在內的質性研究關心的焦點是「研究對象所知覺的社會事實之建構過程」、「人在不同的、特有的文化社會脈絡下的經驗與解釋」，因此屬於量化

研究的評判標準並不能完全適用之（康萃婷，2002：36）。

儘管如此，爲了彌補以上的限制，可採用集體傳記的方式增強推論性，或是充分地準備與閱讀相關資料，取得受訪者的信賴，兼顧不讓受訪者感受到隱私被侵犯的研究倫理前提下，提高生命故事書寫的真實性（王麗雲，2000；熊同鑫，2001）。

肆、本文聚焦於職業路徑的探討

雖然生命史泛稱爲個人人生整體上的一連串變化，但同時，如先前所述，在研究層面上，生命歷程可以聚焦在某一階段的狀態分析、特定領域之內的經驗歷程，例如教育生涯、職業生涯的人際關係。一組特定的階段和狀態定義，容許將所有可能的生命歷程作周全的分類，而一個生命歷程可界定爲個人所經歷過的某一特定順序的狀態（Runyan，2002：133；管嫫媛，2008）。

本文爲了探討自由新聞工作者在主流媒體與自由工作之間的職業轉換，對其專業意理養成過程的影響，以及探究他們在勞動條件改變下的因應策略。因此，本研究採取生命歷程分類中的職業路徑（career path）概念。一方面探討影響受訪者職業轉變的因素，包括「先前的經歷」（antecedents），意指個人的、教育的、專業（工作）的特質與經歷。另一方面亦涵蓋「間接的影響變項」（mediating variables），如社會、政治、經濟、個人因素等。這些因素會影響受訪者「隨之而來的職業轉變」（consequents），即對於他們的工作選擇，以及在工作轉換後展現出的不同生存策略（Runyan，2002）。

是故，本文選擇生命史研究途徑，並著重於職業路徑的探討，欲了解在受訪者在職業轉換過程中經歷的生命歷程與因果脈絡，以及其如何實踐其新聞專業理想，同時理解他們面臨的限制與找尋的可能出路。

第二節 敘事研究

爲了深入探討自由新聞工作者在其記者職涯中，經歷的採訪經驗、工作環境與報導身分的轉換……對於專業意理產生的影響，與他們之後發展出的不同維生模式。對此，本研究除了用生命史訪談與對話蒐集資料，在資料呈現上，將採用敘事研究（narrative research），細緻地表達故事架構與細節。

壹、敘事研究的定義與分析步驟

敘事分析是一種將「生活故事和對話」的表達視爲研究問題，並予以剖析的質性研究方法，也是一種用故事來描述人類經驗和行動的探究方式（胡幼慧，1996：160；Polkinghorne, 1995）。在敘說研究中，資料的蒐集是用一種說故事的方式，例如訪談所採擷的生命故事，或是人類學家以敘事形式寫下的實地札記。也因此，敘事研究是以故事的形式來展示呈現一個人的生命歷程，試圖了解人們如何理解自身生命、賦予意義與關照自我，以理解脈絡中的人類複雜生命（呂美慧，2008：80；張鳳婷，2007：36）。

所謂敘說，就像是說故事一樣。敘說生命故事，讓我們得以了解一個人，也讓這個人的生命在故事脈絡中被顯現出來。在敘說的過程裡，敘說者向聆聽者訴說自己的故事，從中回顧過去的生涯動線，甚或重新省視自己生命的意義。研究者故能從一連串的故事和敘說中，統整出一完整的生命經驗，並詮釋其中的意義（蔡瑞君，2002：36）。換言之，敘說者和聆聽者在敘事研究中，都扮演共同創造意義的角色。

敘事研究依據不同的研究目的分爲兩種探究方式：描述性（descriptive）和解釋性（explanatory）。描述性敘事研究的目的，是報告已存在的敘說，以及使敘說事件呈現其個人意義。解釋性敘事的研究目的則在於解釋行動之所以在某一情境或事件中發生的原因，不僅只有描述，還包含了詮釋在其中（Polkinghorne，1988；轉引自蔡瑞君，2002：38）。本文是以解釋性的敘事研究爲主，除了理解

自由新聞工作者的專業意理形塑與勞動生存策略，還爲了探究他們是屬於哪一種記者，如何與社會結構互動、衝突，因此兼具描述與詮釋的意含在內，據以分析他們在理念實踐與生存策略背後的深層因素。

敘事分析最珍貴之處在於，它是說者與聽者相互激盪出的故事。對於這樣生命歷程的再現，Riessman 提出經驗再現的五個階段（轉引自胡幼慧，1996：161）：

一、關注經驗（attending to experience）：第一步是強調受訪者對原始經驗的回憶及重新組織，透過關注與思考，將一些現象意義化，讓經驗再現出來。

二、訴說經驗（telling about experience）：接下來是關注於受訪者如何表達與組織這些經驗，敘說的故事如何發展與轉折，以及敘說當下的情境。

三、轉錄經驗（transcribing experience）：此層次強調研究者不但參與對話，也藉由錄音、轉錄，以文字記下，節錄成研究資料。故研究者必須決定何者要記錄、排除，要如何透過文字呈現給讀者。因此此階段爲研究者的「詮釋」實踐。

四、分析經驗（analyzing experience）：分析經驗是有步驟的。研究者如何把分散的片段資料整合成一個整體，要留下或割捨哪些內容，都在這個階段中決定。而研究者的價值觀、政治立場與採取的理論視角也無可避免地滲入其中。

五、閱讀經驗（reading experience）：分析完成後，最後一步是讀者的參與。同樣的文本，不同的讀者可能會有相異的解讀。研究者也必須思考讀者的參與和他們解讀出來的經驗。

貳、資料整理與分析

是故，爲了提供敘說者的生命故事爲研究素材，並以敘事分析的角度，進一步探討其背後的意含，重新建構其生命經驗。本研究依循 Riessman 提出的生命歷程再現的五個階段。在資料蒐集上，採半結構式深度訪談，讓受訪者透過關注與思考，自由敘說自己的故事。故訪談大綱只是作爲訪談時的架構參考，非逐題依照順序進行；而是視訪談情境與受訪者的反應，靈活地運用與調整問題的次序與文字內容。再者，由於經驗並非照本宣科地平鋪直述，研究者必須扮演好發問者和傾聽者的角色，彼此交心之後，受訪者才能表達出真實的感受，訴說出最貼近真實的生命故事。

蒐集資料後，再將訪談文本轉譯成逐字稿，謄錄過程以詳實爲原則。研究者會反覆閱讀，配合訪談時的情景，必要時加上受訪者當下的表情動作，同時仔細檢查是否有遺漏之處，也當作下次訪談的重要思考媒介。並且，因爲敘說故事是很主觀的詮釋過程，被選擇說出的故事具有在當時時間脈絡下的特殊性與選擇性，還需要其他資料加以補充檢視之（Goodson, 1998：10）。因此，本研究亦會蒐集與閱讀受訪者的相關紀錄，以增加後續資料詮釋上的正確性。

接著，在資料分析上，Lieblich, Tuval-Mashiach & Zilber 依據閱讀、詮釋和分析生命故事或敘說資料的不同可能性，將敘事研究的分析取向分爲四種，如下表 2-1 所示：

表 2-1：敘說分析模式矩陣圖

整體—內容	整體—形式
類別—內容	類別—形式

資料來源：Lieblich, Tuval-Mashiach & Zilber，2008：16。

四種敘事分析模式說明如下（同上引：16-17；蔡瑞君，2002：43-44）：

一、「整體—內容」分析模式

係以一個人完整的生命故事為焦點，聚焦於個體完整生命所呈現的內容上。當呈現故事的個別段落時，研究者是從整體故事的脈絡中去分析內容的意義。此種分析方式類似「個案研究」（case studies）。

二、「整體—形式」分析

「整體—形式」分析模式注重於清楚地呈現生命故事的情節或結構。例如敘說闡釋的是喜劇或是悲劇？故事追溯到敘說者生命中當前所處的時刻，或者是源自於過去的時間和境況？故事的發展在敘說者的生命中是漸入佳境，或者每況愈下呢？研究者也可能尋求整個故事發展歷程中的高潮或轉捩點。

三、「類別—內容」分析

類似內容分析的方法。研究主題的類別已被明確定義，將文本的表達歸類或摘錄至某個類別或群組之中。例如：敘說者在故事中曾提及的關於其生命中曾發生的某一特定政治事件之故事片段，這些和此一政治事件相關聯的故事片段，即可被拿來分析。

四、「類別—形式」分析

「類別—形式」分析模式強調敘說的抽象文體、特定風格或語言特徵，例如敘說者使用了哪些隱喻，或者敘說者主動或被動敘說的頻率。

本研究先以半結構訪談蒐集受訪者的資料後，接著進行資料分析。在上述四種敘事分析模式的選擇上，因為本研究採取生命史研究途徑，著重於自由新聞工作者職涯歷程的經驗敘說，敘說內容由受訪者的個案故事中組成。故採用第一種「整體—內容」分析模式，在接續的第四章前三節記者職涯圖像中，描述受訪者的記者職涯歷程發展與採訪經歷，並脈絡化地探究專業意理在其中的形塑過程。同時亦採「類別—內容」分析，根據本文欲探究的研究面向，在第四章第四節綜合分析中，歸納出受訪者不同專業意理的選擇、採取的不同維生模式，與遭遇的

勞動困境。

總體而言，本研究將透過訪談分析、詮釋、研究札記，選取相關的主題將訪談對話以文字呈現之。基於研究倫理考量，研究者選擇訪談對話時會與受訪者溝通，尊重其個人感受。訪問過程若有訪問對象不願透露的事項，或是發生讓他們感到為難的情況，不會再繼續追問，亦不會呈現於研究結果中。同時，也會盡量去除研究者的個人價值觀，讓研究成果能詳實呈現受訪者的生命圖像。

在研究限制上，使用生命史研究路徑和敘事分析方法，常被批評真實性不足，以及詮釋過於主觀。然而實際上，敘說的建構應該在於意義，而非事實（fact）的再現。因為事實本身就是一個建構，它從解釋的情境脈絡中得到意義（畢恆達，1996：38）。故本研究對於敘事的詮釋，是基於詮釋學理論中的「詮釋循環」（hermeneutic circle），充分閱讀相關資料，並將敘事資料置於整個社會結構下檢視，讓詮釋更為完備，補足訪談之不足。另一方面，亦須時時反省研究者本身的立場，回到研究對象的角度去理解，才能更精確地呈現受訪者眼中的世界。

第三節 研究範圍界定與選取

所謂自由工作者，在自僱式（self-employed）以及沒有長期服務客戶的定義下，涵蓋範圍很廣。但由於本文研究的是自由新聞工作者，係以自僱式的獨立工作模式，不再是受雇員工，並繼續從事新聞工作。換言之，在工作內容上，本文的研究對象與廣義的自由工作者有所區分。

同時，由於自由撰稿者的工作背景與從事新聞工作的模式各有不同，基於研究旨趣，本文選擇的研究對象是——曾經是主流媒體的專業記者，辭職後透過個人部落格或以網路公民媒體為平台，繼續報導新聞。這樣的選擇意味著，本文並非以分析台灣整體自由新聞工作者的勞動概況為宗旨，而是為了解記者在商業媒體之外的實踐角色，以及其所開創的職業生涯面貌。

一如本研究的題目——從組織雇員到獨立記者，這些記者不僅不再受雇於主

流媒體，而且還以一人媒體之姿，一肩扛起文字、攝影與編輯的新聞工作，並藉由網路平台的散播，例如部落格或公民媒體網站，傳達出他們真正想寫的新聞報導。是故，本文研究對象不同於仍然擔任主流媒體特約記者的自由新聞工作者，因為，獨立撰稿的身分、個人媒體的形式正是這群記者最特別的地方之一；另一方面，商業媒體的出身背景，也更令人好奇他們投身於自由工作、開創個人媒體的選擇與實踐過程。

所以，本文對於研究對象的範圍界定，有三個選取標準，分別是——「曾經服務於主流媒體」、「辭職後繼續從事新聞工作」，以及「以個人部落格或公民媒體作為新聞發表平台」。這樣的界定縮小了研究對象的選取範圍，也使本文能進一步研究這類型自由新聞工作者的特質。

上述是針對本文研究對象的界定，據此尋找合適的受訪者。由於本文採用生命史研究路徑與敘事分析研究方法，選擇研究對象因此不以數量多寡為衡量標準，而是考量資料的飽和度。如同第一章的介紹，本文先選定《苦勞網》特約記者江一豪，以及《台灣環境資訊中心》特約記者朱淑娟。經由朱淑娟的介紹，再以《苦勞網》特約記者周富美，作為第三位研究對象。

這三位受訪者不僅符合本文設定的選取標準，具有公民媒體特約記者身分的三人，分別藉由《苦勞網》或《台灣環境資訊中心》繼續發表新聞，江一豪與朱淑娟更將其部落格作為個人新聞發表的平台。他們的報導題材亦有不同之處。例如江一豪為勞工、社運發聲，朱淑娟著重於環境議題的新聞，以及周富美在醫藥領域中對弱勢處境的關懷。因此，由於三位受訪者涉獵於不同的報導領域，亦符合質性研究對於研究對象類別多元性的要求，可讓本研究的資料能更豐富。

以下是表格化的受訪者名單以及訪談大綱設計：

一、受訪者名單

表 2-2：受訪者名單

姓名	主流媒體記者經歷	網路發表管道／身分	主要報導領域
江一豪	《話題》雜誌、 《蘋果日報》	《苦勞網》／特約記者	勞工
朱淑娟	《經濟日報》、 《聯合報》	《台灣環境資訊中心》／ 特約記者	環境
周富美	《勁報》、《中天》 電視台、《自由時報》	《苦勞網》／特約記者	醫藥

二、訪談大綱

本文的訪談大綱，是以受訪者從記者轉換至自由新聞工作者的職業路徑脈絡為主軸。並且根據第一章提出的兩個主要研究問題：「第一，自由新聞工作者的專業意理如何形成與演變？第二，實踐新聞專業意理的過程中，自由新聞工作者離開媒體後的維生方式與勞動樣貌為何？」以這兩個研究問題為基礎，據此設計訪談問題。同時也事先蒐集受訪者的職業轉換資料與工作現況，針對受訪者的不同經歷，製作不同的題綱。另一方面，也會根據受訪者的回答，修改或增加問題內容，再進行接續的訪談工作。

表 2-3：訪談大綱

研究問題一、自由新聞工作者的記者職涯歷程與專業意理形塑過程	
職業背景	為什麼想當記者、想要當什麼樣的記者

	認為新聞應該發揮什麼影響力，最初抱持的新聞專業價值觀。
	成為記者的經過，媒體單位與採訪路線的選擇。
	進入主流媒體後，在新聞工作中如何實現自己心中的專業意理，或發生了哪些衝突？
	媒體工作經驗（不管是採訪寫稿、工作環境，或同事相處）與自己原先的想像有何不同？
	媒體工作生涯裡，最大的成就感和挫折感是什麼？這段工作經歷又累積了自己哪些歷練和專業？
職涯轉換	為什麼選擇離開？
	自身對記者角色的認知與實踐，與整體的新聞環境，對辭職的決定造成什麼影響？
	決定辭職時的心情為何？有何阻力或助力？
	為何選擇成為自由新聞工作者，而不是其他行業？或是就此離開媒體工作？
研究問題二、 在實踐新聞專業意理的過程中，自由新聞工作者的維生方式與勞動樣貌。	
勞動處境	目前的工作狀況如何？除了採訪新聞，在網站上發表之外，在維持生計上有什麼其他方式？大概都是哪些工作？為何會有這些工作機會？
	在社會福利（如：勞健保）的保障上，遭遇了哪些困難？

營運模式	如何讓讀者知道自己的部落格和網站？如何和讀者互動
	在確保自由撰稿的前提下，是否會考慮將目前報導的新聞作為營利之用？對於部落格廣告的看法為何？
生存策略	對於自己離開媒體，轉而在網路個人媒體發展，對於維生方式是否有任何規劃？
	若是繼續以文字工作謀生，過去的媒體工作資歷，如何幫助自己找到文字類的接案工作，開發其他收入？
	尋找工作機會時，如何讓別人認同你的專業？如何談妥接案價碼？
	若要維持自由新聞工作者的工作生涯，目前最欠缺什麼保障？對於創作者集體工會的看法為何？
角色	作為一位自由新聞工作者，如何選取報導題材？實際採訪遭遇了哪些過去不曾經歷的阻礙？和採訪對象的相處和以前有什麼不同？
	寫作方針、與讀者的關係，與過去在主流媒體相比，有何不同之處？
	如何看待現在的個人工作身分與過去當記者時的不同？無法擁有一份固定薪水的工作，是否會後悔？
	當初離開主流媒體時所堅持的新聞理念與對記者角色的認知，經過自由新聞工作者的洗禮後，有何改變？
	現在如何評價當初辭職的決定？是否會想重新回到媒體工作？
	一路走來覺得新聞工作對自己生命的意義為何？

第四章 研究詮釋——記者的職涯圖像

本章的研究詮釋觀點，乃根據本文提出的兩個主要研究問題：第一，從組織雇員到獨立記者，自由新聞工作者的專業意理如何形成與演變？第二，實踐新聞專業意理的過程中，自由新聞工作者離開媒體後的維生方式與勞動樣貌為何？據此來敘述三段受訪者的職涯故事。

同時，故事中的分析角度也基於第二章文獻探討裡提及的概念：一方面以 Weaver & Wilhot 對新聞專業意理的分類為基礎，探討記者的專業角色，故從受訪者對其記者職涯歷程的回憶中，統整三位記者的職涯圖象與專業意理內涵。另一方面，亦從維生模式的角度，描述他們離職後用何種方式，繼續維持其獨立記者生涯，探討他們在勞動處境上面臨的阻礙，以及各自於網路個人媒體從事的不同實踐作為。

並且，本章前三節的故事描述方式，將採第三人稱的敘說方式，加以補充說明受訪者提及事件的相關背景。而為了使讀者更能充分了解三位研究對象的職涯心情轉折，研究者在文字描述上係以完整呈現記者的職涯故事為主，盡量讓讀者能像現場訪問者一樣地觀看、傾聽（黃瑞琴，1991）。

第一節 江一豪的職涯圖像

江一豪，1979 年出生於台北，2003 年開始記者工作。記者生涯從《話題》雜誌開始，接著到《苦勞網》、《蘋果日報》。

關懷勞工、抱有濃厚社會意識的他，最初對記者的想像，是一份可以揭發社會不公義、為弱勢發聲的工作。當他真正成為記者後，在《話題》時期因此盡力採訪報導相關議題，發掘社會階層不平等的真實處境。換言之，此時期，他所抱持的專業意理內涵為解釋者。然而逐漸熟悉主流媒體運作邏輯的他，也愈亦察覺

新聞報導對弱勢處境的改變有限。

讓江一豪對記者角色深切反省的重要轉捩點，是在 2005 年，他於《苦勞網》採訪東菱關廠抗爭和 WTO 部長會議抗議遊行的兩次經歷。在東菱，他第一次長期投入於一個抗爭過程裡，因此開始不滿足一個報導者的角色，想要更了解那個他所關懷、卻不熟悉的藍領勞工世界。另外，去香港採訪抗議 WTO 部長會議的遊行，更開啓他對於社會運動的另一層認識。他因此明白，真正能改變弱勢階級處境的方式，不是當記者，而是從事社會運動，實踐社會改革。雖然他當時尚無任何社運組織經歷，但他對新聞專業意理的想法已進一步轉往「對立者」，亦即直接站在政府對立面。

2008 年，他投入三鶯部落的反迫遷運動，挺身成為三鶯部落自救會顧問。這個轉變對江一豪的重要意義在於，他不再是過去那個站在一旁報導的記者，而是協同部落族人抗爭的領導者。他也為三鶯部落的抗爭，寫下一篇篇的精采報導；但他作為社會行動的實踐角色已多過於單純的報導者。換言之，他從一名「對立者」記者，又往前一步成為一位「社運工作者」。

因此，在專業意理上的形成與轉變上，本節的寫作重點著眼於江一豪從欲揭露社會階層不平等事實的「解釋者」記者理念，經過哪些關鍵經驗的影響，促使他在報導立場上與政府更形對立，不僅是一位批評政府政策的「對立者」，其後也成為一名「社運工作者」。

而目前靠搬家維生的他，如何得以維持生活與採訪所需，還有他對於部落格發表新聞的看法、對獨立記者未來的想像，亦是本節探詢的另一重點。

【江一豪的記者職涯歷程圖像】

江一豪，台北人。1979 年出生。在個人部落格「生活，就是抗爭」裡，他是這麼介紹自己：「中央大學中文系畢業，曾當記者謀生 3 年餘，現在以搬家工人這個身分討生活，並在《苦勞網》擔任無給的特約記者。」

從記者到搬家工人，大學學歷的他選擇一條迥異於社會期待的路，但這看似突兀的兩個身分，卻是他理念實踐的延續——為勞工發聲。因此，離開主流媒體並仍然報導新聞的江一豪，他不再只是一位記錄者，更成為勞工階級的其中一員。親身理解工人生活處境的他，進一步地參與社會運動，以實際行動為改革付諸努力。

回溯緣起，江一豪對於勞工，對於階層不平等的關注，來自於他國中的經驗——一段中產階級的小孩與弱勢家庭孩子的相遇。

高中開始察覺社會階層的不平等

我國中讀台北市芳和國中，¹³芳和國中在台北市是比較邊緣的國中，所以其實我的同學，他們很多是所謂的弱勢家庭、單親的、隔代教養……就是那種不良少年。可是因為基本上，我覺得他們都是我的朋友；只是因為他們的家庭環境，讓他們在主流價值觀裡面，是比較落後的一群。

國中畢業後，江一豪考上公立的復興高中。平順的求學路途沒有使他遺忘了那群國中朋友，反而加深了他對國中那段記憶的疑惑，隱約察覺到社會階層的壓迫和不平等。

我的成長機會又比他們好一點，所以我一直在不同的方向走。你愈是算平順，你愈會看出你的朋友和你之間的差異和不平順。那在我心中就有一個拉扯，是什麼讓我們之間有所差異？那你會為了你的朋友，為了你所看到的事情去找答案。……那個不公平的東西開始

¹³ 芳和國中為台北市市立國民中學，位於臺北市大安區臥龍街 170 號。

萌芽。

江一豪對社會不平等的意識開始在高中時期萌芽，他對於為什麼讓自己和國中同學之間有所差異的疑惑仍然持續。大學聯考填寫志願卡時，對未來懵懵懂懂的他，雖然對於記者與社會實踐的聯繫還不太清楚，卻選填了很多新聞科系。另外填寫中文系除了是興趣之外，部分原因也是考量於它與未來新聞工作的相關。1997年8月，大學聯考放榜，江一豪考取中央大學中文系。

但他真正具體開始想當記者，是在大學畢業前後。

大四之後，你更確定將來的方向，因為大概知道自己做不了什麼事情。而且讀中文系，人家如果說……你要找到一個你適合擔當的工作，又是比較好像有一些社會實踐的，大概就是記者。但那時候，對社會結構的壓迫還沒這麼清楚的知道，只是說，好吧，就是大概記者是一個比較搬得上台面的，以中文系來講，我說有興趣…但好像是比較符合社會期待的工作。到這個階段，都還沒有跟所謂的想要從事社會改革，這兩者還沒有這麼的疊合。

大四因家中變故，更理解弱勢處境

大四那年，江一豪的家庭經濟開始出現問題，居住的房子被抵押貸款，甚至最後因付不出本息而遭法院拍賣（江一豪，2008）。原本和樂的小康家庭，在短時間內變得愁雲慘霧，江一豪也從一位中產階級的小孩，變成中下階層。還是學生的他，無力幫父母解決經濟問題，畢業後又緊接著去當兵，無法排解的苦悶因此籠罩了他兩年的軍旅生活。

從家裡經濟出問題到馬上去當兵，在那兩年的時間裡面，我所面臨到的基本上是相對挫折和壓抑的。過去的我，作為一個中產階級的小孩，學業也還算平順，我看待世間的事情雖然感受的到苦難，但基本上不是我的。這兩年時間比較挫折的經驗，對我而言等於是旁觀他人痛苦變成是自己的痛苦，某種程度上更貼近了所謂的壓抑或是壓迫。

換言之，隨著家庭經濟的走下坡，當江一豪也變成社會階層裡中下階級的一員時，過去他思索的社會不平等問題，如今眼睜睜地發生在自己身上。

當兵兩年，江一豪因此不斷地在苦悶裡找尋出口和解答，終於在退伍前，兩次偶然的經歷解答了他的困惑。這兩次經歷分別是簡錫堦與鄭村棋的一場辯論，以及一部紀錄片《往事只能回味》。

從基層、勞工的眼光來看待這個世界

2003 年，他退伍前幾個月，江一豪偶然參加一場民進黨主辦的座談會，講者為簡錫堦、鄭村棋與郭國文，主題是探討勞工與工運，這也是江一豪第一次聽到關於勞工的議題討論。已經對社會不平等能感同身受的他，對於這場座談會的印象非常深刻。江一豪回憶：

現在回過頭去看，他們當天談的東西其實並不深奧、也不深刻，可是對那個時候的我來講，已經很深了。而且是幾乎是重新去理解這個世界的觀點。那是什麼觀點，那是從基層、從勞工的眼光來看待這個世界。

這也是江一豪在從未被教導過的觀點。他說，

因為，我們從小受到的教育，不管是學校教育或是社會教育，他不會教你怎麼當一個勞工…他只會教你怎麼去當一個員工；可是很少告訴你，什麼是勞工，什麼是勞工的利益？……這樣的教育顯然是有一大塊的空白，那個空白我得去尋找答案，或是說那個空白正是在那一場座談，他們給我一個填補。我覺得那個是重要的。

那次座談會是江一豪對勞工議題的啓蒙。而當他開始從基層、勞工的眼光看待這個社會時，他也看到了另一個不被主流媒體青睞的世界——那是一群沒有被報導卻一直存在於這個社會的弱勢階級，包括勞工、身心障礙、低收入戶等。這些弱勢族群裡的某部分，可能有些就是他的國中同學。

應該爲工人做點事

感受到的震撼仍然持續，幾個月後，江一豪遇到一部真正啓蒙自己的紀錄片《往事只能回味》。這部紀錄片是關於勤翔紡織員工的抗爭過程，他們因為老闆無預警關廠，員工從忍氣吞聲到據理力爭展開抗爭行動。¹⁴

我第一次這麼清楚地看到說，明明是一群被虧欠的員工，因為老闆沒有依法給他們資遣費。他們明明是有道理的，不管是情理法他們都有道理，可是就是拿不到。但是拿不到你要去爭的結果就是…警察也打壓你，然後老闆也不用你。那我看到就是說，明明是對的事情，為什麼在我們這個結構裡面，在我們這個體系裡面是無法解決的，而且還要受盡屈辱跟恐懼。

¹⁴ 《往事只能回味》詳細介紹參見 <http://www.taiwancinema.com/ct.asp?xItem=12364&ctNode=252>

江一豪自述，《往事只能回味》對他的重要性在於，他開始決定「應該為工人做點事」（中國時報，2009.01.24）。過去，他儘管能夠意識到社會不公平的階層問題，卻只是一個朦朧的概念，沒有一個真正具體關懷、付出心力的對象。

就是說…社會不公平，可能原住民長期地被漠視、被欺凌……或是
性別取向的少數，這麼多這麼多的壓迫，我到底該關心什麼？那部
片是非常確定地、非常明確地指引我說，就是階級、就是勞工。

經歷退伍前的這兩次啓蒙經驗，記者工作對江一豪而言，不再只是自己的興趣，或是一份符合社會期待的工作；相對地，他把記者設定為一種社會實踐的手段，他要為弱勢階級、為勞工發聲。

《話題》雜誌：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

2003 年退伍後，他開始應徵記者工作。然而，江一豪所學非新聞本科系，也沒有工作經驗，起初求職並不順利，最後才到《話題》雜誌社當記者。《話題》是新光集團董事林伯翰創立的雜誌，邀請淡大大陸研究所教授趙春山擔任總主筆，雜誌內容以政治動態與財經議題為主。江一豪提及，雖然《話題》規模不大，但正因如此他才可能被錄取。加上雜誌社人員有限，社方不太會退記者的稿，他反而能夠盡情地寫。

另一方面，由於《話題》雜誌的刊頭標明為「政治的、財經的、社會的，給台灣一個正確的話題」。這樣的刊物性質也使得江一豪大量採訪這些議題，結識了許多社運團體，甚至有機會訪問簡錫堦和鄭村棋。是故，江一豪認為，作為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他有很大的空間能夠去發揮、去學習。

對於如何適應第一份記者工作，江一豪說，那時唯一有的能力就是對於文字

的掌握，除此之外沒什麼特別的方法，就是努力地採訪，大量地閱讀資料。一直到 2004 年年底《話題》停刊時，這一年八個月的時間，為他的記者工作打下初步的基礎。

《話題》那一年八個月的時間提供我一個很好的機會去…用一種記者的身分去靠近我想認識的族群，而且也是我很好的練習階段是…
在自己的文字上、在自己跟人跟事物的掌握上，打了一個初步的基礎，人脈也初步的建立，那不幸的是我的人脈都建立在社運圈，都是不會賺錢的人脈，但是這是我想要的。

《話題》停刊後，江一豪仍想繼續當記者，採訪勞工和社會議題。《苦勞網》是他在《話題》建立的人脈之一，江一豪因此主動向《苦勞網》提合作意願。由於雜誌社關門，領取非自願離職失業給付的他，自願每個月只拿一半（一萬五）的薪水。2005 年，江一豪遂成為《苦勞網》的記者。

如果說，在《話題》雜誌社的日子，讓江一豪開始朝著社會實踐的山頭邁進。那麼，到《苦勞網》之後，他的步伐踏得更穩，山頂的模樣也變得愈來愈清晰——知道自己想實踐的是什麼，以及，他要扮演什麼角色。

在《苦勞網》工作的上半年，江一豪對未來還不是那麼清楚。他坦承自己剛開始並沒有想長久待在《苦勞網》，只是計畫將這段時期在《苦勞網》的歷練，作為未來轉戰主流媒體的準備。然而他也表示，究竟去主流媒體要發揮什麼？其實自己並不清楚。也許只是一個名號，一種個人的成就，因為我是某某媒體的記者。

不過，經過《苦勞網》半年的歷練，他有機會深入參與社會運動和抗爭現場的採訪，更密集地接觸藍領階級之後，江一豪不再想成為主流媒體的記者，甚至開始重新反省記者的角色，思考如何幫助弱勢階層對抗社會的不公義。他以「進

入社會運動的狀態」來形容當時的心情：

到後半年，其實你慢慢已經進入到社會運動的狀態了，你就不會覺得主流媒體是一個好的實踐的地方……我說慢慢進入到社會運動的狀態是說，你慢慢愈來愈清楚，你想實踐的是什麼。

從《話題》到《苦勞網》，江一豪對社會階層壓迫與不平等的了解愈深，逐漸意識自己做為一個報導者的力量有限。相對於記者角色，他也看到社會運動的成效對於弱勢處境的直接幫助。兩種不同的實踐角色究竟該如何選擇？他在《苦勞網》採訪社運的兩次經驗，對於其將來的生涯規劃與記者角色定位影響深遠。

首次深入報導社會運動：東菱電子關廠抗爭

影響江一豪對自身實踐角色愈亦清晰的原因，是他在《苦勞網》的兩次採訪經驗。第一，是東菱電子關廠抗爭；第二，是在香港 WTO 抗議現場裡，看到南韓農民的抗爭場景。

2005 年，江一豪開始在《苦勞網》工作，準備了解東菱時，是東菱電子抗爭的第九年，已屆抗爭的尾聲。回溯東菱抗爭始末，起初是從 1996 年年底被資方惡意關廠，老闆積欠資遣費和退休金落跑後，員工開始以廠為家，駐廠抗爭。2005 年 2 月，由於東菱廠區被標售，法院因此開始指揮警方強制執行點交，驅離在廠區抗爭的東菱員工（中國時報，2005.08.18）。面臨警方步步逼近的驅逐行動，東菱員工決定要在廠內誓死抗爭，以汽油彈迎戰。

帶領東菱員工抗爭的林子文，當時向《苦勞網》秘書長孫窮理提及東菱抗爭，江一豪於是被指派前往採訪，一起參與他們和公權力對抗的最後半年。¹⁵這短短

¹⁵ 1996 年東菱電子公司遭資方惡意關廠，老闆積欠員工資遣費和退休金落跑，東菱員工遂駐廠為家，開始長達九年的抗爭。直到 2005 年 2 月，東菱廠區以三億七千萬元標出，法院開始進行點交，引發東菱員工激烈抗爭。同年 8 月，經過民代偕同互助會成員與拍定人代表律師多次協商，最後決定由拍定人支付二千萬元拆遷補償金給 23 戶互助會成員，解決東菱電子廠長達九年的抗

半年的採訪經驗，對江一豪的影響卻相當深遠。

那是我第一次以相對比較長的時間參與一場抗爭，而且，如果說記者作為一個（按：社會實踐的）工具的話，我覺得東菱對我來講是一個最完整的實踐。

那是江一豪第一次深入參與社會運動的抗爭和組織。他看著帶領東菱電子抗爭的林子文，在警方強制驅離前，率領極少的人力，把工廠內僅存的鐵架、鐵片集結起來，用高溫焊成層層疊疊的屏障，將工廠變成一座小小的碉堡，以抵抗即將面臨的公權力入侵。當然，這也是江一豪第一次親眼看到，那一顆顆準備就緒的汽油彈（江一豪，2009）。

當東菱員工與警方抗爭的態勢一觸即發之際，身為「記者」的江一豪思索自己能做什麼事。那時的他，習慣性地選擇扛起攝影機採訪，用影像、用文字記錄東菱的抗爭過程，完成「關廠抗爭紀念冊（東菱電子 1996-2005）」。¹⁶他以為，那是當時自己唯一有能力做的事情。

我那時候我唯一能做的事情，我自己衡量啦，就是我幫他們拍照，跟採訪，做一個抗爭紀念冊，有張貼在《苦勞網》上。就是每一個人在他的工作現場…回到他當初的工作現場去拍照，然後採訪這樣子。

江一豪回憶，他的目的是要將這些紀錄當作是東菱員工跟社會對話的空間和武器，並且的確達到了某些效果。

爭（中國時報，2005.08.18）。

¹⁶ 參見 <http://blogger.chinatimes.com/laborpower/gallery/3797.html>

就是…法官在…真正兩邊要對決之前，有來找他們談。然後員工就很激動啊，就說你要主持公道呀…我們九年來怎麼樣…。然後法官就說，不要講，你們的故事我在《苦勞網》都看到了。那時候真的是讓東菱也好，讓我也好，意識到說…我們的東西是有用的。不管他看到是什麼感覺，可是…有被看見。如果說記者真的有幫上什麼忙，我覺得是那次的經驗。

這是當時江一豪以為自己唯一有能力做的事情，而且也真的達到效果。但是，一旁扛著攝影機的江一豪，也同時看到一樣待在抗爭現場的林子文，看著他如何在工廠外圍架屏障抵抗警力入侵、甚至準備汽油彈，真正地、實際地和東菱員工站在一起。江一豪說，他事後感到非常後悔，他其實也應該一起「撘下去」、一起幫忙抗爭。

其實還滿後悔…東菱那個時候我是站在旁邊拿攝影機的，對，那，為什麼？因為那時候我以為我只會那樣，我只會做那件事情。我滿後悔那個時候我沒有幫上任何一點忙。

但如果當時跳下去和東菱員工一起抵抗警方的強制驅逐，是否會違背記者該謹守的報導分際呢？沒有受過體制內記者養成教育的江一豪承認，他無法只是站在抗爭外面，他很容易就跳進去，不然，就是覺得不舒服，懊悔自己只是一個拿著攝影機的角色，如同自己事後的後悔。

東菱抗爭的最後，汽油彈並沒有被點燃。反而是經過多次協商後，得標的新資方同意支付二千萬的拆遷費，補償東菱員工互助會成員的損失，長達九年的抗爭行動才宣告落幕。

東菱抗爭儘管已經結束，但這段經驗對江一豪的影響仍然持續。

江一豪不僅在事後懊惱自己只是個報導者的身分，因為他所熟悉的文字和攝影，對於抗爭的實際幫助太有限。另一方面，他也察覺到自己對於藍領工人語言的不熟悉。

我在採訪東菱的過程中，發現其實我能幫的上的忙很有限，另外一個是他們在講某些東西的時候，我其實…有些部分是似懂非懂……而且那些東西你混不過去。作者有時候…報導者或是記者…很多時候其實可以混的過去。例如說他用比較不精確的數據、用比較含糊的字眼，用比較模稜兩可的立場，透過文字的修飾，混過去，是沒有問題的。可是，東菱那一次經驗是，有些東西不知道，我如果不再深入一點，那是你混不過去的東西。

想要為工人發聲、為工人做點事的江一豪，第一次發現到自己聽不懂藍領工人們說的話。他原本以為當記者後，能夠以一篇篇的報導揭露社會的不公平不正義，藉以改善社會底層的弱勢情況。但經過東菱抗爭的採訪經驗，江一豪開始意識到，真正有效幫助弱勢階層的方式，可能是社會運動，而不是記者。

被南韓農民的抗爭鼓舞

2005 年的東菱抗爭讓江一豪開始感受到社會運動的能量，同年，他在採訪香港 WTO 部長會議時看到的南韓農民抗爭場景，更擴大了他對於社會運動的視野和想像。

2005 年 12 月，江一豪隨著《苦勞網》的部分成員前往香港，和世界各地的民間、社運團體，一起抗議 WTO 部長會議。那一個禮拜的行程，擴展了他對於社會運動的視野。最讓江一豪印象深刻的，是南韓農民展現出的行動力和紀律，他們甚至能夠使媒體轉而用同情的角度報導。他因此發現，社會運動其實也是一

種創作，一個操作成功的社會運動，更能夠影響社會觀感和媒體報導。



（資料來源：《東方日報》，2005.12.17。提供／江一豪）

這兩次的採訪經驗，使江一豪對於社會運動的瞭解更為深入，同時也明瞭自己的不足之處。從香港回台後，他因此向《苦勞網》提辭呈。

離開的原因是兩個，第一個是這邊的經濟條件實在是…我沒有辦法。另外一個部分是，我覺得《苦勞網》沒有辦法滿足我。就是說…我覺得一直到《苦勞網》之前，我的工作…兩年八個月的時間裡面，我都在採訪別人，透過採訪別人的方式，去建構出我所看到、我所理解的世界，但我覺得這樣的認識方法是有問題的。也就是說我都是站在旁邊看。那…對於，我這樣子個性的人來講，我覺得這樣子的認識有一個問題在就是說，我覺得我看到的東西是很侷限的。

一方面是身為記者的職責，江一豪自認這樣的侷限，使他無法提供讀者充分且全面的資訊；另一方面是他對於記者的專業價值產生懷疑。因為，雖然他能夠透過報導呈現、分析事實，然而，一個「看門狗」的記者角色對政府的監督成效、對社會不平等的改變程度仍屬有限。他自省，「如果我還可以做些其他的事情，那麼為什麼要站在旁邊等著結果出來，然後為他們歡呼，或收屍？」（江一豪，

2008)」

從旁觀者的記者角色走向社運參與者的第一步，江一豪選擇投入勞工生活，補足他對藍領勞動世界的陌生。

我要去當搬家工人

物理距離上的高低、遠近，使每個人看到的景色有所不同，但你可以選擇爬高一點，或是走近一些，也許就能夠看到和別人相同的風景。然而，社會階層的上下分野，藍白領階級的勞動懸殊，若非親身經歷上下來回擺盪一趟，人們或許才會知道，富有和貧窮、辦公室和工地，這兩種不同世界的差距有多大。

而當江一豪明白自己看到的，是一個充滿侷限和陌生的藍領階級世界時，他認為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是把自己也變成勞工，親身處在那樣的世界裡。而補足自己對於藍領階級的陌生之後，才能談下一步更重要的社會實踐——社會運動。

所以…最好的方法，對當時的我最好的方法是，我得再靠近一點，
靠到最近的方式是你成為一個你所觀看的人嘛，那…我觀看的人是
誰？很大的一部分是，我所不熟悉的，藍領階級的勞動，就是做苦
力的啦。對…就是賺這種勞力錢的。

於是，2006年1月11日，他放下攝影機，離開辦公桌，成為康福搬家公司的搬家工人。

「體力都是鍛鍊出來。」江一豪說。雖然現在對搬家工作已經能得心應手，但回憶自己如何適應這樣的生活時，他很坦白地承認：「前兩個禮拜還滿好玩的，很新鮮啦，新鮮加緊張，然後，擔心也有。就是那種好奇的感覺，快樂的、害怕的，蓋過了身體的累。兩個禮拜之後你就覺得…啊…有點累了，然後，精神也累…身體也累。」

慢慢地，他一個月撐過一個月，沒什麼訣竅，什麼事情都「硬幹」、「硬上」。原本以為自己不可能搬得動冰箱；幾個月後，他也能夠扛著冰箱走下樓。

工作上的逐漸融入後，他也不忘當初欲了解勞動生活的初衷。江一豪親身體驗，「關於一個資方如何站在絕對優勢…去壓榨、或是從工人身上拿到他的血汗錢。」他在康福搬家公司的體制裡看到，資方是用什麼方式去壓榨工人，而工人又是處在何種規訓空間裡。

江一豪描述那個被規訓的空間：

從那個空間裡面你就可以看得到，你一進去公司，要排班要先按指紋鑑識的電腦，然後，老闆跟你說話的方式，還有你進去休息室的牆壁，全都是提醒你要繳什麼費用，然後誰誰誰沒繳錢要罰，全部都是規訓的空間。整個空間是被規訓的，那工人屬於規訓的對象，這是清楚的。從你的工作空間裡面，不管從休息室、到車上、到回家路程，那都是清楚的。

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資方利用靠行制度，掌握對員工的利潤分配。

由於靠行制度，品牌公司壟斷了客源及宣傳途徑，即使師傅掌握了所有的生產工具——車子、技術、與身體，卻須全盤服從老闆訂下的利潤分配方式；接著還有各種不合理的管理規則，小至制服、貨車廣告樣式的吹毛求疵，大至禁止員工透過公司外管道接工作，即使是幫親朋好友搬家，也可以「私趟」為名對員工開罰，甚至在貨車上加裝 GPS 以控制師傅行蹤（自由時報，2009.7.21）。

作為第一線的搬家工人，江一豪深刻體會搬家靠行制度的不公。不公平的遊

戲規則因而導致勞資關係不平等，使工人無奈處於被規訓與剝削的一方。

無法妥協報導原則而離開《蘋果日報》

經由搬家工作的歷練，江一豪對工人的處境和語言愈益了解。他在藍領階級的勞動生活裡看到靠行制度所造成的不對等勞資關係，在工作的過程中也愈來愈融入和其他工人的互動。但是，儘管江一豪已經一步步地朝向社會運動的路途邁進，他和記者角色的緣分，並沒有因此漸行漸遠。2007年1月，經由朋友的引介，他重拾全職記者身分，負責《蘋果日報》「人間異語」版的採訪。

這是他第一次到如此大間的媒體工作（相對於《話題》），享有較為優沃的薪資，而這些正是人們對於記者工作的「正常」想像。然而，江一豪在《蘋果日報》只待了兩個月，比他最初預期的半年還短。

其實，一開始同意去《蘋果日報》的原因，也是基於江一豪對於採訪小人物的熱情。他以為，「人間異語」採訪個案的形式，能夠讓他透過文字報導，揭露出小人物眼睛裡看到的世界，使社會更知道他們的處境。然而這樣的想像卻在每次提案的編採會議裡，被徹底打破。

每次編採會議……一直在明示暗示說，你可能要多去跑一些跟情慾有關的，或是說像有些人喜歡去偷女生內褲，所以如果能夠採訪到這種不知道該多好？那我的抵抗就是，反正我就是交不出那樣的東西，你要打槍你家的事，我就一直提我的東西。……現在回過頭來想，在《蘋果日報》得到最大的成就是，我從來沒有一篇去屈服在他們的要求之下所完成的。

因此，在《蘋果日報》的日子裡，他不管主管的要求，仍然維持自己原先想要報導小人物的初衷，寫出一篇篇的個案訪談。如下表所見，江一豪的報導主題

不僅包括那些被社會歧視或誤解的精神病患、酒癮患者與吸毒者，他也深入追究並揭露許多社會議題，例如緬甸華人來台灣的居留問題、非法外勞的心聲，甚至還採訪了廖敏雄，談過去那段打假球的日子。而「人間異語」的採訪主題，大半是情慾主題，例如性事、男女關係、夫妻關係等。透過以下兩表的對照，可看出江一豪與「蘋果」對於報導主題的認知，漸行漸遠。

江一豪於「人間異語」撰寫的新聞主題

日期	標題	訪問對象
2007.1.16	我活下去目的只剩喝酒	酒癮患者
2007.1.22	爲別人打球 我很不快樂	棒球員
2007.1.31	教改永遠打不死南陽街	高中補教業者
2007.2.3	老男人疼我 小男人亂摸我	茶室小姐
2007.2.8	最怕孩子知道我是毒蟲	毒癮患者
2007.2.10	太太如巨人 我卻如小草	家暴丈夫
2007.2.14	想在台灣出人頭地 原來是一場夢	緬甸華僑
2007.2.17	愈說我們不正常 我們病愈重	精神病患
2007.3.1	變非法外勞 反而賺更多	非法外勞
2007.3.3	很多病人冤死在加護病房	加護病房護士

（資料來源：《蘋果日報》「人間異語」網頁）

» 人間異語：不知性事 誤了乖女孩一生	(2010-01-20)
» 人間異語：想靠簽賭一夕致富 門都沒有	(2010-01-19)
» 人間異語：第三者變元配 我當情婦折磨她	(2010-01-18)
» 人間異語：只看收入尺寸 女人才物化男人	(2010-01-16)
» 人間異語：偷走的死人錢 終究要歸還	(2010-01-15)
» 人間異語：對老公好點 風流成性終回頭	(2010-01-14)
» 人間異語：做愛像決鬥 棋逢對手才精采	(2010-01-13)
» 人間異語：醫德先擺一邊 賺錢比較重要	(2010-01-12)
» 人間異語：雜交人生 享樂主義當道	(2010-01-11)
» 人間異語：男友帶野花出遊 自己當狗仔抓姦	(2010-01-09)
» 人間異語：乖乖女留學大解放 就想使壞	(2010-01-08)
» 人間異語：上百男人用性愛豐富我人生	(2010-01-07)

（翻攝自《蘋果日報》網頁）

最後，江一豪與《蘋果日報》的僱傭關係，只維持了兩個月。

有一天，小主管就說要找我談一下。我比他還乾脆，我說…真的沒差，有什麼話就直講，如果是關於工作…是不適任的，你就直接趕快講，因為我也不想耽誤你們。那個主管就說，好那我就直講。

（笑）其實還不錯耶，氣氛還不錯，因為我早就知道那邊有侷限了，你感覺得出來的，一次兩次三次，就知道不行的，不行就是不行。

他沒有改變的空間，我也很清楚地知道我沒有改變的空間，那大家何不好聚好散。

江一豪在《蘋果日報》只待了兩個月，但是他和《苦勞網》的聯繫仍舊持續。雖然江一豪在 2006 年年底離開《苦勞網》，以搬家工人維生；但仍然無償提供《苦

勞網》稿件，是《苦勞網》的無給職特約記者。比較自己在這兩個媒體裡的工作經驗，江一豪認為，唯一的差異，就是物質與精神的不同滿足。

他們提供給你的東西都差不多，唯一的差異我覺得，**一個是物質上的相對滿足，另外一個是精神上的相對滿足。**《蘋果》給你比較多物質上的滿足，他一個月就給你四五萬，那《苦勞網》一個月一萬五，可是他給你幾乎完整的採訪權利，但也不是說你要採訪什麼就採訪什麼。《苦勞網》一個最大的收穫是，我們在設定議題的時候會有一些時間的討論。……《苦勞網》的夥伴都是我在社運、或是在一些議題上的前輩。他們可以提供我非常多的指導和指證，對於事情的認識，那這是在《苦勞網》的價值。我覺得最大差異是在這裡。

這些物質與精神的不同滿足也和他對記者工作的理念相關。此時的江一豪，已不單純地把新聞工作視為經濟來源的取得手段，他是一個將報導與社會改革連繫在一起的鼓吹型記者。而這樣的理念，顯然不容於以營利至上的商業媒體，但他卻在公民媒體《苦勞網》找到實踐報導理念的舞台。

離開《蘋果日報》後，江一豪不僅繼續在《苦勞網》擔任特約記者，他也「重操舊業」當起搬家工人，將收入所得做為日後獨力採訪、報導的基礎。

以搬家工人的角色重新出發後，這一次，江一豪不僅只是體驗藍領階級的勞動，他想反轉過去被剝削和規訓的處境，創造工人當家的另一種可能。2007年6月，他和幾位搬家工人以「勞動合作社」的形式，成立「群力搬家」。他們擺脫資方不合理的利潤分配與管理方式，老闆和員工之間不再有分野，每個工人都是「頭家」。

換言之，透過「群力搬家」的勞動合作社形式，目前江一豪是以跑單幫接案

的方式工作，收入所得不再像過去一樣被老闆抽成，而是平均分配盈餘給每個人。如此一來，不但工人的所得提高，還能回饋消費者更優惠的價格（陳思穎，2010）。

當記者面對社會不公義的事情發生時，能夠做到的事情是揭露。離開蘋果日報，換上汗衫又開始搬家後，江一豪反而能以工人之姿開創搬家勞動合作社的新體制，具體地從事社會實踐。而他也將在三鶯部落裡實踐其對於「對立者」、「鼓吹者」新聞意理的理念。

不只是記者：參與三鶯部落社運

2008 年 2 月，台北縣政府將第七次強制拆遷三鶯部落，卻是江一豪第一次踏上三鶯這片土地。從認識第一位部落居民潘金花開始，隔了三天之後，他眼睜睜地看著潘金花的房子被怪手無情地拆除，也看到警力的團團包圍，以及一旁無助呼喊的民眾。這樣的場景彷彿似曾相似，兩年前採訪東菱抗爭時，他也同樣看到員工如何死守廠房，還有公權力的步步逼近。

那年採訪東菱時的感動依舊，然而這一次，他不再是當年那個只站在民眾旁，拿攝影機的記者江一豪；他不僅寫報導還加入抵抗的行列，成為三鶯部落的自救會顧問，彌補了當年在東菱時的遺憾。

而這一切的起點，他仍然是先從一個紀錄者的角色開始。江一豪聲援三鶯部落的第一步，是幫忙撿地上的木材鐵片，然後再一邊寫報導，一邊和居民一起整理家園（江一豪，2008）。

拆了，我還是要回來(下)「人跟土地的故事之一」

4、在三鶯部落遭徹底拆除後的2/29那天，我跟幾個關心此事的友人在部落附近行走，尋找族人所說的，同樣位在「行水區」的各式建物。我們發現，在這片30年來未曾遭波臣造訪過的，被政府主觀逕行認定的「行水區... [閱讀全文](#)

2008-04-11 19:59 | 作者：江一豪 | 分類：人跟土地的故事 | 迴響：0 | 點閱：3808

拆了，我還是要回來(中)「人與土地的故事之一」

3、我是帶著些許訝異地發現，存在於我們交談間的語言居然是道道地地的台語，也從未想到台語「凍露水」一詞居然是透過一位阿美族原住民——潘阿姨的口中習得：我問她怎麼看待這幾十年來從台東原鄉一路遷移到台北縣... [閱讀全文](#)

2008-04-10 17:32 | 作者：江一豪 | 分類：人跟土地的故事 | 迴響：1 | 點閱：16682

拆了，我還是要回來(上)「人跟土地的故事之一」

0、從我認識潘阿姨(巴奈，漢名潘金花)，到親眼看著她們家被拆掉，才短短不到三天的時間。
1、「原住民需要尊嚴 而非被縣政府無照程序，亂張貼拆除公告急迫 擄民，擄民，擄民 原住民非獵物、... [閱讀全文](#)

2008-04-09 15:21 | 作者：江一豪 | 分類：人跟土地的故事 | 迴響：1 | 點閱：3522

(翻攝自江一豪部落格《生活，就是抗爭》)

2008年4月，江一豪針對這次拆除行動，完成《拆了，我還是要回來（上）（中）（下）》的新聞報導，並且思索自己還能做什麼。

大概寫東西作為一種實踐對我來講，還是一樣，一種工具一種手段。基本上我已經做過了，我並不是說以後就不做，因為我現在缺的是……我怎麼透過組織人的方式做事情。所以我會覺得，我得好好…趕快把這件事情學好，把這件事情做好。那將來再回過頭來，用寫字作為一種手段和策略的時候，我反而會更豐富吧。

於是，江一豪把東菱電子關廠工人寫下的「抗爭到底」布條帶到三鶯部落，並且一磚一瓦地幫忙居民重建家園。他費盡心力地組織居民，鼓勵他們勇敢地捍衛自己生存的土地。不熟悉抗爭策略的他，也請教許多社運人士的意見，如簡錫堦、鄭村棋等人。其中，和鄭村棋的一番談話對江一豪而言，有如當頭棒喝：

鄭村棋的建議最有趣，我跟他談話，不到十分鐘就結束了。他說，

「你沒有做（按：三鶯社運的）分析？」我就跟他講抗爭的正當性。他就說，「你不要跟我講這些啦！你有沒有去做分析？他們的利益在哪裡……去做再回來找我。你帶人家抗爭，你要負責任。」

鄭村棋對於抗爭分析的重視促使江一豪了解，他必須去分析三鶯抗爭的成敗、抗爭對三鶯住民的利弊得失，以及居民掌握的抗爭籌碼。因為單靠熱血和衝動，是無法承擔抗爭的責任和重擔。

終於，半年多的努力過後，三鶯部落自救會順利成立，江一豪擔任自救會顧問的角色。2008 年 11 月 12 日，他們拿著「抗爭到底」的布條走往台北縣政府，第一次主動對外表達反迫遷的心聲。那天，也是江一豪第一次站在群眾最前線，他們一起以集體落髮的方式來抗議縣政府。

然而，當時前總統陳水扁被收押的新聞佔據各大新聞版面，三鶯部落的抗爭效果因此不如預期，縣政府更訂定 12 月 23 日將再次進行拆除。直到 12 月 19 日，江一豪選擇前進凱道，在拆除前夕做最後一搏。和江一豪素不相識的導演侯孝賢，了解三鶯議題之後，決定挺身而出，在凱道和居民一起落髮抗議。於是，當天的抗議才終於獲得媒體關注，19 日當天，台北縣政府宣布緩拆三鶯部落，拆遷的危機暫告解除。

三鶯部落的抗爭至今仍然持續，江一豪與部落居民的情感聯繫也變得更加穩固。但是江一豪坦承，一開始其實並不順利：「因為長期以來，他們所知道社會運作的方式，是政治人物在影響我們台灣這個社會，所以政治人物是有力人士，不可能是我。」因而，居民對他的認同和信任，是在經歷一次又一次的拆遷風波中建立。江一豪用實際成果向他們證明，自己的抗爭策略是對的。

在整個抗爭的利害上面，我這一套是對的。那我這一套是什麼，我這一套是告訴他們是，你得靠自己，你們靠自己的力量會是最大的

。那，我們一起的時候，你就會發現社會上有很多的「我們一起」，這個力量才是相對真正的顛仆不破。

並且，三鶯部落靠自己站起來的力量，也讓江一豪的報導作品和以前相比，變得更為生動，他甚至還組織居民一起來寫故事。¹⁷

以前我的作品在這個方寸之間，它可能是個小宇宙，你把你在這個世上看到的東西全部寫進去這個小宇宙裡面，它的完成……相對容易。可是我們現在的作品，從紙上變成到一塊土地上面，這上面有各式各樣的人：有男生有女生、有老的有年輕人、有比較窮一點的、有更窮的、有繳得起健保的、有繳不起健保的。我說的就是三鶯部落，你怎麼讓他們在一起做事情，**你的參與、你的作品變成那一塊土地。**

問他三鶯部落的現在的狀況如何？江一豪笑著回答：「還不錯，我也比較輕鬆一點了。」目前，部落在組織、抗爭、重建等事項已有完整的分工，族人守護家園的決心也更加堅定。當縣政府緩拆的承諾為三鶯部落帶來一絲曙光後，接下來，他們要一起讓太陽灑落在三鶯的土地上，也要共同捍衛其他都市原住民的居住權。

¹⁷ 《預知三鶯記事》系列文章參見：<http://blog.chinatimes.com/laborpower/category/3882.html>



（三鶯部落抗爭布條。攝影／郭珮君）

因此，2009 年 2 月，當桃園縣撒烏瓦知部落同樣面臨拆遷的危機時，江一豪率領三鶯部落的居民來聲援他們。撒烏瓦知部落接下「抗爭到底」的布條後，就像當初三鶯部落的抗爭行動一樣，他們以落髮明志，從縣政府走到行政院。

然而，2 月 20 日在行政院的抗議行動，卻是江一豪最直接挑戰法律的一次。由於江一豪等人沒有事先申請集會，他們一個個被警方抬離現場，江一豪也收到人生中的第一張傳票（江一豪，2009）。¹⁸同年 12 月，他被法院以「首謀非法集會不解散」罪，被判拘役 10 天，得易科新台幣 1 萬元（台灣立報，2009.12.07）。

19

遵守法律，是爲了維持社會的安定與和諧。但是，三鶯部落以及其他都市原住民的處境，似乎被遺忘在法律的保障範圍裡，所以江一豪選擇以抗爭的方式來維護都市原住民部落的「安定」與「和諧」。他的抗爭訴求不會因被判刑而改變，更不打算繳交任何罰金。

「或許等到哪一天，台灣的集會遊行法進步之後，才會知道其實我們的抗爭

¹⁸ 19 日在行政院的抗議活動結束後的隔天，桃園縣政府卻用怪手鏟平了撒烏瓦知部落，江一豪等人因此決定再次到行政院抗議。這次的行動由於沒有事先申請，警方以違反集會遊行法爲由，將江一豪等人抬離現場，並移送法辦。

¹⁹ 2009 年 12 月，法院以「首謀非法集會不解散」罪，判江一豪拘役 10 天，得易科罰金新台幣 1 萬元，緩刑 2 年（台灣立報，2009.12.27）。

是走在法律的前面。」江一豪接受《台灣立報》訪問時這麼說（台灣立報，2009.12.07）。

記者能從事的社會實踐有限

回顧江一豪一路從《話題》、《苦勞網》、《蘋果日報》，再到三鶯部落自救會顧問的歷程，他已經逐漸從記者身分，轉往社會運動的組織者角色。換言之，他不只是藉由報導傳達且分析事實、扮演第四權的監督角色；在三鶯，他的報導立場甚至是與公權力相互對立，而他實際參與三鶯抗爭的種種作為，亦彰顯其作為「對立者」記者角色的理念。

更確切地說，江一豪目前反而像是個社會運動者，他用報導（如：預知三鶯記事）來輔佐三鶯的抗爭行動，使更多人從他的文章裡認識那個在主流媒體裡看不到的三鶯部落。

而從他在《蘋果日報》的短暫工作經歷，也可看出「對立者」新聞專業理念在商業媒體裡的窒礙難行。當江一豪進一步從對立者的記者角色，逐漸走向社會運動的直接參與，不免讓人好奇，是否因為記者工作本身無法從事社會實踐，使他愈走愈偏離記者崗位？對此，江一豪的回答是，

記者有沒有可能有社會實踐？有的，但是他的社會實踐，你不要去期待一篇報導、兩篇報導，去改變什麼事情。有，可是那不是你馬上就能看得到的，而且會很慢，而且會改變到什麼東西你自己都不一定掌握得到，我覺得是如此。尤其後來你進入到整個媒體的運作、主流媒體的生態裡面，你大概也知道那個框架是非常非常的多的。甚至你某篇報導，你就注定會透過很多很多的報導…會讓它紅。就是，即便有影響，像水蜜桃阿嬤，恐怕都是包裝出來的。

記者工作的侷限使江一豪了解，自己想為弱勢發聲、為工人做點事的初衷，其實很難以報導的方式實現。尤其當他對弱勢處境的認識愈深後，江一豪明瞭，如果要讓處境弱勢的人覺醒，脫離目前的狀態，這樣的理想恐怕很難用記者這個身分去完成。但他認為，記者唯一能做的，就是「揭露」，使愈多人了解這件事情，並且了解得愈深刻。

因為記者，往往寫完東西以後就走了。而且，他寫的東西往往不會是他受訪者會看到的。例如，我在《話題》或是在《蘋果》寫的，我會採訪外勞，酒癮患者、毒癮患者，會採訪…各式各樣的所謂相對弱勢的人對不對。那這些弱勢的人往往在他的工作、在他的每天每天的生活裡面，就已經深陷其中不一定拔得出來了，其實他們是最沒有條件去看他自己被報導。

三鶯的組織抗爭經驗也讓他意識到：

所謂的泛稱為弱勢，或是被壓迫的這群人，他最需要的…有被報導出來，可是，我覺得，他們另一種需要的事情是，怎麼樣透過陪伴他們、進而參與他們，然後讓他們自己組織起來。也就說讓他們自己身上所存在的力量發揮出來，而不是說被結構壓得好像此人已無任何翻身的力量。其實有的，三鶯部落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藉由社會運動的引導，江一豪看著三鶯部落的居民從生澀的抗爭口號開始學起，從每一次剃頭落髮的抗議行動中堅定意志、抗爭到底。這樣成功的抗爭結果不僅讓三鶯部落的居民覺醒，也逐漸改變了江一豪對於記者角色的看法。他轉而

藉由社會運動的實踐，朝著社會改革的路途前進。

就是說，當初大學想當記者是自我實現比較多，就是，我只要當記者就好了，因為記者是一個人家還可以接受的工作，是我個人的累積跟成長很重要的一個工作，所以記者是目的。可是到後來的理解是，記者是一個手段。手段是可以隨時轉換的，當…你當記者可以去實踐某些部分的時候，你就去做；那當記者已經不能滿足你…你現在所想要實踐的社會改革的時候，你就換角色。所以，換成搬家工人。那當搬家工人已不足以…或是你遇到一些事情可以更往前推的時候，那就變了…變成三鶯部落的自救會顧問。對我會覺得，那這三個東西都是我不斷往前推進，不斷往社會改革推進的一個角色和位置。

傳聲筒與共謀者：鼓吹者意理的表徵

當江一豪的角色不斷轉換，隨著目標往前推進時，他的新聞寫作技巧也與從前不同。他曾在文章提及，因為喜歡採訪弱勢階層，總是透過各種方式引導，讓這些人得以發聲，一起和他完成每一次的報導（江一豪，2008）。因此，江一豪用「傳聲筒」和「共謀者」來形容他與採訪對象的關係：弱勢階層是和他一起寫報導的「共謀者」，自己則扮演「傳聲筒」的角色。

而他口中的「傳聲筒」和「共謀者」，其實正是新聞學理上的「鼓吹者」。「鼓吹者」型的專業意理主張記者應該扮演「為民喉舌，為民耳目」的角色，並且為公共利益獻身（李金銓，1988：45）。非新聞本科系畢業的江一豪，這種新聞操作手法的形成緣起，

我覺得所謂的共謀者很起初的原因是我自我保護，就是我承認我自己

知道的不多，我對我自己的寫作和對這個世界的理解沒把握、沒信心。我去訪問的對象每一個都比我年長，他的社會地位每一個都比我高，那即便是一個遊民，他所經歷的東西都比我多。所以，我這麼年輕的一個眼睛，我看不到所謂的…哪一個是對、哪一個是錯，甚至是我無法分辨哪個是善哪個是惡。

而且我很好說服我自己的一個道理就是說，基本上主流媒體或是媒體已經大量地被商業力量所用，你說那些商業力量或是資產階級，它有太多發聲的管道。那我這麼一個小小的管道，專門給弱勢者用，又何妨？

隨著採訪經驗的累積，以及他對社會運動的投入與認識愈深，江一豪表示，現在他的操作比較偏向另外一種共謀者，不再只是單純地為弱勢代言，而是會問得更深入、多元，甚至還會把他們從困境裡拉出來。

例如三鶯，那個就是另外一種共謀者。就是，我問問題的時候，我問，然後他答，他答之後我還要再問。但我這個問，有時候其實不只是為了報導。例如說，「那你…你除了在這邊哭之外…你還想過說要作一些什麼事情？」我覺得某種程度上，在三鶯操作裡面，我很成功地…從原來記者的身分，然後把他們拉出來，這是另外一種共謀者。過去好像就一味的…啊一看就知道是熱血青年在…。所以這樣的經驗，不知道是社會實踐是豐富了我的寫作？還是說因為寫作要求豐富了我看待他們的觀點。

從初出茅廬的熱血記者，經歷社會運動與搬家工人的歷練之後，江一豪回顧自己在報導上的轉變，他說，「在不同的階段裡面，那個傳聲筒的模樣，或傳聲

筒所說出來的話，有些差異。我覺得，好像深刻了一點點。」

記者不再是維生手段，而是傳達理念的方式

而江一豪之所以愈來愈能把傳聲筒的角色，扮演得更深刻、更真實，其實和他目前身為搬家工人和公民記者的雙重身分有關，和訪問對象的關係也變得更為親近。

當江一豪成為藍領工人的一員後，他覺得對採訪最大的幫助是在心理建設的部分。不再像過去採訪東菱時因為聽不懂他們的語言而覺得挫折；現在已經能夠對得上話，和他們的距離也不再那麼遙遠。

譬如說我採訪一些其他工人，就……覺得比較自然，不會覺得他們是我一個觀看，或是遙遠的對象。……因為距離，所以會有平等的、高的、低的，不一樣的眼光在看待彼此。那現在因為自己是搬家工人，我幾乎跟他們是一樣的，有這個身分，就會比較親切，那相對談的東西會比較深。

同時，當江一豪不再是主流媒體記者，而是《苦勞網》的一員，是無給職的特約記者、沒有媒體框架包袱的公民記者時，他認為，自己比以前更有機會與訪問對象建立私人情誼。

以我的經驗是，我在主流媒體確實是很難有機會去跟我的受訪者發生報導之外的關係。我覺得某種程度上是那種工作型態侷限了你對記者這個身分的認知跟功能。那為什麼《苦勞網》或公民記者可以？因為基本上，嗯，它基本上已經不是一個職業，而是比較接近一個志業或是事業。

親身經歷主流媒體與公民媒體的不同，江一豪認為，最大的差別不是薪水，最大的不同是對記者角色的看法、對社會實踐的付出。

在主流媒體，記者是他換取經濟的手段…我的頭路嘛。即便我當記者可能會有附加價值，或是說記者是我的理想的事業…不斷地累積，可是，這個還是在累積你自己。它是你得的手段，不管是名還是利。

我覺得公民記者的差異在於說，它是給的一個手段。就是說，公民記者本身就是目的，目的是什麼？它其實是給，我要給社會什麼？我要跟社會對話些什麼？。

因此，當江一豪完成三鶯部落的報導《拆了，我還是要再回來》之後，他想跟社會對話，想讓外界知道這樣的議題。

2008 年，爲了對外傳遞三鶯部落的聲音，經由媒體工作者伍崇韜的引介，江一豪因而獲邀在中時部落格的平台上成立個人部落格。

但他其實對於如何透過部落格營利並沒有太多野心，眼前對他最重要的，仍然是三鶯部落的抗爭。因此，江一豪只是單純地把部落格視為一個小小的傳聲筒，放入他撰寫的報導，使更多人關心三鶯，認識他筆下的那群弱勢族群。

2008 年 10 月，江一豪更以「人與土地的故事」系列報導入圍第七屆卓越新聞獎。三鶯部落的報導，正是他入圍作品的系列報導之一。他沒有提及太多的入圍喜悅，但從入圍名單可看到，擔任公民記者江一豪在其中顯得非常特別。

第七屆卓越新聞獎入圍名單

平面媒體類

新聞採訪報導獎

作品名稱	入圍者	單位
烏龍運動測速器和固定桿感應式線圈測速器真相大白	王瑞伶、彭淵燦、黃瑞典、彭芸芳、張念慈、賈寶楠、李青霖、蔡惠萍、白錫鏗、唐福春、柯珮君、葉英豪、陳永順、劉明岩、范榮達、熊適祺、許玉君、陳金松、唐秀麗	聯合報
台灣外來種	楊駿北	經典雜誌
人與土地的故事系列報導	江一豪	苦勞網
消失的糧食	莊素玉、汪文豪、辜樹仁、陳一嫻	天下雜誌
中國變了，台灣大逃亡	王文靜、呂國禎、尤子彥、楊少強	商業周刊

（翻攝自卓越新聞獎網頁）

不過，他當時滿腦子想的，不是得獎能帶來的榮耀；而是計畫領取獎金後，可以讓他在台灣四處行腳，告訴大家三鶯部落面臨的困境。但他也想好如果沒得獎的話，他會怎麼做。

我那時候有帶三鶯的朋友一起去頒獎典禮，我那時候想說，如果沒得獎，我就要用這個機會，去讓他們知道挫敗的感覺是什麼？我要用我自己挫敗的例子，去讓他們知道面對挫敗的時候應該是一個怎麼樣的方式，就是…再來就好。

頒獎典禮那天，是 2008 年 11 月 21 日，三鶯部落第一次對外抗爭的九天後。那次前往縣政府的抗議效果不如預期，作為抗爭指揮的江一豪，也很清楚抗爭的路途迢迢，甚至不太樂觀。

因為那個時候我的判斷是，三鶯抗爭失敗機率會很大，表象的失敗

啦。就是…我們走到總統府，結果還是被拆，這機會是有的。所以我會希望說，我那時候如果沒得獎，剛好是個機會教育是，我來安慰他們，啊…沒關係…笑一笑…跟我們的抗爭一樣，繼續拼就好了。

頒獎當天，三鶯部落的朋友陪同江一豪一起參加。結果揭曉，得知沒有得獎時，江一豪笑得比其他人都還要開朗。

儘管沒有得獎，但是江一豪能夠擠進卓越新聞獎的入圍窄門，對於未獲主流媒體資源挹注的公民記者，以及公民媒體影響力的擴大而言，已是一大肯定。

身為公民記者的江一豪，目前靠搬家賺取生活所需。現代的收入雖然比從前在主流媒體少，但他不以為意，笑答其實也還能夠用。對於公民記者的未來，江一豪認為，相較於主流媒體記者重視記者勞動權的保障，公民記者由於沒有特定雇主，面臨最大的挑戰是新聞自由的爭取。

那麼，是否必須以職業工會的形式，保障公民記者的採訪權利和勞動保障呢？江一豪認為，

所謂公民記者職業工會，它應該不會是在一個所謂勞動條件的保障上，因為我們沒有一定的雇主，所以我們團結起來我們沒有辦法去對抗我們的雇主。可是如果說你透過你的團結，去爭取更大的新聞自由，例如…某些新聞記者會的場合，他只認主流媒體，公民記者來他就不讓你進去。那這個我就覺得是組織工會的重要目的。我反而覺得，這個時候公民記者的團結不太會是勞動條件的保障，而是新聞自由的保障。對，如果你問我組工會的話，我會覺得該組，可是，到底組起來要幹嘛，我覺得這個是要討論。

關於所謂公民記者職業工會對於勞健保方面的訴求，江一豪認為，可以用「靠行」的方式，參加其他職業工會，一樣能夠達到這項目的。並且，一向資金困窘的《苦勞網》，也已經開始讓旗下記者享有勞保的保障。江一豪特別提及，《苦勞網》計畫未來將成立一個公基金，讓每一篇發表出的文字都有稿費。

然而物質和金錢，並不是江一豪最在乎的事。卸下主流媒體記者的身分，他反而在公民媒體裡、在社會運動中，開創出更多社會實踐的可能。

滿足於記者、搬家工人、抗爭組織者的身分

這些年來，如果說真的失去什麼？他比較擔心的是和家人相處的時間減少。他媽媽以前總是會念，「早知道你會去當搬家工人，就讓你讀到高中就好了！」不過，當他的作為陸陸續續被社會肯定時，他媽媽也逐漸肯定江一豪的選擇。而江一豪的爸爸更是始終如一地全力支持。

回顧自己退伍後的一連串過程，江一豪說：「**做讓你真正覺得，你就是一直想一直做下去的事情，應該是很幸福的。**」因此，不管是當記者、搬家工人，或者是抗爭的組織者，他都賣力地去做，而且也得到很大的收穫和成就感。

透過採訪的過程中，接觸到很多我當初認為社會改革的一些朋友，而且變成他們的朋友，變成有機會跟他們一起開會一起做事，我覺得這是我到目前為止，應該來講是最幸福，而且是最…很理想的一件事情。為什麼？因為當初社會運動者，或者說是社運人士、工運人士，他們在我眼中，基本上跟英雄是劃上等號的。現在有機會跟他們站在一起，我都覺得還滿榮幸的。

目前以搬家維生的江一豪，不以新聞專業作為經濟來源，並且將「對立者」新聞專業意理投入於三鶯抗爭的行動中，也讓他從記者變成社運組織者。而當三

鶯抗爭結束後，他又會扮演何種實踐角色？

江一豪預計，三鶯部落的運作大概在 2010 年年底上軌道之後，他不排除重新回到主流媒體。但他不會再到平面媒體當文字記者，而是選擇到廣播新聞台報新聞。

該這樣講，我對主流媒體的期待幾乎已經沒有了啦。那…第一個它最重要的功能變成混口飯吃，跟那個身分可以去了解一些社會的事情，不太可能變成一個戰鬥的位置，這是我的理解，跟我的想像。既然如此的話，我就找一個…我不用負擔那麼大的工作。我不是說工作量大，而是文字記者白紙黑字這樣的東西對我來講，我會很沉重地去為每一篇文字負責。那廣播或是電視……反正那種東西就是這樣，沒差。但是電子又太糟蹋了，所以不可能，別想。那廣播，反而就是這種種的考量之下，比較適合的一種我想像的記者。

無論未來他的新身分會是什麼，一如江一豪部落格的名稱「生活，就是抗爭」，他還是會繼續在抗爭的道路上走著，在每一個新的崗位上。

第二節 朱淑娟的職涯圖像

朱淑娟，1962 年出生於台北。一路以來的求學背景雖然都與新聞科系無關，不過她小時候也曾想過要當記者，但那時對記者工作尚無確切的想像與認識。直至 1986 年她從台灣科技大學工管系畢業後，考取《經濟日報》的工商記者，才實際與記者工作有了接觸。但後來因為困惑於工商記者的工作與拉廣告無異，最後選擇離開。

1988 年《聯合晚報》創刊，朱淑娟到《聯晚》的程式設計部門任職，爾後轉做行銷企劃。1998 年，她在《聯晚》剛好待滿十年，於是想辭職到日本讀書。不過，她也因為遞辭呈而被被社長黃年找去長談，在黃年一句「你去當記者看看！」，讓她決定以記者職務重新出發。於是，她從一開始的電子資訊線，亦步亦趨地學習如何當記者，成為一名傳達產品訊息給閱聽大眾的「資訊傳佈者」角色。然而兩年後，當她被主管派到環境線，才是真正形塑朱淑娟專業意理內涵的關鍵點。

八年的環境線歷練，她在監督政府的同時，體會記者與採訪對象的微妙互動，也必須按捺自身對環保團體與抗議居民的同情，仍舊以公允的態度寫報導。她故聲稱自己不是誰的代言人，只是盡力報導環境污染的真相，分析事實傳達給讀者。因此，在此時期，她抱持的專業意理已從「資訊傳佈者」轉向「解釋者」。

然而，2009 年，為了讓環境新聞有更多發聲的可能，她因此決定離開了《聯合報》；選擇以一個獨立記者的身分，在部落格重新開始。不用再聽命於主管，終能真正專業自主的她，仍然選擇與採訪對象保持一定距離。但是由於自己已經不再受限於版面限制與報社要求，在報導呈現上，她能夠讓每一方（不論是抗議團體或公部門官員）有充分發言的機會。是故，她也更能實踐其解釋者意理內涵，展現事件更多元的真實。

因此，本文的寫作重點著眼於朱淑娟一路走來從「資訊傳佈者」轉向「解釋

者」意理的歷程轉換，以及她如何透過獨立記者的身分實踐其對新聞專業理念。另一方面，成立部落格還不到一年，就獲得華文部落格「最佳訊息觀點」殊榮的朱淑娟，究竟是如何經營部落格、如何運用新聞專業接案維生，亦是本節故事敘述的焦點。

【朱淑娟的記者職涯歷程圖像】

朱淑娟，台北人，1962 年出生。2009 年，她爲了後龍科技園區開發案的採訪，隔了四十幾年的光景，才第一次回到身分證上登記的籍貫地——苗栗縣後龍鎮。這樣的因緣際會也一如她當記者的背景——十二年前在《聯合晚報》做程式設計時，原本打算辭職去日本讀書，卻被社長黃年建議當記者。於是，她從 36 歲開始學習如何當記者，同時也在 47 歲時離開《聯合報》，自立門戶成爲一位獨立媒體工作者。

雖然朱淑娟年過三十才當記者，然而，從小作文就很好的她，回憶起過去的追求學生涯，認爲自己想當記者的願望其實一直都存在……

當記者前在《聯晚》工作十年

自認從小很叛逆的朱淑娟，小時候並不喜歡念書。當她開始想好好念書時，因此努力地在技職升學系統裡一步步往上爬：從十信工商，台北商專二專夜間部，一路念到台灣科技大學二技部。1986 年，她從台灣科技大學工業管理企業管理組畢業。畢業那年，她看到《經濟日報》招考記者的訊息。

其實回想起來我應該很早就有想要當記者的意願。人生的經歷也很奇妙，後來就看到《經濟日報》在招記者，就去考，那是民國 75 年，大概 8 月初。然後考完的時候，我不知道那是工商記者，你現在知道什麼是工商記者嗎？那是《經濟日報》早期創的，工商記者就是……他是做廣告業務，可是我當時不知道耶，就進去裡面上班

。工作一段時間後，因為以前也沒念過新聞系，那我想說，原來記者是要拉廣告的；可是後來又覺得好像不是這樣，然後就做了大概一年多就離開。

維文及維舜喬遷 昨舉行酒會慶祝

【圖文：朱淑娟】

維文公司、維舜公司昨(十七)日在新址舉行喬遷慶祝酒會，由該公司董事長林文雄(中)、日本大精工業株式會社取締役社長藤田憲治(左)、日本凸板印刷株式會社常務取締役兼凸板商事副社長山田英夫(左二)、松大貿易公司董事長林錦松(右二)及台灣區藝品禮品輸出業同業公會理事長翁肇喜(右)共同主持剪綵儀式。

維文公司為禮品、珠寶、文具等產品的貿易商，行銷網遍及世界各地，此次遷址乃順應業務擴展所需。維文公司新址在民生東路五九八號十二樓，電話七一一三五六七九號。(圖文：朱淑娟)

【1987-04-18/經濟日報/07版/】

(翻攝自聯合知識庫)

1988 年，《聯合晚報》創刊，具有工業管理專業背景的朱淑娟，熟悉程式設計。所以她的第二份報社工作，仍然不是文字記者，而是電腦程式設計。她笑說：「所以我現在其實應該是在竹科上班，賺很多錢的那種，我同學事實上都是這樣，都是那種科技新貴呀，一個月可以賺十幾二十萬，年底還有股利那種。」

後來，她申請留職停薪到美國西雅圖短期進修半年，讀語言學校，四處走走看看。1994 年回台灣後，她一樣在《聯晚》工作，但不再繼續待在程式設計部門，而是做行銷企劃。這樣的工作形態一直到 1998 年開始有了轉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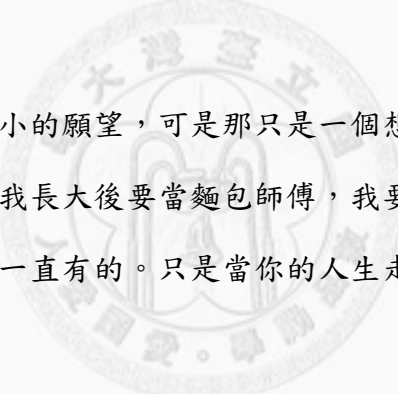
1998 年 9 月吧，就跟報社說我要辭職，因為想要去日本，念那種短暫的課程。人生到一個階段你老是做那個工作，心情就很黯淡，覺得一個工作大概到了一個不能再成長的階段，就覺得應該要換工作。雖然那也不是唯一的方法，但會是一個可以讓你看到不同東西的途徑。所以我就是覺得要這樣，以前也比較勇於去…這樣。

黃年建議：「那你去當記者看看！」

想要換跑道轉換心情的朱淑娟，因此準備跟《聯晚》社長黃年提辭呈。黃年問朱淑娟：「辭職後有什麼規畫嗎？」她也坦白回覆：「也沒有明確的計畫，就覺得好像應該要換工作。」黃年於是建議：「那你去當記者看看！」那年，朱淑娟36歲。

人生的際遇總是難料。朱淑娟最早在《經濟日報》當了一年多的記者，卻只是個拉廣告的角色。然後，當她想要離開《聯晚》時，卻也在此時獲得記者的職務。

回顧過往，早在決定去考《經濟日報》時，她就有想過要當記者了。但那只是小時候的願望，沒有確切思考自己想當什麼類型的記者。



當記者，其實是從小的願望，可是那只是一個想像的願望。可能我們小時候都想說，我長大後要當麵包師傅，我要開什麼餐廳呀…對，回想起來應該是一直有的。只是當你的人生走到一個不同的方向，你就會遺忘。

社長黃年的建議，好像也讓她重新回憶起小時候的願望。也因為去日本也沒有什麼真正的計畫，所以朱淑娟就這樣當了記者。

朱淑娟提及，後來她問黃年，為什麼要叫她當記者。她才知道，原來之前自己在《聯合報》系內部刊物寫過一些文章，碰巧被黃年看到，黃年因此覺得她有當記者的潛力。回憶社長黃年的提拔，朱淑娟很感恩：「我覺得以後我有什麼小小成就一定要感謝他。」

當時不僅是黃年，《聯合報》社長王文杉也對朱淑娟很好，他甚至直接問朱淑娟：「你要去哪一報？」、「要跑什麼線？」之後朱淑娟回覆王文杉，她想去《聯合報》工作，而她的電腦還不錯，所以想採訪電子資訊線。

回憶這段初入行的過程，朱淑娟笑著說：「怎麼會有這麼好的老闆！」然而，真正開始跑新聞之後，挑戰也隨之而來。

隔行如隔山

1998 年，當時已經 36 歲的朱淑娟，從頭學起如何當記者。她坦承，「隔行真的如隔山，真的完全是一個外行人在跑新聞，尤其又有點年紀了。」但是因為她對電腦很熟，至少還具備採訪電子資訊所需的基本專業知識。至於要怎麼採訪新聞，朱淑娟認為，這是一種歷練的過程，新聞要真正入門並不容易。

隔年《聯合新聞網》開始上線，王文杉希望朱淑娟可以去那邊幫忙。但朱淑娟不願中斷正在學習的採訪工作，期盼自己至少要做出一些成績，因此婉拒了老闆的要求，就這麼繼續在電子資訊線待了一年多，累積了一篇篇的報導和採訪經驗。



(資料來源：《聯合報》，1999.12.4)

2000 年 12 月，採訪組組長和朱淑娟說，「你去跑環保署。」他的理由是，「一

個記者如果沒有經歷過公家機構的採訪經驗，你其實不算當過記者。」於是，朱淑娟離開已經熟悉的電子資訊線，轉換路線到環保署、到公家機構採訪。自此之後，她在《聯合報》當了九年的環保記者，直到離開報社。

採訪公家機構體會到新聞的衝突性

就像當初組長告訴朱淑娟的那番話，跑了環保線之後，她在與公家機構地斡旋中快速成長，真正體會到新聞的衝突性。「**衝突性包括新聞跟人性，以及你要如何處理那樣的新聞，因為你一定挑戰到政策，**」朱淑娟說。

衝突性，是她在轉線後碰到的挑戰。這和之前跑電子資訊的新聞處理大不相同：

以前跑電子產品，它的新聞邏輯就是這樣：有人會發採訪通知到你 email，就說下午兩點在某飯店什麼廳，有什麼產品發表會，基本上就是這樣子。事實上經濟組跑企業的記者，現在的模式還是這樣。所以你基本上的工作就是，它有記者會通知，然後你去採訪，然後看它有什麼新聞。當然也是需要專業啦，可是基本上你不會涉及太多新聞倫理跟新聞倫理的衝突，就很單純。**可是你真正跑公家機構時，那個衝突性就出來了。所以，所有的…有關新聞工作的學習，應該是從那段時間開始。**

也就是說，朱淑娟跑電子資訊線時，是一位「資訊傳佈者」的角色，依賴消息來源（例如：企業公關）的消息提供，將產品訊息傳達給閱聽人。

然而，當她改跑環保署之後，她的採訪對象不再是電子產品公關，反而從商業領域轉往公部門。記者的監督角色較以往明確，因此也不只是像以前單純地傳遞訊息，反而常常遇到複雜的情況，而這些衝突多半和人性有關。朱淑娟解釋，她最常遇到的狀況就是——「我到底要跟採訪對象建立什麼關係？」

事實上記者的角色是監督他，可是我每天又要跟他來往，所以無形中就會有私人的感情。那當他出事的時候，我要怎麼辦？要怎麼寫？這是人性衝突。另外一個是說，當然我也可以選擇，毫無感情地把他批得亂七八糟。他做錯事啊，我可以寫嘛，照實寫，照實罵。可是隔天要去看他喔，甚至他還是一個重要的新聞來源，因為記者有報社新聞的壓力。所以，當記者還是要跟這些人來往的時候，那我下筆要下到什麼程度？

朱淑娟回憶黃年社長曾講過的話，「你要寫到喔，你把那個部長在報紙上罵得唏哩嘩啦；可是隔天當你走到部長室的時候，他還會跟你說，淑娟你好啊進來坐。就咬牙切齒還會跟你打招呼，那你就成功了。」

朱淑娟認為，這是身為記者面臨最大的難處，因為記者也是人，也有私人感情。如果因此受到羈絆，就沒有辦法替民眾確實地監督政府；但如果不留情面地照實猛批，記者不僅是和採訪對象的關係破裂，原本緊密聯繫的新聞線索也嘎然中止。

在新聞專業意理上，改跑環境線之後，朱淑娟的態度是要扮演一個「看門狗」的角色，以監督政府為職責，即學理上的「解釋者」。換言之，她採訪公家機關後面對從前未曾經歷的角色衝突，不僅讓她褪去「資訊傳佈者」的客觀外衣，也在不斷的衝擊和適應中學習如何當一位記者，以及，要當一位什麼樣的記者。

轉換環境線，填補環境知識的空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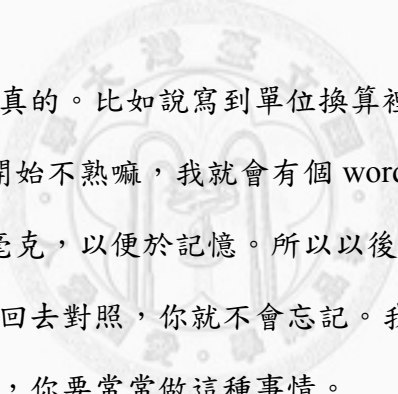
另一項朱淑娟面臨的挑戰，是採訪環境新聞所需的背景知識。她笑稱這和以前自己所學的工業管理毫不相干，甚至是完全相反。她說，「以前我受到的訓練是那種崇尚科技的。打個比方好了，我們工程師最大的夢想就是把那個玉山打

通，玉山打通後，然後有一條高速公路連接全世界，這就是工程師的夢想。」

但如今，她好像變成守護玉山的那一方。

環境的知識是艱澀難懂的。朱淑娟從各種污染的組成開始學起，包括了空氣、水、廢棄物、土壤，以及石化物，每一項都是專業，熟悉每一種污染都必須付出許多努力。因此她認為，「當一個環境記者真的要很認真，認真包括你要常常去涉及相關的知識，那涉及有很多管道，第一個就是要常常跟專業人士請教，然後常常去聽會議，拿研究報告回來讀。」

不管是聽環評會議或是看研究報告，環境記者總是會看到許多的數據，這當中又牽涉到複雜的單位換算。她說，除了認真地寫下來記起來，其實並沒有什麼訣竅。



我覺得自己還滿認真的。比如說寫到單位換算裡的毫克 mg，你第一次看到 mg，剛開始不熟嘛，我就會有個 word 檔，就把它寫下來：mg 是什麼？毫克，以便於記憶。所以以後當你這樣寫寫寫，寫很多次之後，再回去對照，你就不會忘記。我就常常看到環境記者其實單位都寫錯，你要常常做這種事情。

就這樣，她一步步地累積基本概念，充實專業知識。朱淑娟用「書架」來比喻這段過程：「基本概念就好像是你要去買一個書架，這是概念嘛，你把書架拿回來了，那你到底能夠把書架的書填多滿，那就是你的知識，就要靠很多你以後的努力。」

因為努力之後，機會來的時候自己才能接得住，接得漂亮。

揭露阿瑪斯號內幕，體會記者監督角色的兩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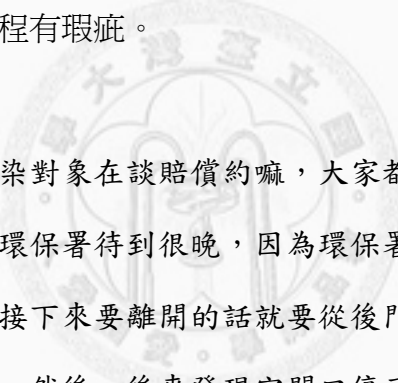
當初被組長調去環境線、採訪環保署的朱淑娟，不過是個只有一年多採訪經驗的記者。朱淑娟提及報社之所以敢讓她去跑環保署的原因，是因為在那個時間

點，相對於其他新聞，環境新聞是比較單純而且能見度也較低。環保署又是一個冷部會，報社覺得她大概也漏不掉什麼大新聞。

2001 年 1 月 14 日，朱淑娟採訪環境線才剛過一個月，就遇見了阿瑪斯號擱淺漏油事件，讓環境新聞變成頭版頭條，而這也是她當記者以來第一次採訪的大新聞。「一方面是運氣，一方面是自己有去注意跟經營，」朱淑娟感恩地說。

那時，阿瑪斯號在墾丁龍坑海域擱淺，造成大量油污外洩，汙染附近的沙灘和海洋生態保護區，是台灣二十多年來第二大嚴重的貨船洩油事件。但環保署在事件初期的處理卻有延誤，因此遭受各方指責（聯合報，2001.02.04）。朱淑娟當時也一起報導這起事件，直指環保署的處理延宕。

除了批評相關單位清理油污的速度緩慢之外，朱淑娟也獨家揭露政府跟阿瑪斯號船公司談判求償的過程有瑕疵。



那時候環保署跟汙染對象在談賠償約嘛，大家都在等這個獨家。然後呢，我有一天在環保署待到很晚，因為環保署基本上是晚上六點就把鐵門拉下來，接下來要離開的話就要從後門。我那天就發現為什麼大門沒拉下來，然後，後來發現它門口停了一輛像公家機構的車子。所以我就跑去問那個警衛，「那是誰的車？」他說，「張家祝，交通部次長。」因為那時候，要談那個約，交通部次長一定要在。我就想，張家柱跑來一定在談那件事。

朱淑娟回想那時的發現，她說，這就是記者的敏感度。和警衛伯伯和打掃阿桑聊天的過程，都是新聞線索的一環，記者要靠想像力去深入追究，請教專家。

後來因為這樣子，我不斷地去追蹤線索，發現環保署和阿瑪斯號簽的賠償約是非常不合理的。那時候是依照海商法，但海商法有一個

賠償的上限，我有點忘記數目，比方說清理油汙需要三百萬美元，但賠償上限只到兩百四十萬，那剩下的六十怎麼辦，就變成我們政府要自己出，那就是一個大新聞。因為怎麼會人家汙染我們的環境，我們還依照海商法？

之後我又不斷去查訪和訪問專家，才發現，事實上我們是可以自己去選擇要用什麼法，所以如果不要用海商法，可以用海洋汙染防治法，就沒有這個賠償上限的問題。後來那則新聞的影響就很大。

朱淑娟說，揭露這則獨家新聞的結果就是，交通部次長張家祝和水保處長下台。「當然下台不是我們記者的原意，只是事情的演變就變成這樣。」她有點歉疚，「那個水保處長本來跟我很要好，是我重要的新聞來源。後來因為這件事情他受到很大的打擊，所以我們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就沒有再來往。」

阿瑪斯號的新聞雖然讓朱淑娟初嚐跑獨家的滋味，但她不免有些遺憾，「如果能夠重新處理那條新聞，可能有其他更細緻的辦法。」



(資料來源：《聯合報》，2001.4.25)



(資料來源：同左圖)

「如何保護新聞來源，又能讓事情曝光。」——這樣的例子在朱淑娟跑公家新聞的歷程裡層出不窮。她逐漸明瞭「**為什麼跑了公家機構，尤其是部會，才叫真正當過記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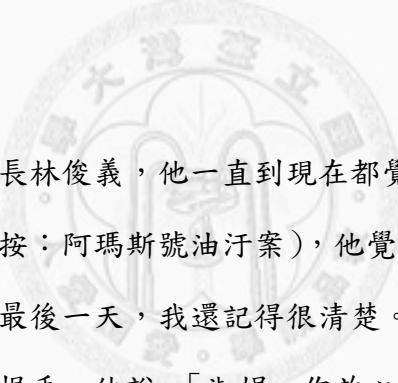
朱淑娟透露，事實上，許多獨家新聞的背後，都是內部的公務人員偷偷告訴她的。所以，「你怎麼樣保護新聞來源，又可以讓這個事件曝光，這真的很重要。你一定要保護他，可是那個人為什麼要為了你冒這個風險，他怎麼知道你會怎麼寫？」因此，如何和這些人維持一個堅固的信任關係，如何扮演記者監督政府的角色，朱淑娟認為這又是一門學問。

有些情況是罪證確鑿，公務人員有貪贓枉法的當然要揭發他啊！完全沒有什麼話講，不用顧忌你跟他的關係。可是有一種情況真的是…講他能力不足喔…或者有時候罪不在他，這種情況也很多，非常多。所以公家機構的官員喔，我們常會罵他無能，事實上他真的

很多的無奈。當錯不在他的時候，你是不是可以用比較細緻的方式去處理那個新聞，不過這個很難啦。

很難的原因多半來自記者本身的無奈。朱淑娟認為，「有時候你的想法不見得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因為你上面還有報社，報社有報社的觀點，長官有長官的觀點。所以當融入很多觀點的時候，你有時候不太能依照自己的意思去處理那條新聞。」

換言之，褪去菜鳥記者的青澀後，她不再感嘆「隔行如隔山」，反而覺得那些技巧其實不難學；真正難的是在採訪過程中圍繞的人際關係，以及自己如何去處理那樣的情境。然而記者卻無法準確預期整個情境的演變，包括那些失控的狀況。



包括那時候環保署長林俊義，他一直到現在都覺得是我把他弄下台的，因為這個事（按：阿瑪斯號油汙案），他覺得他自己做得很好。所以，他到下台的最後一天，我還記得很清楚。就是…辦那個歡送會，他還跑來跟我握手。他說，「淑娟，你放心，我不會怪你。」

署長林俊義的這番話反倒讓她過意不去。因為，雖然朱淑娟抱持著分析事實、揭發真相的「解釋者」新聞專業意理；然而她是為了監督政府，而非是以一個和政府對立的態度寫報導。處在報導監督和人情意理的為難處境，「有時候對一個記者的煎熬也很大，」朱淑娟說。

阿瑪斯號油汙案至今已屆九年，被污染的生態海域已逐漸復原，被油汙染黑的珊瑚已經復育有成。然而，當時阿瑪斯號散布的油汙，仍然沉甸甸地遺留在許多人的心裡。有些遺憾和傷害，就是注定留在那邊，清也清不掉。

在平衡報導與同情環保團體中掙扎

雖然有些遺憾無法避免，但這麼多年來，朱淑娟和採訪對象的關係維持得還不錯。她用「**三步遠的距離**」來形容自己和受訪者的關係。

「我現在訪問對象就是公家機構、環保團體，學者專家，企業。那我希望我永遠站在這裡，跟大家都有**三步遠的距離**。」為什麼要維持這樣的距離？她說，「**這個距離呢，不會遠到你沒有辦法跟他討論事情，可是也不會近到呢，你們變成好朋友，以致於他出了什麼事情的時候，你在報導上有所偏頗，你在感情上偏向哪一方。**」

換言之，就像在跳雙人舞，往前一點變太親近，後退一步又嫌太遠無法交心。而保持和受訪者**三步遠的距離**，也維持了記者與訪問對象之間該有的界線。

但人心總不像機器一樣好操控，按個**三步鍵**，就一直停在那樣的距離裡，不會動搖。特別是身為一個環境記者，每經歷一次公聽會和抗議現場的採訪，每一回都必須重新整理自己對環保團體與受害那方的感情傾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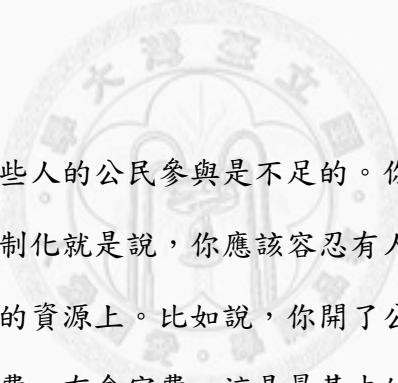
我不是誰的陣營，我不是官方的陣營、也不是環保團體的陣營。基本上我會站在中間，**可是在心理上真的很難**。你就看到一個有權有勢的一方，然後對抗無權無勢的地方。更何況這一方的人，你知道真的很感人，你有機會去認識做環境的人，他們生活真的好辛苦，花自己的錢搞公聽會、做研究，生活過得很清寒。可是他們就覺得應該要保護這個環境。

尤其是在環評會現場，朱淑娟總看到環保團體被警方如暴民般對待。「你就看到大批的警力把他圍住，甚至還蒐證啊。」她很不解，「那你就覺得…他是暴民嗎？他只是要來表達意見，這讓很多環保團體的人，抗議完之後還要跑法院。」即便環保團體順利進入會場，他們的發言也常常被打斷，得不到立即的回應。

因此，朱淑娟坦言，「當你是坐在位置上看這個場面的記者時，心情當然會有所傾斜；可是我還是希望儘量做到比較公正客觀的報導。」但她同時強調，「公正客觀也不是各打五十大板那一種，我覺得那種是假平衡。真正的平衡就是該打幾板就打幾板，所以某種程度事實上是有你記者的價值觀在裡面。」

換言之，改跑環境線後的朱淑娟，逐漸洞悉其與消息來源間的採訪界線，也愈益明瞭自己做為記者的角色該如何發揮。一如她對所謂公正客觀的看法，在報導時她儘量提供讀者充分且全面的資訊，但不忘以社會責任為前提，站在第四權的立場報導新聞。而這就是她口中的——記者的價值觀。

不過，雖然朱淑娟力求在身分上與採訪對象保持距離，但她也無法坐視環保團體發言的弱勢處境。因此，她遂開始研究公民參與的法制化，用另外一種方式表達關心。



我覺得政府對待這些人的公民參與是不足的。你應該某種程度讓公民參與法制化，法制化就是說，你應該容忍有人表達不同的聲音，而且是架構在政府的資源上。比如說，你開了公聽會，就必須讓遠道而來的人有車馬費、有食宿費，這是最基本的。而針對會議裡環保團體的發言，公家機關也有義務回應。

環保團體的發言不盡然都有道理，但公平討論空間的建置，才能讓記者忠實呈現事情的面貌。而當她站在三步遠的外圍，視野和觀點也變得更加清楚周延。

然而，她這些年來累積的環境新聞專業，卻仍然不敵報業的衰微和記者地位的低落，逐漸感到有志難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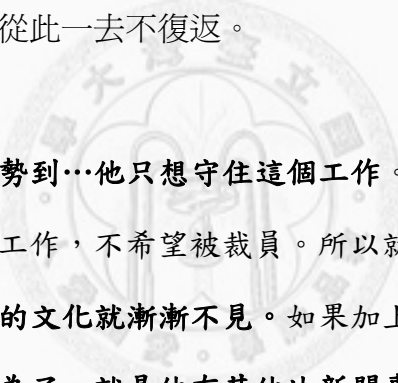
親身經歷報業起落，討論文化不見了

從 1998 年當記者，一直到 2009 年離開《聯合報》，朱淑娟由衷感謝報社的栽培，她也親身經歷報業的起落。

十年前還是菜鳥記者的她，報社給她從頭學起的機會，讓她能全心全意經營環境線的採訪專業。回想從前，朱淑娟十分懷念過去報社的討論文化，「**討論文化是指，基本上記者最大。**」也就是說，在討論如何報導新聞時，記者的想法仍為報社尊重；而媒體也需要專業的記者，來撐起報社的品牌。她也很感念當時社長黃年的念茲在茲，「以前我們黃年社長，他曾經提過一個想法，**他說記者應該做到最後，讓報老闆也不能對你怎麼樣。**」

「雖然能真正做到很難。」朱淑娟承認，「**可是某種程度在十幾二十年前有那個氣氛。然而這十年內，我真的從報社最好的狀況，經歷到這樣現在最差的狀況。**」

如今，記者在報社已淪為弱勢的存在，「記者最大」的往日時光彷彿只停留在資深媒體人的記憶裡，從此一去不復返。



現在，**記者已經弱勢到…他只想守住這個工作。**這不是記者的錯，誰都希望守住一個工作，不希望被裁員。所以就變成老闆大記者小，**那種討論跟抗拒的文化就漸漸不見。**如果加上長官不太英明的話，**甚至很多長官是為了…就是他有其他比新聞專業更重要的考量的時候，那…情況就會非常的難。**

舉例來說，以前當她在新聞的處理上與長官意見不同時，她會這麼說，「我覺得好像不是這樣……我覺得那個事情的觀點應該怎樣……」當時有些長官也會接受她的想法。可是到後期，她的發言變得無濟於事，「當然你可以不斷地去跟他計較，可是後來，那種計較就變得很累，唉講也沒有用，就很累。之後就變得完全不計較，好啦好啦…你要怎樣就怎樣，那討論文化就不見了。」

環境議題不被報社關注

她在《聯合報》當記者的這十年，從生澀到幹練；但報社的經營情況卻是往

對角線的另一端，營收逐年下降。她苦心經營的環境新聞，也在這幾年來遇到瓶頸。

以前在報社，長官基本上對我滿好的，就是你只要能跑到好新聞，見報率真的很高。曾經我跑過中龍鋼鐵，中龍鋼鐵你連聽都沒聽過對不對，這樣的新聞過關，竟然可以給我作一版二版。還有以前的大林電廠，你每次寫一定上版頭，即使是六版八版，一定都是版頭。對，可是後來就江河日下，這種新聞報社完全不要了。

環境議題逐漸不被報社關注的時間點，主要是在 2008 年金融海嘯後。「報社經營愈來愈不好，紙價大漲，然後又碰到金融海嘯。」她認為整體經濟狀況的不佳，是環境新聞被壓縮的主因。

那時候報社經濟不好做了什麼事情，就是整個版面紙張數減半。本來以前第一落是二十四版，可是因為經濟不好，紙張大漲，所以報社為了維持那個生計就變成你的紙張只能出一半。你以前可能二十四版現在只剩下十二版，怎麼辦？那就表示你有一半…過去登得出來的新聞必須被丟掉了。

金融海嘯的發生，也使得經濟新聞成為熱門的議題。「縮掉一半光放經濟新聞就來不及了，怎麼有可能放一些沒有立即對你有侵害性的新聞？」朱淑娟用新聞價值來解釋，「也就是說那個貼近性遠遠不足於那種金融海嘯對民眾的影響。」

環境議題於是逐漸變少甚至不被關注。儘管如此，許多的污染和開發卻也在此時持續成長，不曾片刻停歇。

辭職後成立「環境報導」部落格

2009 年 4 月，朱淑娟離開《聯合報》，成立個人部落格《環境報導》。簡單明瞭的四個字——環境報導，也象徵著她對環境議題的堅持。

「我回想起來就是……其實好早就想離開。」她緩緩地說，「離開的時候也在想說要不要當記者，因為其實很容易就可以找到寫新聞稿的工作。」

我那時候也會想…比如說去做個公務員或者是…好像是委曲求全、討長官歡心，就可以安心地領一份薪水還不錯，又可以擦 shisedo。可是後來就覺得，如果你經濟還沒有什麼，你還可以承擔，那幹嘛不做一些你想做的事情。當然以我的人脈跟我的資歷，我其實要去一個地方上班很容易。甚至離開之後有很多媒體也找我，可是就會覺得，好不容易有這個機會幹嘛不試一下？

剛好報社當時有個 20 年優退方案，朱淑娟因此順勢離開服務了 20 年的《聯合報》系。從程式設計、行銷企劃，一直到記者，人生中的一段精華歲月都在那裡度過。

所以，朱淑娟當時考慮離開的情感很複雜。一方面是無奈，「再待下去可能也沒有辦法做**真正的記者**」。另一方面是掙扎，「**因為你是《聯合報》記者，所以人家會對你…某種程度會…就是那個感覺很難放下。**」換言之，對於身為大報記者的光環優勢，她也不置可否。

「**可是我覺得有時候事情走到要決定的時候，你就是用最簡單的思考就好了。**」因此最後，她離開的決心，純粹而堅定。

2009 年 4 月 1 日，正式成為一個獨立媒體記者的她，除了擁有更多的自由，還期許自己要比主流媒體做得更專業。

用部落格的平台，發表自己獨立報導的新聞，是朱淑娟為了讓環境新聞增加

能見度的一種新嘗試。她認為，「在美國獨立媒體很多耶，為什麼在台灣沒有？」並且，「如果這個大環境已經不行了，你是不是可以自己做一個獨立媒體？」再加上朱淑娟對環境議題與媒體專業的熟悉，「環境報導」部落格因此很快地順利運作。

總結以上所述，從朱淑娟決定離開《聯合報》，一直到成立「環境報導」部落格的心路歷程，不僅和報社對環境新聞的漠視有關，也正是她對記者職志的表徵。一如她所說：

離開主流媒體後，決定暫時不再到媒體工作，因為如今的媒體生態，想做「真正的記者」，幾乎已無路可走。想試試獨立記者在台灣的可能，於是在分崩離析的媒體環境之外，搭起了自己的鷹架。也就是說，《環境報導》部落格一開始的定位就是「媒體」，而且充滿「媒體突圍」的企圖。（朱淑娟，2009）

寫作：用「記者注」標明個人觀點

如上所述，朱淑娟不只是把獨立媒體視為一種另類（alternative）媒介，她試圖納入主流媒體的規格與處理方法。不管是新聞稿的寫作，或是編輯的標題，皆符合以前在報社被要求的規格。因此，她不認為自己跟過去的心態差異太大。

尤其現在，雖然可以在新聞裡自由書寫一些個人觀察，但是她會特別標明，以「記者注」的形式呈現。



台南縣環評大會，環保團體：永揚垃圾場涉多項違法，應立即撤銷

· 朱淑娟／2009.11.26

針對台南縣東山鄉永揚垃圾掩埋場爭議案，台南縣政府今(26日)舉行環評大會審查，台南縣環盟理事長謝安通、前南市環盟理事長黃安調、東山鄉環境保護自救會總幹事陳顯茂等人提出永揚公司不實偽造證據，要求縣府依行政程序法117條撤銷永揚掩埋場案。

環評委員經冗長討論到晚上八點做出結論〈沒有結論的結論〉並未撤銷永揚案，環保團體深感遺憾。**會議結論如下：**

一、有關環評資料有誤部分是否影響環評審查結論，再擇期討論（記者注：業者提供錯誤資料給環委審查，環委用錯的資料做出的結論一定是錯的，這種結論能不重審嗎？簡單明白的事理，有什麼還需要「擇期討論」的？）

二、請永揚與環團於文到一個月內就環評書有誤或不實部分依環保局附表所列確認或增刪(附電子檔)，供委員討論

三、請永揚公司提供環評書定稿本給環評委員（記者注：依環評法規定，業者完成環評定稿本第一時間，本應寄給所有環評委員再確認，以了解環委的要求是否都已納入。即使委員換屆，重啟審查時也應在審查前提供環評定稿本給委員參考。）

四、有關地下水是否可能污染烏山頭水庫，等環保署專家會議研析確認後再討論。



台南縣環評大會，環保團體：永揚垃圾場涉多項違法，應立即撤銷

· 朱淑娟／2009.11.26

針對台南縣東山鄉永揚垃圾掩埋場爭議案，台南縣政府今(26日)舉行環評大會審查，台南縣環盟理事長謝安通、前南市環盟理事長黃安調、東山鄉環境保護自救會總幹事陳顯茂等人提出永揚公司不實偽造證據，要求縣府依行政程序法117條撤銷永揚掩埋場案。

環評委員經冗長討論到晚上八點做出結論〈沒有結論的結論〉並未撤銷永揚案，環保團體深感遺憾。**會議結論如下：**

一、有關環評資料有誤部分是否影響環評審查結論，再擇期討論（記者注：業者提供錯誤資料給環委審查，環委用錯的資料做出的結論一定是錯的，這種結論能不重審嗎？簡單明白的事理，有什麼還需要「擇期討論」的？）

二、請永揚與環團於文到一個月內就環評書有誤或不實部分依環保局附表所列確認或增刪(附電子檔)，供委員討論

三、請永揚公司提供環評書定稿本給環評委員（記者注：依環評法規定，業者完成環評定稿本第一時間，本應寄給所有環評委員再確認，以了解環委的要求是否都已納入。即使委員換屆，重啟審查時也應在審查前提供環評定稿本給委員參考。）

四、有關地下水是否可能污染烏山頭水庫，等環保署專家會議研析確認後再討論。

陳淑華：相信其理愈辯愈明

不過，前環保聯盟理事長陳淑華指出，永揚案爭議大、牽涉爭議過多，經環保團體、地方居民抗爭多年，雖然至今環保署、台南縣政府都未依法撤銷永揚案，但新爭議也不斷浮上台面，環保署、台南縣政府也不敢輕忽。

陳淑華認為，今日環評大會是大進展，是台南縣環評委員終於願意正面看待問題，進入實質討論。她相信其理愈辯愈明，政府終會還土地、農民一個公平正義。

環保團體提出五大理由要求撤銷永揚案：

一、永揚公司偽造地表下20公尺無地下水（88年環評書及91年1月水土保持計畫書已知有地下水「地表下1~7公尺」），91年5月、91年6月環評定稿本、以及同意設置文件審查資料皆偽造地表下20公尺無地下水。

二、永揚公司89~90年環評審查時偽造主要道路為「既成道路」，89年環評審查時無路，鄉公所證明無效，已違反「依非都市土地審議作業規範26條需有二條路」規定，檢察官已起訴「偽造文書」。

三、永揚場址地下水往上衝（三天下雨12.4公分，永揚場址內水位衝高一公尺）

四、2009年豐水期(6~10月)每日排水約二百噸，五個月排水近三萬噸，根本不能當掩埋場址。

五、場址5公里內，東、南、西、北有觸口、新化、六甲、梅山等四個活斷層(永揚公司原來錯標場址位置)，而且皆為一萬年內曾錯動的活動斷層，環保署專家會議已鑑定北勢坑斷層通過永揚場址。

（資料來源：朱淑娟「環境報導」部落格）

因此，比較她與過去在報社時的新聞寫作差別時，朱淑娟指出，「那個差異性喔，我覺得是有。就是說，你會再讓讀者做更多的分析，放入記者本身對這件事情的判斷。」但以前在報社，其實也可以用特稿寫出記者的個人觀點。對此，她進一步比較，「基本上特稿還是必須有一點平衡，可是當我在部落格的時候，我就會完全地沒有那個顧忌。不過我用「記者注」拉出來，特別註明那是我個人的觀點。那別人也可以有別人的觀點。」

採訪主題：關注影響環境更深層的議題

身為自由新聞工作者的自由，表現在寫作上的個人觀點，同時也發揮於採訪主題的選擇上。

朱淑娟反省過去在報社採訪新聞時，爲了應付主管的要求，無形中會促使自己尋找容易被登出來的新聞。她坦承，「對記者來說，新聞登出來是對一個記者的心情付出最大的回饋。所以如果你老是寫一些登不出來的新聞，不用報社講你自己都瘋掉了。」

什麼是容易被登出來的新聞呢？朱淑娟透露，「一個商業媒體，它要的東西其實很簡單，就是我們報社常講『比較容易入口』，讀者容易讀，跟民眾有關。」她拿著手邊的杯子舉例，「例如你去買星巴克，自己帶杯子可以省十塊，這種新聞一定會登，因為跟民眾有關。可是，它是真正的環境議題嗎？它不是。當然它也是環境議題的一環，但是，是比較小的那一環。」

另一方面，她也用近期關注的中科議題來比較。「但你如果寫說中科四期破壞土地，土壤過了十年之後會酸化，那絕對不會登喔！」這是被報社歸爲「不容易入口」的新聞，不合乎商業媒體的要求。但她強調，「可是相對而言，那是重要的。」

「像我現在部落格就會朝那個…我認為比較深遠的主題去寫。什麼杯子少十塊，這個我就不會再去寫。」她笑著說，「很大的不同喔，而且可以自己決定。」

所以，那些過去不被報社青睞的採訪題材，如今遍布在朱淑娟的部落格上。

是故，「環境報導」這四個字，不僅是她部落格的標題，也流露出她對於新聞主題選擇的堅持。

比以前在主流媒體更能夠得到採訪機會

卸下主流媒體光環後，獨立記者如何「自立自強」地找尋採訪機會，往往是報導時面臨的一項挑戰。但對朱淑娟而言，採訪機會的尋求從來就不是問題，而她和採訪對象的關係，也不會因為自己離開《聯合報》而有任何改變。

「當然有一些人會覺得你已經不是大報的記者，他就會對你比較…就不太理你呀！可是我基本上碰到這種機會真的很少。」朱淑娟很感恩，「我覺得真的很難得，很奇妙，因為大家對我並沒有太大的不同。」

另一方面，以前因為她是大報記者，受訪者擔憂媒體刊登後的影響，有時還是不敢講真話。如今，離開報社後的朱淑娟會告訴他們，「你不用擔心，我現在不會登在報紙上，你就儘量講。」結果是，「他就真的儘量講，我就寫到更多。」

她覺得最大的回饋是，「他們看了我部落格所寫的內容之後，覺得我寫的東西比過去更有深度、更好看，對我……真的有時候會更好。」她補充說，「**我現在比主流媒體更能夠得到採訪的機會。**」

因為常常有一些場合，比如說這個環保團體，他要跟官方討論。這種場合是不准記者採訪的，但是官方會允許環保團體安排一兩個記者在場，我通常都是被邀的那一個或兩個。所以那種……常常一般媒體聽不到的會，我都有在場。這是我覺得比較特別的，當然這是雙方的回饋啦，因為我的部落格是開放的，人家就會看我寫什麼。一次兩次，他覺得我寫的東西 ok，很不錯，下來他對我就會更好。

這些超乎預期的採訪機會以及採訪對象的真誠以待，讓朱淑娟深層地體會到，「**你一個記者如果…做到當你不是大報記者，在路上人家對你的態度，有很**

大的差異的時候，我覺得那真的是你自己要檢討的。」

於是，在朱淑娟「環境報導」的部落格裡，那些豐富的報導內容、字字句句地追究污染核心，彷彿都代表著她對受訪者最真誠的回禮。

「官方竟然對一個部落客發出嚴厲的指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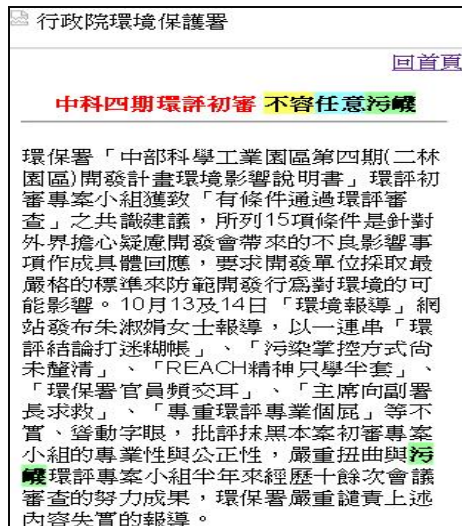
然而，她原本採訪時出入毫無阻礙的環保署，卻因為去年 10 月初報導中科四期二林園區的環評審查，被環保署盯上她的記者身分，甚至還發新聞稿澄清，直指她的報導是對中科環評的汙衊。²⁰

去年 10 月 13 日，環保署針對中科四期二林園區召開環評初審，會議焦點是討論廢水排放地點，究竟是要排到雲林縣（濁水溪）或是彰化縣（舊濁水溪）。極有可能被廢水汙染波及的雲林縣和彰化縣蚵農、稻農等民眾，因此集結環保署抗議。

朱淑娟在報導中指出，這些抗議民眾被檔在環評會外，只開放少數人進入「旁聽室」旁聽。甚至在環評會議裡，記者們第一次需要換證進場。而原本該是獨立運作的環評審查，多位官員不只在會場裡進出自如，還頻頻在會議進行中與主席交頭接耳。最後的審查結果是，中科四期初審過關，雲林縣與彰化縣皆被納入可接受的廢水旁放地（朱淑娟，2009a／2009b）。

因此，針對朱淑娟事後撰寫的兩則報導「中科四期二林園區環評初審過關，環評承諾不容打迷糊仗」、「環保署中科獻身記」，環保署發新聞稿強烈反擊，指稱「中科四期環評初審 不容任意汙衊」。

²⁰ 雖然新聞稿連結已被環保署撤掉，利用 google 搜尋頁面存檔，仍可見到新聞稿內容，下圖即為翻攝結果。或是搜尋台灣環境資訊中心刊載朱淑娟該則報導下的回應，皆能看到環保署的強力反擊。參見：<http://e-info.org.tw/node/48366#comment-207164>



(資料來源：翻攝自環保署新聞稿網頁)

對於環保署發新聞稿抨擊她的做法，朱淑娟笑答，「這件事簡直讓我名揚四海。甚至有人講說，我開創了台灣部落格的先驅，官方竟然對一個部落客發出嚴厲的指控。」

雖然被環保署列出洋洋灑灑的汙蔑指控，但朱淑娟選擇平靜看待，不多談內部隱情。不過她也強調，記者和採訪對象的關係是公平的，在公開的殿堂上，「我今天可以寫你，你也可以反擊我」。她最自豪的是，「我當記者這麼多年，你如果問我，有什麼覺得自己很自豪可以交代過去的，就是我不曾用新聞的公器去報私仇。」

「當然我也可以選擇再反擊，可是我覺得，就讓大家公平地評斷，誰寫得對，誰寫得錯。」因此，她沒有撰文澄清環保署一字一句的指責，而是繼續關注、持續報導中科。

環保署問 NCC，「《環資》是媒體嗎？」

儘管朱淑娟選擇低調不回應，但環保署卻仍不縮手，轉個彎開始盯上她的記者身分。他們問朱淑娟，「請問你是什麼身份再跑新聞？」當她以「台灣環境資訊中心協會的特約記者」回應環保署的詢問後，環保署官員們也鏗而不捨地追到 NCC 去。他們問 NCC，「《環資》是媒體嗎？」環保署打破砂鍋問到底的行徑讓

她不覺莞爾。

NCC 在這次事件中宛如正義的化身。委員們討論過後的回覆是，「媒體的定義很廣泛，事實上只要有在自己的部落格或網站，平常有發表文章，他就可以稱為記者，並不需要來我們 NCC 登記說他是媒體還是記者。」

朱淑娟笑著說，雖然 NCC 的回覆間接肯定了她的記者身分，但她也因此向《環資》「靠行」，自己印名片標明特約記者的身分，免除將來可能還會再出現的疑慮。



（翻攝自朱淑娟名片）

然而，這次被「驗明記者正身」的經驗卻也讓她開始擔憂公民記者的採訪權利，因為大多數公民記者並不像她一樣擁有特約記者的靠行身分。她強調，NCC 的回答證明了，官方是不能拒絕公民記者進入公家機關採訪，但後來中科四期的採訪規定卻變得更加森嚴，必須以換記者證的方式取得入內採訪許可。

從主流媒體到獨立媒體的朱淑娟，很清楚公民記者的重要性。「現在公民記者很多啊，主流媒體不報？怎麼辦？那當然靠公民記者啊！」因此她很氣憤，「公民記者最大的困難就是，你只能報導事件看到的，可是當你要進一步探討，……對方、官方的態度是怎麼樣時，你就沒有辦法採訪得到，因為你沒辦法進去。」

八年環境線的資歷與專業累積，使朱淑娟不需面對公民記者普遍遭受到的採訪限制。她珍惜著自己的幸運，但也希望這樣的限制能被挑戰，讓公民記者能擁有公平的採訪機會。

用接案工作維持獨立記者生活

朱淑娟辭職成為獨立記者後，採訪機會和新聞工作都與過去沒有太大的差別，但她捨棄高薪、離開報社羽翼的作法，不免讓很多朋友好奇。所以她的朋友們常常不停地問，「接下來要去哪裡？」但朱淑娟總在心裡想，「事實上我真的不知道我接下來要去哪裡？」她只是想做好目前經營的獨立報導工作。

「有一天在坐公車，突然又有一個人問我，我就再也不想回答這些問題了。就說，『**我還會留在地球**』。」於是，「我還會留在地球」就成為朱淑娟部落格正上方的副標題，接著副標題的底下則是一篇篇的環境報導，而那正是朱淑娟為了留住地球的美好環境所付出的努力。

但朋友對朱淑娟的關心其實也不無道理，維持這些努力和付出的基礎仍得仰賴基本生計的維持。她也誠實地說，以前在報社的薪水真的很高，現在的收入則呈現一種不穩定的狀態，「我曾經一個月賺兩千塊，但也曾經一個月接很多 case 賺六七萬。所以呢，**當你能夠承受這種收入不穩定的情形之下，才能夠考慮這個工作。**」

不過，她還是期待獨立媒體能夠建立一個營收模式，鼓勵愈多的人來加入獨立媒體的行列。對此，朱淑娟有著這樣的心願，「**他（按：記者）可以不要靠那份固定薪水，可以透過接案賺到足以生活的費用，然後享有獨立報導的空間跟精神。我覺得那是未來台灣媒體要走的路，因為現在的媒體，對一個記者來說，真的是太扭曲了。**」

究竟獨立媒體的營收模式為何？朱淑娟以自己接案為例，

現在除了《環資》會給我固定的收入，我在「**低碳部落格**」，我每個月可以寫一篇專欄，專欄就有錢，有時候我會接他們的案子，稿費就比較高。另外我現在會在社大上課，那是一個重要的收入來源。另外我接了比較多的演講，常常去大學上課。然後現在我也做《

公視》「我們的島」的節目，那個錢就比較多。

換言之，目前做為自由新聞工作者的朱淑娟，是靠接案維生，但這些接案工作仍與她的新聞專業有關——寫稿、製作節目、教授環境知識。而相對於過去每個月固定的薪水入帳，她現在是用多個接案來源的收入，拼湊「組合」出每個月賺取的生活費。

令人驚奇的是，朱淑娟透露，這些接案工作都是朋友介紹，她不曾主動尋找工作機會。「這個都是過去的人脈來的，甚至還要一直拒絕，因為真的是沒有那麼多時間。」她笑著說，「對啦我還沒有努力在賺錢啦，但這些就會支撐我報導。」

儘管接案機會源源不絕，但朱淑娟堅持，能夠讓她發揮獨立報導精神的案子她才會接。「而且我衡量過自己的經濟情況，覺得應該可以做一個真正的獨立報導者。」朱淑娟以「低碳生活部落格」為例，「它讓我寫的案子，就給你一個大標題，讓你自己下去採訪。然後幾乎…我寫的文字它可以一字不改。」

因此，她也不考慮接受任何的贊助和廣告。「我覺得獨立媒體就要有獨立媒體的精神。」但她不把話說死，「當然……我現在講的都是現在，那以後會怎樣我不知道。」

在獨立報導理想與賺錢維生的蹺蹺板上，朱淑娟仍將獨立媒體的精神看得重要些，因為那正是她離開《聯合報》的原因。

收入起伏是最大的挑戰

總結自己目前的收入狀況，朱淑娟說，她每個月基本上都可以賺到基本工資以上的錢，而且試圖在不穩定中找出穩定。「也許我那個月賺兩千塊，可是我有時候會賺六萬，那就表示，那兩千加六萬除起來我每個月還可以賺三萬。」不在乎短期的收入多少，她選擇用長期的角度來看待自己每個月起起伏伏的收入。

同時，朱淑娟也積極地和其他媒體建立固定的合作關係，就像她和《環資》、「低碳生活部落格」，以及《公視》的約稿形式。而且她還有意再增加這樣的合

作規模，「如果我能夠再增加幾家這種穩定的收入，其實我的收入就穩定了。」

雖然自嘲沒什麼努力在賺錢，但從朱淑娟的言談間，聽得出來她對未來自有一番規畫。而且她也認為，對自由新聞者而言，「收入」的確是最大的挑戰。「像很多記者也很羨慕我阿，說你可以這樣子，很讚，不用被那些無聊的長官 call，講一些完全沒 sense 的話。」但理想和麵包卻總在現實生活裡拔河，「可是，當你每個月開張…小孩要繳學費、房子要繳房貸的時候，他也承認，『我沒有辦法做像你現在的工作。』」

除了收入是對獨立記者維持生計的挑戰之外，朱淑娟認為，在勞健保方面則不構成任何問題。「其實外面有很多公司是可以靠行的，或者是你加入一個什麼協會，你就可以去靠勞保。」接著她以健保為例，「那健保更簡單，只要是無業遊民，你都可以去區公所掛保，每個月繳最低的金額六百五十九塊，還比以前在報社時繳得少。」

所以，解決收入的問題，以及先前提及的採訪限制後，朱淑娟仍然對自由新聞工作者的未來充滿期待。而她從主流媒體轉換到獨立媒體之後的發展如此順利，朱淑娟將自身的幸運歸因於過去採訪環境線八年的專業累積，至於以後追隨她出走記者是否也能擁有這樣的幸運，她卻不敢肯定。「我覺得…很難說。因為現在記者，動不動一兩年換線，不然就代班代到頭都昏了，你沒有時間做這種專業的累積。」

回顧朱淑娟的記者歷程，她 36 歲半路出家當記者，47 歲到外頭闖蕩當起自由新聞工作者。而她在《聯合報》多年經營環境路線及專業累積，也著實為其獨立記者的生涯打下穩固的根基。

當媒體不再報導真相

2009 年 4 月 1 號，朱淑娟的部落格正式開始運作，一個多月後，因為一篇文章使她的部落格瀏覽人數暴增，甚至《蘋果日報》也大幅報導。這篇文章是「當

媒體不再報導真相」，其實只是朱淑娟在半夜裡對「置入性行銷」有感而發，用兩個小時寫完的一篇「感想」。

「後來很驚訝會引起那麼多迴響，包括《蘋果日報》也報導……」她不解，「我心裡就在想說，這個事情不是大家都知道嗎？如果有心要做這個報導，你不是應該早就要去挖掘跟調查，某年某月某日、某報寫什麼、收了多少錢……」

朱淑娟承認，自己以前也寫過業配的新聞，但基本上比較無傷大雅，沒有觸及政策的辯論。但她強調，「也不是這樣就可以，因為你還是以新聞的方式呈現，讀者怎麼知道你那則新聞賣了錢？」

而她在那篇文章裡提及 C 報與 U 報報導勞委會降低失業率有成，實則只是一樁收錢辦事、包裝政績的業配新聞。事後 C 報記者還寫 email 向她訴苦，「小豬姊，唉，我是這樣想啦，寫編業的時候就寫編業，寫新聞的時候就寫新聞，就自我說服這樣子。」一樣曾經被迫寫過編業的朱淑娟是這麼回應的，「親愛的 C 報記者，我知道你是個很認真的記者，小朱姐要為你加油（朱淑娟，2009）。」

媒體記者的無奈，朱淑娟其實都懂。一如中科四期的議題早在她還在《聯合報》時就希望能夠擴大報導，但始終與長官想法不同。離開報社後，她終於能夠好好關注並報導中科，但她報導的那些「真相」，卻與主流媒體呈現的新聞大相逕庭。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置入性行銷。

就像中科動土這件事。我也看到《中國時報》全部都寫什麼……卓伯源表示、馬總統表示、又可以帶動什麼經濟起飛。那你再看我寫的，提的東西就非常多。不管是水資源，還是說你違反程序正義，那個都是非常嚴厲的；可是在主流媒體完全看不到。

不只是中科，還有農村再生條例皆是如此。她表示，政府一手捧著錢，另一手伸進報導裡，明目張膽的行徑是媒體裡公開的秘密，卻是民眾不知道的真相。

華文部落格「年度訊息觀點」首獎

「一切不會發生，直到它被描述。」朱淑娟在部落格的自我介紹裡，引用吳爾芙的這段話。她說，「我覺得記者存在的目的，若是對社會有什麼用途的話，其實就是她講的這句話。」以前她在報社裡無法報導的議題，無奈被置入性行銷掩蓋的真相，如今都坦蕩蕩地在她的部落格呈現。

「如果中科你看到的都是像媒體這樣報，你會以為事情就是那樣。」朱淑娟用一篇篇的報導證明了——原來，中科四期二林園區不是只帶來經濟起飛和增加就業機會，它用低價徵收了彰化相思寮的土地卻無視於居民的眼淚，²¹它排放的廢水會危及當地蚵農、稻農的生計……²²然而，直到這些真相被揭露，居民的眼淚和憂心被看到，人們才會發現，原來事情不是媒體報導的那般樂觀正面。

爾後，中科四期的議題變得敏感開始被人重視。朱淑娟回憶，

中科四期鬧到今天這個層面，一開始是完全沒有人採訪的。第一次環評會四月七號，唯一在場的記者只有我。後來《立報》的胡慕情也開始加入、《公視》也注意了。這個事情不斷地透過我們的報導，關注的面就愈來愈大。之後，那個媒體位置爆滿還沒有地方坐。

儘管中科四期最後還是動土了，但朱淑娟藉由這件事更確認了記者能夠發揮的功能，「你站在人家看不到的地方，把那件事情寫出來。然後透過你的報導，有一些人看到，他因為你而知道這件事，進一步付出關心，就有更多人來關心這件事。」

²¹ 詳細新聞內容可參考《相思寮的眼淚》http://shuchuan7.blogspot.com/2009/11/blog-post_05.html

²² 詳細新聞內容可參考《中科廢水排放，承諾又毀諾，今環評審查提出兩方案：排入彰化縣、雲林縣都可行》http://shuchuan7.blogspot.com/2009/10/blog-post_06.html

事實證明，朱淑娟的報導不僅被看見了，更勇奪 2009 全球華文部落格「年度最佳訊息觀點」首獎。



（翻攝自全球華文部落格網頁）

採訪當日，恰巧是華文部落格頒獎後的隔天。朱淑娟的喜悅寫在臉上，辭職後付出的努力首次被正式肯定。而她也證明了自己成功踏上獨立媒體的第一步，讓環境議題藉由部落格的達到媒體突圍的可能。²³盡力讓一切發生的，都被看到。

一如中科四期、國光石化，或是農再條例等，儘管這些議題被主流媒體忽視，但仍然能透過部落格傳播出去，甚至成為「最佳訊息觀點」。朱淑娟提及，曾經有個記者問她，「你覺得在整個推動環境議題的角色上，你扮演什麼角色？」她是這麼回答的，「媒體本身就是一個運動者。」

「媒體運動者和環保團體是不同的，環保團體是為了捍衛環境。」朱淑娟認為，「相較之下，媒體的角色就是，你必須要讓這個議題公平地呈現在讀者眼前，讓他們自己去判斷對還是錯，所以你必須要公平地呈現所有的觀點。」然而，「基本上你還是站在你自己的觀點上，去公平地呈現這個事件，那你的觀點會偏頗還是怎樣，我覺得那是個人專業的訓練。」

成立不到一年的「環境傳播」部落格，不僅得到華文部落格大獎的肯定，目前環境線記者採訪相關議題前會先到朱淑娟的部落格「做功課」。督促自己將部落格塑造成媒體規格的朱淑娟期待，「我希望對其他的媒體，在關注環境議題上

²³ 《部落格的媒體突圍》http://shuchuan7.blogspot.com/2009/12/blog-post_28.html

是有某種程度的啟發。」

「希望改變一點什麼……」

2009 歲末年終，回顧環境新聞在該年度的幾項要聞，中科四期的動土無疑是對朱淑娟的一項挫敗。「我花了一年的青春跟它計較，結果，它還是動土了，」她語氣裡仍然聽得出失落。但對環境記者而言，學習與挫敗感相處，然後繼續往前看，是一項必須具備的心理素質。

因為挫敗的例子數也數不清。2007 年朱淑娟報導台塑六輕，直指台塑超量用水違反環評承諾。雖然台塑被環保署開罰，但經濟部 and 行政院卻撤銷罰單，理由是台塑已提出「變更用水」。

「那幾個月就是挫折、憤恨到無以復加的程度，覺得寫新聞也沒什麼用，反正也不能怎麼樣，」那陣子是朱淑娟當記者以來感受到最大的失望。「可是那種情緒後來還是會治癒。就學著…你跟事件的感情還是要稍微分離一點，否則真的沒有辦法做這件事。分離不是你不關心，還是要維持一個比較客觀看事情的態度。」

因此，朱淑娟承認，雖然中科的事情還是讓她很傷心，但她已經學習用抽離和觀察的角度來看待，但是仍然會繼續報導中科。

你也可以觀察它十年的變遷呀，當一個中科十年在這邊的時候，它對社區的變遷是什麼？對我們海岸線的變遷是什麼？你記者應該站在這樣的位置，去觀察它的變遷，跟做一個完整的記錄。所以我有想要做這件事。你看那個相思寮的阿公阿嬤，他們經歷了這些事情之後，他們去哪裡了，那接下來他們的生活是怎樣？這可以拍成紀錄片。

笑著說明未來採訪計畫的她，一邊笑得爽朗，一邊思索得周詳。彷彿能從她的言談中看到中科未來的景物變化，以及相思寮人事全非之後的悲歡離合。但誰又能說得準中科的命運註定是悲劇收場呢？

她回憶，和中科相比，多年前的反七輕運動同樣奮戰得如火如荼。如今，當年的七輕預定地濱南工業區，不僅成為國家公園的保護地，不久前也已開工動土成立台江國家公園。而反七輕運動也正式宣告結束。

「所以我一直覺得我們在做一個延緩革命發生的事情，那革命，沒有人有那個厲害、寫篇文章就可以改變什麼，但是你可以改變那個氛圍。」朱淑娟自述，「基本上會當記者的人，我相信他的血液裡面會有一點跟人家不一樣的東西，他希望改變一點什麼。」反七輕事件的結束證明了，「透過你的報導，當你真的能夠做一點改變的時候，我覺得那是對一個記者最大的回饋。」

「為什麼你可以跑環境跑這麼久還不膩？」時常有人問朱淑娟這個問題。而她總是笑著說，「怎麼會膩呢，當記者多有趣啊，每天激發新的議題，每天不斷地去鑽研和學習。所以當記者怎麼會無奈或無趣呢？太有趣了！」

成為自由新聞工作者後，朱淑娟認為，她更是回歸到真正記者的本質，而且更單純——就是希望透過報導而有一些改變。目前她還有一個新身分——中華民國環保記者聯誼會會長，創下獨立記者當上會長的先例。

辭職至今，對於自己的選擇，她一點都不後悔，「我覺得，真是做對了！真是人生做得最對的事！其實喔，早就該走了，應該這樣講。」

笑稱「早就應該離開主流媒體」的朱淑娟，她是因為想做個「真正的記者」毅然揮別已有多年情感的《聯合報》，為了讓被報社湮沒的環境新聞有發聲的管道，因此成立「環境報導」部落格。

在專業意理上，朱淑娟讓自身抱持的「解釋者」意理充分發揮，在中科等相關議題上盡力報導揭發真相。同時，從主流媒體的版面限制中破繭而出，她反而有更自由的書寫空間，讓新聞事件中的採訪對象（不論是環保團體或是環保署）

有更大的發聲篇幅。換言之，她也不會因為卸下主流媒體記者的身分，而與環保團體走得更近，或者直接站在政府的對立面報導新聞。

熱誠地希望「改變一點什麼」，付諸於新聞專業理念的實踐上，她在《聯合報》環境線的採訪中所抱持的「解釋者」專業意理，雖然無法在報社充分發揮；但反而在辭職後，藉由「環境報導」部落格得到具體實踐的空間。朱淑娟以一名獨立記者的身分，在自由工作與網路媒體領域裡，享受成為「真正記者」的快樂。

「只要你繼續站在那裡，做你該做的事情。」

談起未來的計畫，去年買了一台攝影機的她，還想繼續學習影音剪接，甚至籌備網路開講的人物專訪。而她總笑稱做獨立媒體是董事長兼工友，為了分擔工作量，也考慮請助理處理網站事宜。同時，她也持續在 peopo 公民新聞平台、facebook 個人檔案裡增加部落格的能見度，讓環境報導被更多人看到，被愈多人重視。

那麼，是否會再回到主流媒體？朱淑娟的回答留了點想像的空間，「其實喔，我真的沒有辦法回答這個問題，至少目前沒有這個想法。」

她給了兩種可能，第一是經濟問題。「如果哪一天，我不能承受了，我必須要有穩定的收入，我可能就會重新考慮。」或者是她遇到一個極為認同的媒體，「或者是以後…有個什麼媒體讓我覺得非常認同，假設是這樣的話，我就會考慮。」

然而，無論她會去哪裡，「她還是會留在地球上」，寫著那些不被看見的人事物。「只要你繼續站在那裡，做你該做的事情，持續書寫。」朱淑娟剖析自己，「你會覺得你在幫環境什麼，我覺得反而是這些書寫是在救贖我自己。」

「因為積壓太多對社會的不滿，所以我很感謝能擁有一個寫作的管道，把憤恨發洩在文字上，讓我還能很正常地活著，」朱淑娟說。

一切不曾發生，直到它被描述

對她而言，或許不只是「一切不曾發生，直到它被描述」。她還在等待，那些事情被描述之後，像是蒲公英的種子隨風飄揚，幸運地降落在肥沃的土地上，然後，再次綻放。



第三節 周富美的職涯圖像

周富美，1973 年出生於台北，1997 年畢業於文化大學新聞系。畢業兩年後考取《勁報》專題記者，接著轉戰《中天》新聞台，最後落腳於《自由時報》。全職記者經歷長達八年。

從小喜歡寫文章、喜歡與人接觸的她，個性獨立。因為父親年紀大、身體不好，周富美大四那年遂以醫療記者為目標，以採訪醫藥議題為主。

1999 年周富美考取《勁報》專題記者，在一次採訪過程中，她認識了血友愛滋病患李錦章。第一次見面時，李錦章突如其來地拜託周富美，「你去念研究所，把我們的故事寫出來好不好？」於是，她用六年的時間，來完成一句隨口答應的承諾，完成《時間的病》一書。

而她與李錦章接觸後，也改變了周富美對新聞專業意理的想法，逐漸從醫藥「議題」聚焦於對於「人」的關懷，也開啓她對愛滋病患的關注與報導，這也是周富美在專業意理內涵上的重要轉變。

然而，儘管她同情弱勢，但仍希望自己能夠在報導新聞與關懷弱勢間取得平衡，在其醫藥、社團記者本位上實踐其報導弱勢、監督社福單位的理念。換言之，雖然她對於人的關懷，展現於新聞主題的選擇上（如：愛滋寶寶），但自認沒有在報導上明顯陳述其價值判斷。因此，在專業意理上，她是一名抱持「解釋者」意理的記者。

2007 年，她為了新聞自由和資訊公開的理念，不惜在環評會議門外與政風室官員發生口角與肢體衝突，因此成為解嚴後第一位被公部門點名禁止採訪的記者。《自由時報》最後批准周富美的辭呈，終結了她在《自由時報》五年半的工作生涯。

辭職離開後，周富美轉而成為一位以接案維生，寫報導也寫書的獨立記者。因此，本節除了描述她在專業意理上從「議題」延伸至「人」的轉換過程。故事

中探討的另一焦點，也著重於這些她過去遭遇的經歷、挫折，以及現今工作環境的轉換，如何形塑與實踐她對於記者角色的理念。同時也欲了解她如何藉由新聞與文字工作維生，以及她對獨立記者未來的看法與期盼。

【周富美的記者職涯歷程圖像】

周富美，1973 年出生於台北。在記者圈，大家總愛暱稱她「小美」。她是台灣解嚴以來，第一位被公部門點名禁止採訪的記者。但她在衝鋒陷陣採訪的背後，卻有顆最細膩的心。1999 年和血友愛滋患者李錦章的偶然相遇，促使她在五年後完成《時間的病》，這也是台灣第一本記錄血友愛滋病患的書。

也許她的確被公部門深惡痛絕，她的採訪理念也總與報社思維格格不入；但是，在另一個鮮少被大眾關心、甚至畏懼的領域裡，小美卻是血友愛滋病患、樂生院阿公阿嬤們的最佳陪伴。

「我應該算是很有個性的人，太有個性了，所以，喜歡我的人會很喜歡，恨我的人會很痛苦，」周富美坦然地自述。而其實，她對新聞理念的看法和實踐，也和她的個性息息相關……

堅持講真話

在家中排行最小的周富美，她的家庭卻沒有輩分的區別和威權的管教，家人支持她做任何事。「所以，你想做什麼就去做吧，」她笑著說。

國中時經歷的填鴨式教育，也因此和她向來習慣的自由作風相牴觸，但她不願甘做籠中鳥，仍然努力把縫隙撐大，想要看到更多的藍天。

於是，她敢在課堂上主動向老師要求，「我想調到 B 段班去。」後來因為她成績不夠爛，所以「只」能調到 A 班。而在全班都不敢抵抗老師的情況下，默默繳學費去補習時，她舉手發言質疑老師；或者，當全班放學後乖乖留在學校晚自習時，她拎著包包走人，因為，「要不要讀書是我家的事！」

有話直說，因此成為周富美最鮮明的個性。「因為太多人喜歡拐彎抹角了，

我覺得很累。」她舉例，「明明就是班上的壞學生，不是很乖，但家裡很有錢。家長一來老師就讚美『那孩子啊，好會念書喔……』」

這些大人們表裡不一的言行，讓她從小就覺得，「大人的世界好虛偽，你們這些人是怎樣，講真話會死嗎？」

不拐彎抹角、堅持講真話的周富美，轉到 A-班之後，也因此得到了自由的空間。而這是她勇於抵抗才獲得的自由。

求學過程除了國中那段不愉快經歷之外，周富美回憶，其餘時光都過得很快樂。高中就讀於松山商職國貿科的她，因為沒有升學壓力，更是自由自在。「我高中唱民歌唱了三年，我想幹嘛就幹嘛。」

然而，家人雖然給周富美幾乎完全的自由發展，但無餘裕供給她物質上的享受，所以她也從高一開始自己打工付學費。「沒有人會幫你出呀，我想念書就自己來呀，反正沒有人管你，你想幹嘛要自己來。」她強調，「我從 16 歲到現在都是如此。」

「孩子的發展是多元性的，只是我家裡都不管我，就任由我發展。」早熟的她，好似跳過了多數人立定志向時會經歷的尋找—困惑—確定等時期，早在小學三年級，周富美就已經知道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想當個寫字的人

問她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想當記者，她的回答很明快，「我小學三年級就知道我以後要幹嘛。」

我不知道人喔，我的直覺還滿準的啦，就是說我將來要當個寫字的人。我小學三年級就知道我將來要幹嘛，所以就幫自己報名社團活動，上作文課(笑)。別人都去打羽毛球，打躲避球；我自己去上作文課。從小就...自己 handle，自己決定。從小就有很多獨立自主權，不會有任何人干涉我。

一直到現在，她還是很懷念過去那段作文課的時光。「從小作文課就是我最快樂的時候，老師叫我寫一封信，我半個小時就可以寫完，覺得奇怪怎麼其他同學還在寫，我就翹著二郎腿在玩別的東西。」問她有多愛寫字，她笑稱連考試也從作文開始寫，「我小時候最變態的是拿到考卷先寫作文、申論、填充，最後寫選擇題，因為我覺得選擇題 123456、adcddefg 呀，很無聊。」

而她從小就把寫字的天賦發揮得淋漓盡致，包括小學生們最頭大的暑假作業。「我可以一天寫完我兩個月的暑假作業的作文，幾月幾日天氣晴，無聊幹嘛每天寫，亂掰把它寫完。我真正的日記是寫到我的另外一本，才不要寫給老師看。」她直率地笑著。

但那時她不知道自己以後會當記者，只是單純想當一個寫字的人。這樣的心願在她考上大學後，逐步實現。

大學就讀於文化大學新聞系的她，原本的第一、第二志願分別是中文系和英文系，新聞系則擺在第三志願。「但是因為成績沒有爛到去念中文系，中文系的成績比較低，所以就不小心填上新聞系了。」不過周富美倒是很感激這樣的陰錯陽差，「後來才發覺念新聞其實比念中文英文好，是因為新聞…可以念中文也可以念英文，其實讀新聞系挺好的。」

而且念新聞系，可以讓她繼續寫字，繼續跟人群接觸。前者是她從小的心願，後者則符合自己的個性。周富美笑說，「每天坐在辦公室會死掉的，真的啊，會死人的。」

從想當寫字的人，一直到念了新聞系後開始寫報導，周富美關切的主題常常圍繞著弱勢族群。她自認這樣的關懷是天生的人格使然，而且也和小時候觀察隔壁鄰居的經驗有關。

從小開始，我會想知道那些人為什麼這麼窮？然後我也知道貧窮是

一個非常沒有尊嚴的事。我從小看到我的鄰居，因為貧窮而被人家恥笑，就是那種三姑六婆啊，就會笑我們家隔壁的誰啊…幹嘛幹嘛。我就覺得這些人，這些死王八蛋的嘴臉真是令人厭惡這樣子，為什麼窮就要被人家恥笑？為什麼他只是因為窮就要被你這樣笑？他也去撿紙屑呀、賣錢什麼的，為什麼你要這樣批評他？所以我那時候開始對貧窮，有一些好奇。

從小不是住在高級社區，出身於一般家庭的她，親眼看到貧窮世界裡的嘲笑和殘酷，身邊血淋淋的例子也讓她歷歷在目。

我有一個同學，他們家很窮，然後媽媽也很愛賭，就是賭到那種家破人亡，然後爸爸帶著他四處流轉這樣，可是那個同學跟我最要好。我另外一個小學同學是她爸爸跟她媽媽離婚，然後她爸拿著刀子砍她媽，還來學校抓她的頭髮要把她帶走。

「小時候看到這種事情，我就覺得很奇怪呀，為什麼貧窮跟賭會害人這麼深？」周富美儘管未遭逢那樣的處境，但對於那些只會在社會新聞裡三分鐘匆匆帶過的弱勢議題，並沒有距離她那麼遙遠。

「我同學的媽媽是酒家女啦，然後她就跟我講她媽媽怎樣怎樣，我小學就聽過，喔原來酒家女的生活是這樣。可是她也沒有覺得很羞恥啊。」她淡淡地說，「後來我同學也變酒家女。」

有太陽在的地方一定少不了陰影，背光的那一面就會形成影子。周富美看到了這個世界的光明和黑暗，還沒能尋找出問題的解答，倒是先從自己父親身上察覺生命的衰老。

大四確定以醫藥記者為目標

「我出生的時候爸爸就五十歲了。」周富美說，「他很老很老然後常常在生病，他什麼時候死你都不知道呀，他什麼時候都可能掛掉。」

因此，除了對貧窮世界的探索外，她從小對四個字非常好奇，就是「生老病死」——人為什麼會生下、為什麼會老、為什麼會病、為什麼會死。她也許對整體弱勢族群的結構面問題無能為力，但周富美對弱勢人權的關心是因為父親而開始。因此她選擇成為醫藥記者，因為那是自己能為父親做的事。

「他又生病又很老，我們家又沒有護士，我又對護士沒有興趣，我喜歡寫字，那我去跑醫藥新聞好了，這樣就可以結合在一起。」因此她拼命增加自己的醫藥常識，大四那年開始去醫院當志工，一直到畢業後成為一名醫藥記者。

「小時候，因為身旁有些人的故事。還有自己爸爸的衰老。」周富美說，「造成你很多年紀是提前的，可能大學才會看見的東西，你高中就看完了。」

一般人到二十歲之會才會逐漸經歷的生老病死和經濟壓力，她卻提前看盡了這些人生百態，不管是這個從她出生那年就開始不斷衰老的爸爸，還是那個從高中就打工賺錢付學費的自己。「我看到一個老頭就想起我爸在他這個年紀他生下了我；然後看到一個小孩，從小要自己打工，我好像就看到了我自己。」生命圖像的酸甜苦辣，她因此總能感同身受。

從小喜歡寫字、喜愛與人接觸的周富美，始終認為「人」是很豐富的一個元素。當她矢志成為醫療記者之後，她和這些弱勢族群的距離，也因為採訪、藉由文字報導變得更親近，甚至在之後締結一段珍貴的緣分。

然而，周富美一開始的求職過程，並不是那麼順利。

與《民生報》失之交臂，陌生來電的鼓勵

1997年，周富美大學畢業。畢業後她隨即懷著滿腔熱血報考《民生報》，目標只有一個，就是醫藥線記者。已經撐到最後一關，最後的結果卻令人失望，她未獲錄取。周富美坦承，那個時候的確相當沮喪。還好，沮喪的感覺沒有持續太

久，她因爲一通電話而重燃信心。

有一個素昧平生、完全不認識的人，就突然打電話給我。她安慰我說，「沒關係，你已經打敗很多碩士生了，只是你專題不會寫。你不會專題企畫，也不能怪你，你沒有經驗啊，你們大學老師沒有訓練專題企畫。」她鼓勵我，「你不一定要來《民生報》，去別的報紙反而更有發展。」

電話那端的聲音很陌生，但卻如新蒸饅頭般熱呼呼地，發散的熱氣圍繞在四周，也直入周富美的心裡。她後來才知道，那個好心人正是《民生報》的資深醫療記者許寶仁。也因爲寶仁姊的鼓勵，周富美打起精神，繼續朝著醫療記者的目標前進。

由於當時必須償還助學貸款，她還是得先努力賺錢。「本來想念書，但後來發覺念書太貴了，我付不起那個學費。」周富美說，「後來我想，算了，先工作。」於是，她先後擔任文化新聞和政大廣電的助教，白天工作、晚上在《長春月刊》兼差寫書摘，一面攢錢，一面充實醫藥常識。

而她心裡也一直惦記著自己必須補強的專題企畫能力，但誰又肯聘一個菜鳥從頭教起呢？結果，她想到的方法很簡單直接，就是親自向《台灣日報》毛遂自薦。她又再一次貫徹了自己的信念——「**想要做什麼就要自己去找**」，不管是自己報名參加作文課社團、請同學教她樂器，又或者，像是這一次積極尋找專題企畫的採訪機會一樣。

我跟《台灣日報》的負責人說，「讓我當特約好不好？稿費多少沒關係，讓我寫。」剛開始不肯答應，我就說，「你要不要試試看，你真的就這樣拒絕我嗎？」他才說好好好。

於是，周富美在《台灣日報》當了半年的醫藥版特約記者。「我連特約、連寫稿都要做醫藥版，都鎖定醫藥版，」她笑著回憶自己過去的堅持。而她也十分珍惜在《台灣日報》的工作機會，甚至遇到採訪費用比稿費多的情況下，也依然自費前往採訪。而這份堅持，在她應徵《民生報》失敗的兩年後得到回饋。

《勁報》專題記者

1999 年，正值《勁報》成立，進軍台灣晚報市場，開始大舉招兵買馬（張旻，1999）。周富美當時被《勁報》招募的專題記者吸引——專題企畫——這正是兩年前她報考《民生報》未獲錄取的主因。因此，她選擇再試一次，也算是對這兩年努力的檢驗。

這一次，她的努力得到了報償。剖析自己這次的成功，周富美認為，「我那時候去考《民生報》時我的專題不夠好，這兩年寫作經驗對我非常有幫助。」當然，對她而言另外一個重要推手，仍然是兩年前那通陌生電話的鼓勵，那位素未謀面的寶仁姊。

「在《勁報》做了一陣子之後我打電話謝謝她。」周富美滿心感激，「我說我現在做得很快樂，謝謝你以前在不認識我的時候願意提點我，願意給我勇氣。」這通電話過後，周富美和許寶仁持續保持連絡。小至新聞寫作職稱的枝微末節，大至周富美之後經歷的職業轉折，亦師亦友的兩人，分享心事至今。²⁴

周富美在《勁報》的日子裡，寫作上有著許寶仁的提點，工作上也勝任愉快。周富美認為，「由於《勁報》是個全新的媒體，它沒有黨政的包袱，而且有國外媒體的精神，當時我的主管非常地給我空間。」

「在那段時間，因為你只要肯衝、願意學習，不怕沒有空間。」她以 921 地震為例，「所以我才會去跑 921，去跑了一個月，主管沒有管我怎麼跑，讓我

²⁴ 2006 年《民生報》停刊後，無緣和寶仁姊成為同事的周富美，曾在部落格回憶這段報考《民生報》的經歷。關於那通窩心的電話，周富美不僅感念也很好奇寶仁姊當年的熱心：「事後問她，她居然忘了自己曾經說過的話，但是我一輩子也忘不了。」（參見 <http://blog.udn.com/choufumei/575169>）

自由發揮。我覺得，那段日子讓我在專題的培養有非常多的經驗，是讓我汲取記者資源非常好的地方。」

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採訪，她已經逐漸熟稔專題記者的工作；不過，周富美並沒有忘記自己對醫藥新聞的執著。「雖然是專題記者，但我那時想，做專題，我全部都做醫藥可以吧。」她笑著說，「所以我只要一報題目我長官就開始說，『又來了！』這樣子。那沒關係它就變成我一個特色了啊，我就是要形塑我自己成為一個醫藥記者啊！」

然而，好景不常，《勁報》終究無法在晚報市場裡突圍求生，2001 年宣告停刊。周富美雖獲留任，但轉任於同屬《勁報》體系的《中天》新聞台，擔任執行企劃。

對於《勁報》的停刊，周富美沒有太大的驚訝，只是覺得可惜。因為她花了兩年的時間，才得到第一份全職的記者工作；在《勁報》兩年的工作和成長，也隨著它的停刊，畫下暫時的休止符。

從《勁報》到《中天》，雖然還無法成為一名專職的醫藥記者，但周富美從中累積了專題採訪經驗和電視影像技術。

周富美說，電視台的工作內容不只是做專題，也要做政論節目；不再只是用文字思考，還要學會更多的影像操作技巧。「要剪接、播音、配樂，要出外景、要聯絡，然後要抄來賓……」她如數家珍地說明每一項工作，而每一項工作的學習，都是重新開始。

採訪李錦章：從醫藥議題聚焦於對於人的關懷

1999 年，一位血友愛滋病患李錦章，罕見地公開在媒體前現身說法，述說自己罹病的經歷，並為其他病患爭取應有的福利。當時，她在《勁報》的同事們沒有人要跑這則新聞，主管問周富美要不要去，她說好。

她答應採訪的那瞬間，世界沒有任何轉變，李錦章仍然持續加速地向死亡步

步邁進；然而，那次的採訪對周富美此後的人生卻影響深遠。

採訪李錦章前，周富美關注於罕見疾病的醫療問題，對愛滋議題涉入不深，李錦章是她認識的第一位愛滋病患。「這個議題在那個時候是非常爭議的，因為是愛滋病患第一次現身嘛。」她最初的疑問是，「但是你會很驚訝怎麼會是一個血友病得到愛滋病的人，第一個站出來。」

回憶採訪當天，她什麼問題都還沒問，李錦章就先倒一杯水請她喝。周富美說，她的立即反應就是得喝下去。而喝下去的剎那就是她與李錦章友誼締結的開端。「他說，其它記者都不敢喝。因為杯子被他摸過，他們怕會得愛滋病。」周富美說，「李錦章覺得我敢喝，就是對他的尊重，他因此願意向我吐露很多事。」

一直到現在，周富美還是不懂為什麼李錦章會有這種想法，但她笑說，「我們的友誼是建立在一杯水開始。」

在那次的訪問裡，周富美最大的感觸是，「我不知道為什麼世界上會有這麼倒楣的人，什麼壞事都沒做，一出生就罹患血友病，在治療的過程中注射被愛滋病毒污染的凝血因子，又得到愛滋病。」

「但是，一個這麼倒楣的人還敢站出來，告訴大家說，我有愛滋病，我是輸血感染的。」周富美感慨，「他書讀得沒有我們多，卻比我們都還要勇敢還要堅強。」

當時他在媒體的公開現身是爲了爭取血友愛滋病患的醫療權利，向藥廠和政府爭取賠償，並且還進一步扮演起宣導預防愛滋病的角色。他把藥廠補償的救助金拿來買保險套，一個個地裝在紅包裡，然後隻身站在西門町鬧區、在彰化火車站前分送。

聆聽李錦章的故事後，周富美還來不及寫成報導，李錦章卻突然要求她，「你是讀書人對不對？很會念書又有讀大學，我們都沒有讀大學喔……你去讀碩士好不好？把我們的故事寫成論文好不好，我們都不會寫字。」來不及做任何思考的周富美，當下就亂答應了。

也因為這段與李錦章的採訪過程，原本立志成為醫藥記者的周富美，在報導重點上逐漸從眾多的醫藥「議題」中聚焦於對於「人」的關懷。而這樣的關懷情感也使得她開始進一步報導血友愛滋病患、愛滋寶寶……的醫療人權與弱勢處境。而她不僅寫報導，也在工作之餘對他們實際付出關心。換言之，在角色上，她是記者，也是志工。

一個跨越生與死的生命約定

與李錦章相遇之前，讀研究所並不在當時周富美的人生規劃裡。然而，命運總會在偶然與巧合裡悄悄指引人們該走的路。

採訪李錦章的隔年後，《民生報》的許寶仁託周富美買研究所簡章。周富美提及，寶仁姊原本要報考的是北醫醫學人文所，結果在報名前夕把簡章丟給她說，「不行我有小孩我不考了，小美你去考，這個很適合你。」

結果，原本沒有打算念研究所的周富美，2001 年，以備取第一名之姿意外考上。「很巧，都是很巧。」她只能用巧合來解釋這一連串的過程：起點是李錦章的一句請求、中途又是「貴人」寶仁姊順水推舟地幫忙，終點站則是實現當年對李錦章的承諾，出版台灣第一本以血友愛滋患者紀實的書籍，以及論文。

而實現這個承諾的時間，從 1999 年跨越至千禧年，一直到 2005 年她研究所畢業。

白天上班晚上念書的周富美，對研究所的生活不以爲苦，她最大的堅持就是要寫一本以血友愛滋病患爲主題的論文。「我讀研究所是因為我有興趣，我可以寫任何論文，可是我為什麼要堅持做這個主題的論文，我覺得那是一個生命的承諾，我承諾他我就要做到啊。」

然而，由於當時台灣尚未出現以血友愛滋病患爲主題的研究論文，找不到參考文獻的周富美，決定自己先寫一本書。書裡的故事主角正是她認識的第一位血友愛滋病患——李錦章。

此後的一年多，周富美持續採訪李錦章。一次又一次地接觸與訪談，她也與李錦章變成好朋友。每逢假日周富美從台北南下，到李錦章的彰化老家記錄他的生活（李錦章、周富美，2004：6）。「我知道，你一直在記錄，包括等到看我死掉的那一天！」李錦章曾這麼對她說（同上引：96）。

2004 年 1 月，李錦章因為病毒侵犯全身器官，急救無效後病逝，年僅 44 歲。他幾乎一輩子都在和死亡拔河，感染愛滋後無疑被宣判了死刑。在生命倒數的日子裡他和時間賽跑，努力做了很多事。然而，生前捐出從藥廠領取的部分救濟金幫助出版的他，還是沒有等到書籍付梓的那天。

周富美說，「自從他過世之後我開始有警覺，不能再拖，要趕快做。因為你再拖下去，（按：血友愛滋病患的）生命只會一條一條死掉。」她開始沒日沒夜寫書趕論文，沒有假日、沒有生活品質，一心把它完成。

2004 年 9 月，周富美完成這本書。她將這本書命名為《時間的病》，副標題是「與血友愛滋病患李錦章的生命偶遇」。

在這本書裡，她的寫作立場是以「為弱勢（即：李錦章）發聲」的態度書寫而成。作為「作家」的她，透過文字將自身對於弱勢的同情與關懷表露無遺。而她與李錦章接觸所產生的關懷情感，也實際影響其記者專業意理的形塑，使她從一名報導醫藥議題的記者，轉而成為一位關懷愛滋病患的報導者與志工。

隔年，她完成碩士論文「台灣地區血友病患與血友愛滋病患之生病經驗」，笑稱把研究所當大學念的她終於順利畢業。終於，周富美花了六年的時間實現她和李錦章的承諾，「一句談笑中的戲言，竟成為日後一個跨越生與死的生命約定」（自由時報，2006.11.12）。

被《中天》違法解聘

這個生命約定跨越了李錦章的生與死，周富美同時也在這六年裡歷經工作的變動。她從《勁報》轉到《中天》，一直到 2002 年考進《自由時報》。這一連串的工作轉換有時並非你情我願皆大歡喜，周富美也嚐過被不當解雇的晴天霹靂。

「我離開中天的原因就是他們不需要我啦。」她繼續解釋什麼叫「不需要」，「就是我被 fire 了，沒有任何理由。」

當時因為中天內部的人事鬥爭，周富美連同其他二十幾位同事無端被牽連進去。她還記得主管們的惡劣行徑，「公司想要違法解聘我們，講不出任何理由，就說你不要做了，我多給你九天的薪水，還要我簽自動離職同意書。」

身旁的同事們儘管氣憤，但最後仍然選擇默默接受再另外找工作，只有周富美和另外一個同事不肯簽。「我當下覺得不可以簽，但是我連《勞基法》是什麼都不清楚，只知道跑新聞……」她強調，「可是那是我第一次體會到勞工意識的感覺。」

所以，周富美主動向勞工局申訴，成功拿回應得的遣散費和預告工資。她不忘自我解嘲，「我不到三十歲之前就知道什麼叫預告工資。」

對她而言，這次事件另外一項重要的意義在於，「還好我有抗爭的勇氣呀我覺得，我同事都乖乖走啦，那就是他們自認倒楣。」

許多生命經歷總是比別人早一步的周富美，在三十歲以前被不當解雇，研究《勞基法》，以及主動去申訴。經過這次事件，周富美不再只是個寫新聞的記者而已，她開始知道自己也是個勞工。

而離開《中天》，也讓周富美的人生有了不同的開始。

大學畢業後，經過兩年的沉潛，三年的工作經驗，2002 年，周富美考進《自由時報》醫藥版。她回憶這段過程，「《勁報》是當專題記者跑醫藥專題，《自由時報》我是考進醫藥版，其他我不要。」憑著一股固執的信念和傻勁，在 30 歲前夕，她終於一圓醫藥記者的夢想，不用再死命地把專題做成醫藥新聞了。

她多年累積的努力將在《自由時報》付諸實踐，然而，她的新聞理想與媒體現實的碰撞，才剛要開始。

同情弱勢，但仍以善盡記者職責為主

2002 年進入《自由時報》後，周富美開始盡情地大量採訪醫藥新聞，踏足

於各醫院、社福單位。延續先前採訪李錦章受到的影響，她也持續追蹤血友愛滋病患的醫療人權，並進一步擴及至愛滋寶寶和整體愛滋病患的醫療、照護問題。

基於自己對弱勢的關懷，身為記者的周富美不只是把報導寫出來，在報導以外，她總是想盡辦法提供訪問對象許多幫助。對於這樣的行為，周富美也曾自省：

以前年輕的時候不懂事，曾經有一段時間，我是過度涉入。我說的過度涉入就是說想辦法給他很多幫助，以為自己是救世主，很熱心地參與他們各種生活急難救助，缺什麼就幫他們聯絡什麼東西。但是後來自己也會累呀，我也不是鐵做的，我又不是社會團體，後來就覺得說，主要就是儘量把他們報導出來。

「從一開始當記者到現在都是，」周富美說，「我覺得我有過度熱心的缺點。」她坦言，當她開始累的時候，才會意識到自己又犯了過度涉入的老毛病了。她舉例，「每個階段都會有累的時候，比方說大環境不好，可能我寫的新聞被打壓，可是還在東聯絡西聯絡，幫他們做這個做那個……」周富美笑說，「但是當他們打電話跟你說句謝謝，然後你就會忘記又會開始忙了。」

「那是一個愛的循環，」她說。然而她也明瞭，一個記者的力量有限，提供再多的協助都必須適可而止，還是要回到記者的本位。「因為你要把你最專長的东西放在最對的地方，就是寫文章尋找對策，而不是忙於急難救助，這不是我記者的本行。」而那也是記者能夠提供的最有效協助。

換言之，在改善弱勢病患人權的整體行動中，周富美是用報導來揭露弱勢階層遭遇的處境，透過新聞的影響力，使政府正視問題的存在，讓大眾知曉社會上有著亟欲待援的另一群人。因此，在新聞專業意理上，她選擇扮演「解釋者」的角色實踐其關懷弱勢的理念。

社福單位不願面對的真相

2006 年，因為同事離職，周富美被轉調社團線，以採訪慈善團體和社福團體為主。採訪對象從急需援助的弱勢族群，轉變為那些幫助弱勢族群的社福單位，這樣的轉換也讓她看盡了所謂慈善機構背後的一面。例如愛滋，那是社福團體們以慈善為名，卻不願觸碰、不願面對的一個真相。

台灣的社福體制是非常扭曲的，就是大者恆大、弱者恆弱。然後弱者永遠都會說大者大，都不會思考自己有沒有改進。然後大者也不會去關懷弱者，比如說慈濟，它永遠不碰愛滋的新聞，可是卻去救助別的國家的愛滋。像世界展望會這麼大，每年募款上億，它的廣告預算是上千萬，可是它卻不碰台灣愛滋的問題。

因此，她對社福單位的看法也和從前不同。以前，她會因為無法再幫他們更多而感到無力；之後，她已經可以用理性的態度看待社福團體。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轉換？周富美闡述，「因為，不成熟的體制，被淘汰是必然的，不成熟的社福團體被淘汰也是必然的。」所謂「必然」指的是，「你成立一個團體，目標就是要解散它。」她進一步解釋，當社福團體幫助的對象已經獲得妥善安置，已經完成社團成立的目標宗旨時，當然就是解散的時候。

並且她認為，台灣的社福團體長期靠政府補助太多，例如愛滋有很多團體，它們都在競爭、競合資源，競爭失利的一方倒閉，時有所聞。「所以，其實這就是自由發展的機制，你不要為了它做更多讓自己辛苦的事情，」周富美說。

社福團體如此，捐助者亦然。「台灣停留在那種殘補式的慈善裡面。就覺得我們要救助可憐人，然後花錢買愛心。」她感慨，「我覺得台灣那種捐助很有愛心，但都是贖罪券心態，捐錢做好事，看能不能有福報。」

身為醫藥和社團記者，那些是她無法解決的大環境結構問題，但她仍然盡力用報導、用文字揭露出其中的問題。然而，周富美竭盡記者本份的結果不僅盼不到社會公平正義的伸張，反倒自個兒先在報社被坑得滿頭包，或者辛苦採訪的報導亦無見報「露臉」的機會。

寫信給家扶，關懷弱勢立場的再次彰顯

2006 年，周富美針對獎助學金的資源分配問題，寫信給家扶基金會，但也為此招來一身腥。

事件的背景是在一場家扶基金會舉辦的受助學生記者會裡，周富美採訪多位接受獎助學金的學子們。其中她訪問的某位學生，求學過程從小學、國中、高中，至大學、研究所，一路以來都接受家扶的協助，更準備赴美攻讀博士。在他出國念書前夕，家扶不僅幫忙申請生活津貼，並替他向感恩基金會申請留學費用（周富美，2006）。

周富美表示，當時訪問了很多受助學生，但她對這位準備出國念書的學生印象特別深刻。

我問他，「你願意當志工嗎？」他回答，「我不知道耶，等我回來再說好了。」我就說，「其實你隨時都有時間可以當志工呀，現在開始也不會太晚，而且你拿那麼多資源出去了……」所以我覺得好奇！因為當時那個採訪的場合，有很多個不同的例子。那種沒有比他拿更多獎助學金的人，或是只有高職畢業，卻願意幫忙別人。人家都願意出來了，為什麼他還說等學成歸國再說？所以我那時候就覺得我不解，為什麼？

因此，在當天記者會後發布的新聞裡，她將重點擺在其他願意回饋社會的受

助學生；對於那位即將出國念書的孩子，則沒有著墨太多。

事件過幾天之後，在那位孩子出國念書前夕，家扶基金會爲他舉辦了一場記者會。《自由時報》社會版用了半版大的版面來報導他。²⁵

看到這則新聞被放大，周富美心裡覺得不妥，因此她寫信給家扶中心。

我就跟他們說，請注重資源分配的公平性，因為就我對這個考生的了解呀，他其實並沒有想要回饋社會的意思，然後就是拿社會資源去完成自己的學業。所以我建議他們在審查的時候，要把學生願不願意對社會能夠有付出的這個…列為考慮這樣子。

寫了這封信之後，也使周富美遭致一連串的悲慘處境。因爲家扶基金會對此很生氣，並打電話給《自由時報》，最後連總編都知道這件事。

回憶那時的風波，周富美淡然地說，「因為我太雞婆了，而且社福團體從來沒有被挑戰過啊，他們覺得做好事應該講他好話才對。」對於事後總編的指責，她平靜以對，「我不會被罵得莫名其妙，因為我知道其來有自啦，但是我只覺得委屈，為什麼會這樣？我覺得很多公平正義得不到彰顯……」

而周富美在這次事件中追求的公平正義，不僅是批評社福團體的資源分配不公，她的最終關懷是爲了整體弱勢處境的改善。亦即，這是周富美「關懷弱勢」立場的再次彰顯。

直言不諱地捍衛新聞理念，與主管當面對峙

另一次與主管發生衝突的例子，發生在 2005 年，復興航空沒有附設起重機，因此無法讓坐輪椅的身心障礙者搭飛機的事件。周富美辛苦地將這則新聞採訪寫稿完畢，卻在最後關頭被抽掉。

「已經排好版了，標都下好了，預計是放生活頭結果被撤掉。」周富美還是

²⁵ 事後那位學生曾在周富美的部落格裡留言，表示周富美或許誤解了他回答訪問的語氣，但他也坦承自己對社會的回饋做得不夠，感謝周富美的叮嚀指教，會繼續努力貢獻社會。

難掩氣憤，「我問我的長官為什麼，他就說，『因為報社高層擔心，復興航空不買我們的報紙，所以他不敢上這則新聞。』你聽了會不會吐血！」

從來就不是逆來順受的她，選擇在開會時當面向所謂的「報社高層」追問。但獲得的回應是，「你記者，為什麼不去追政府弊案，而去追攤販亂擺路邊攤，哪一個應該先做，自己搞不清楚狀況嗎？」

但她也不甘示弱，據理力爭，「請您要注重商譽的重要……你把記者當衛生紙嗎？你是怎麼看待記者的？」「你該做的不做，」高層沒有正面回應，但仍然指著周富美罵。

當時的爭執場景，藉由周富美生動地描述，彷彿歷歷在目。然而當說書人自己就是故事裡的主角時，她無法像說著別人故事般地置身事外。因此，雖然周富美比手畫腳、活靈活現地還原現場衝突畫面，但也坦然表露自己的失望。

那時候因為我們一個很資深的長官離職，我就跟他說，竹玲姊離職對我來講打擊非常大，報社為什麼都不會尊重和重用資深人才？好歹她也為報社付出這麼多年，沒有功勞也有苦勞。我對這件事情非常地失望，再加上復興航空事件，後來我就跟他說，其實報社不是只有看銷售率，還是要重視自己的商譽。我覺得如果不重視自己的商譽的話，那也沒有辦法了……

處在那麼失望的情緒裡，她難道沒有想過要辭職離開嗎？周富美笑著回答，「沒有想要走。」她更透露，「那時長官在開會的時候說，『要是有些人覺得自己不適合當記者，可以提辭呈。』我就說，『你是在說我嗎？對不起我沒有想要離開的準備，我從來沒有想要離開。』當然長官也會覺得很錯愕，我沒有對號入座。」

其實在報社裡，周富美直言不諱的個性不只出現在新聞處理的爭執場合，同樣也發生在應酬社交上的固執。

報社內部有所謂的「御飯糰」，就是跟高層吃飯、吃便當，很像御用的，就叫「御飯糰」。然後就是，覺得大家…反正就是捧高層的人多啦，一定要順著毛摸啦，你也知道，一定要順著毛摸才舒服。老是這樣逆著毛摸，他怎麼會喜歡聽？

如果她懂得順著毛摸，就不可能在開會時據理力爭；長官以為她要離開了，她卻仍然好端端地坐在位子上，持續努力地工作。「當記者」和「有話直說」之間究竟有無衝突？長官對她的說言猶在耳，然而，周富美在《自由時報》的日子裡，她從來沒有違背自己始終如一說真話的個性，一如她在考評表上的坦白。

我在我的考評表說，「我如果不對你說實話就是對不起我的薪水。」講了之後就是倒楣(笑)，可是我都做了怎麼辦？……因為每個報社都要寫考評表，你要跑幾則獨家，你對報社有什麼貢獻？你的貢獻度在哪裡？所以考績會分甲乙丙，我不會被減薪，但是被加薪的永遠不會有我，年終也會有影響。

不管是寫信給家扶，或是復興航空抽稿事件，周富美不曾害怕退縮，每一次都挺直地撐下去，不在乎報社主管對她的評價。她有話直說的個性，也從來不曾被新聞室有形、無形的控制所馴化。

然而，幾年來的採訪經歷不免讓她感嘆，「明明是該被關注的事情，怎麼會被扭曲？採訪新聞的過程當中常常產生很多的懷疑。」一如復興航空對殘障人士的不友善，這些原本應該被報導的事情卻被掩蓋；又或者是血友愛滋病患的醫療人權，苦苦未獲重視。

「有時候覺得世界上很沒有公理，但是能怎麼辦？」擁有一群血友愛滋病患好友的周富美，對於他們的處境，總是心疼又無力。究竟世界上是否有絕對的公

平正義？2007 年，她用最無畏的方式追求問題的解答。

爲了新聞自由，衝撞環評採訪規定

2007 年 8 月，周富美除了跑社團線，也代班跑了幾個月的環保線。嚴格來說，她的環境記者資歷，還不到一年。然而，她卻在這段期間中，遇到記者生涯以來最大的挑戰。

8 月 10 日，環保署邀請第七屆環評委員，召開首次環評委員會。以往開放媒體旁聽的環評大會，卻被環保署長陳重信一句「討論內規」爲由，拒絕媒體採訪（工商時報，2007.08.11）。

周富美不解，何以過去環評大會皆開放記者列席旁聽，唯獨這次例外。因此她在提出異議後，仍然進入會場旁聽。不過卻在會議進行一分鐘後，署長陳重信直接點名周富美請她離場。隨即政風室人員也入場，對周富美一陣叫囂後，要求她離開（周富美，2007）。

「我那時候說，請你用文明來說服我，你只要拿出法規，你只要告訴我，有一條法律規定記者不能來旁聽我就走。他們拿不出來，就使用暴力呀，」周富美說。

政風室人員因此和周富美發生肢體衝突，不僅把她拉跌倒地，更打電話出動員警「支援」，將周富美拖離會場。而人在衝突現場的署長陳重信，全都看在眼里，任由屬下施暴（同上引）。雖然周富美指控在拉扯中被官員碰觸胸部，但環保署官員則否認（聯合報，2007.08.11）。

由於事件發生當下，沒有其他記者到場，環保署將此事「冷處理」（卞中佩，2007 年 8 月 11 日），隔日各報相關報導也未詳細描述周富美的遭遇，僅以肢體衝突等字眼簡短待過。如下圖翻攝：



（資料來源：《工商時報》，2007.8.11）



（資料來源：《聯合報》，2007.8.11）

事件發生後的當天晚上，總編陳進榮找周富美聊一聊，提供許多意見，表達報社關心記者的立場，但也反對她出席環保團體針對此次事件舉辦的記者會。幾

經思索，周富美仍然決定出席記者會，以行動要求環保署對此道歉。

那天的出席，也註定了周富美接下來的命運。自從她出席那場記者會之後，總編拒絕再和她對話。

一如事件發生後，她在部落格上寫的一首短詩，詩的前半段是這麼寫的：「我有一個夢，新聞自由；我有一個夢，沒有暴力；我有一個夢，資訊公開。但如今這一切，都死了。」（周富美，2007）」

新聞自由、資訊公開，是新聞本科系畢業的她被教導的專業訓條，但卻在步入職場後被一一被打破。周富美說，那時總編告訴她，「人家不讓你進去聽，你就不要聽，為什麼一定要聽這一場？」她當時按捺住心裡的想法，「不讓我進去聽就是有鬼嘛，要是沒有鬼，他為什麼不讓我進去聽？」

當然她了解總編的意思就是說，「你很聰明，可能也會毀了自己。我知道你對新聞的熱誠，你有時候表現也很好，但是你太硬了。」周富美苦笑，「我就不懂什麼叫軟，軟就是屈服，就是…你說什麼我就是什麼。」

環評衝突事件發生的當下，時值八月，燠熱難耐。當季節轉涼，微風稍來九月秋天的氣息，但也悄悄開啓了另一場風暴的序幕。

再次爲了新聞自由理念，與環保署發生衝突

根據周富美（2007）的部落格文章闡述，2007年9月17日，環保署再度召開環評大會，開發單位與環評委員皆列席參與討論。而這次會議仍然是閉門進行，並將各媒體「請」到門外的旁聽室。媒體記者觸目所及，只有旁聽席前那片早已緊閉、用窗簾遮掩住的玻璃；唯一派得上用場的雙耳，對與會人士的發言卻也只能無奈地「只聞其聲，不見其人」。

環保署以新聞稿表示，這是因爲環署遷到新大樓後，囿於開會場地狹小，無法再讓相關團體、當地居民及媒體記者進入會場旁聽，所以另設旁聽室。但當天由於環保署與《公視》記者針對能否攝影有歧見，堅持不讓攝影機拍攝的環保署官員，故以攝影機在場爲理由，拉起窗簾拒絕拍攝。此舉使得原本可以進入旁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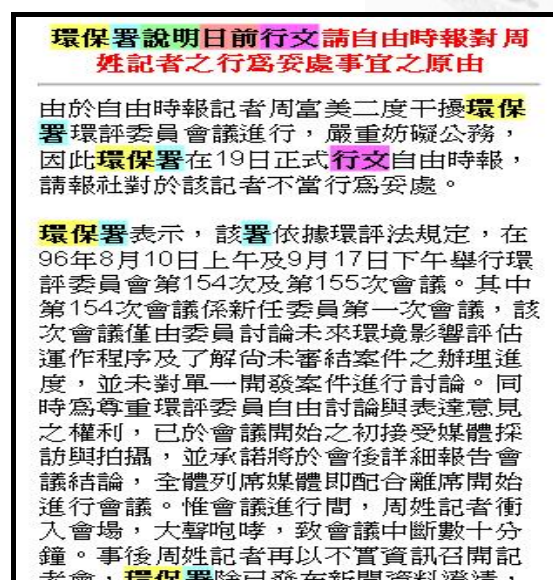
的平面媒體記者也被擋在門外（林靜梅、陳柏諭，2007年9月17日）。

周富美不願遭受這種待遇，爲了捍衛資訊公開和新聞自由的理念，她選擇離開旁聽室，趁著開發單位離場開門的空檔想闖入會議室。環保署駐衛警見狀，立即把她推離門外。堅持不肯走的周富美，她的手和腳被狠狠地夾在會議室門內，死命掙扎。

她大喊，「資訊公開，拒絕垂簾聽政，抗議環保戒嚴，抗議黑箱作業，你們可以夾斷我的手和腳，但是不能拒絕資訊公開。」而政風處人員也再次出馬趕人，女警也隨後到場驅離周富美。

當天被夾傷的手肘和腳背傷勢尚未痊癒，三天後，環保署發函《自由時報》和台灣新聞記者協會，表明不同意周富美再去環保署採訪（蘋果日報，2007.09.21）。周富美成爲台灣解嚴以來，第一位被政府機關點名禁止採訪的記者。

但環保署也發出新聞稿聲明，周富美的行爲已二度妨礙會議進行，而會議原訂討論的報告案因此延宕，影響人民權益。環署也表示，由於環評會議結論仍會在結束後向各媒體詳細報告，故否認周富美對其「黑箱作業」的不實指控。聲明稿如下：²⁶



（資料來源：翻攝自環保署聲明稿網頁）

²⁶ 環保署針對此事的詳細說明可參見：

<http://tw.myblog.yahoo.com/bettybluelin/article?mid=4385&prev=4849&next=4384&l=f&fid=15>

事件的發展對周富美轉趨不利。9月26日，《自由時報》在未詢問周富美第二次環評衝突始末的情況下，逕自將她轉調內勤，且毫無任何申訴管道。周富美不諱言，當時對報社的處理方式非常憤慨，「因為報內有所謂的什麼重大事件調查小組，他們調查不調查，每個都跟啞巴一樣。我還主動申請要調查，他們也不理我，問都不問……」

周富美向報社申訴未獲回音，故憤而在9月27日辭職，並於10月份轉赴台北市勞工局，主動申請勞資爭議調解。此後，周富美走上一條與《自由時報》勞資協調的漫漫長路。同年11月，二次調解會再次破裂後，她目前正改走訴訟賠償的途徑。

第一次環評衝突後，周富美在部落格寫的那首短詩，詩的後半段彷彿已預見事件發展的終點：「**我的夢想，嚥下最後一口呼吸，帶著信仰真理的心入殮。今晨醒來，我看見，夢的墳前，開出一朵公義的野花。**」

關於公理與正義存在與否的解答，周富美選擇用行動捍衛她的信仰，用最素樸的勇氣保護她對新聞自由與資訊公開的堅持。五年半的《自由時報》記者生涯雖然畫下句點，但她守護這份信仰的決心，卻沒有絲毫動搖或後悔。

「**我覺得我之所以該死是因為我堅持做一件記者該做的事情，這句話很諷刺。**」她不斷重複，「對呀，我之所以該死是因為我堅持做一件記者該做的事情。」

堅持闖進會議室旁聽，與環保署官員推擠拉扯……這些舉動對周富美而言，是一件非常簡單、再簡單不過的事情。「**但很多人聽不懂我這個邏輯，而且覺得我不夠優雅。**」她也有聽見別人的批評，「別的記者就會覺得，你有本事就用你的筆修理他，你為什麼要用身體去修理他？你為什麼要用行動去修理他？」

她指稱，「這是台灣記者很大的通病。」並激動回應，「你以為你是誰？記者的筆怎麼可以拿來修理人家？你拿來修理人家，你還配當記者嗎？」做為記者，周富美其實很清楚報導的份際，儘管不滿環保署，她不會因而將這種對立的

情緒寫入報導中，寧可在採訪當下付諸實際的反抗行動。換言之，在新聞專業意圖上，她雖然是個參與型的記者，但不是全然的對立者，大都仍以解釋者的態度報導新聞。

而周富美所採取的反抗行動，是她對於新聞自由的理念捍衛。她也曾自問，優雅和反抗，如果能讓她再一次選擇，她還是會不優雅地直接用身體捍衛自己的信念。

對媒體環境失望

從 26 歲到 34 歲，周富美八年的記者生涯歷經三間不同的媒體。

這八年來她的感想是，「新聞工作很辛苦，然後也很現實。就是，大家都在競爭，搶獨家，好辛苦；但是，很有成就感。」提及成就感，她堅定地說，「我最大的成就是，我依然敢當一隻烏鴉，盡責的烏鴉。」

不管在任何的情況下我都覺得，再也沒有一件比當一隻盡責的烏鴉

，更容易的事情了。對呀大家都喜歡聽喜鵲，然後不喜歡聽烏鴉。

可是在經歷這麼多事件之後我覺得，我還很慶幸我仍然是——原來

清醒的那個靈魂，而且帶著這個靈魂走到任何地方。

為什麼她最大的成就是不是自己曾經寫過的報導、採訪的人事物，而是慶幸自己仍然堅持原本的烏鴉性格——有話直說？周富美回答，「你要維持一個最真實的自己是非常困難的，因為這裡是個大染缸，記者要墮落是很快的，要清醒不容易。」

媒體是個大染缸，周富美指的不僅是同業間搶奪新聞時的明爭暗鬥，還包含台灣媒體的專業精神不再。「台灣已經沒有所謂真正的媒體了。」她感慨，「記者，原本應該是一份很有靈魂的工作，可是台灣的媒體卻自廢武功，偏藍偏綠。」

野外迷路時抬頭尋找北極星，旅者能夠找到回家的路。記者在沒有靈魂的報社工作時，每每遇到歧路分叉處，又沒有北極星的指引；她只能靠強大的信念，讓自己做出不愧對初衷的選擇。

因此，周富美感受到最大的挫折感，是對整體媒體環境的無力。「在商業競爭的模式下，不能說是因為商業主義、什麼資本主義入侵……而是報社自己棄守。」她細數這十幾年來，媒體光景的每況愈下，「從專業報人到家族式經營，第二代小王子小公主，然後商業機制主導，最後把記者當成生產線上的女工跟工人這樣子，不尊重專業，沒有資深記者制。」

她不把自身在環評大會的遭遇、被《自由時報》無禮的對待，視為記者生涯的最大挫折。「那算什麼？根本就是小東西，你懂我意思嗎？自己受挫折，每個人都會。」周富美強調，「可是我覺得最大的挫折是來自於大環境的欲振乏力。」

她舉例，「媒體自廢武功，然後擁戴他要推崇的那個人，我覺得很悲哀啦！」她想起近期的新聞，「你看旺旺，因為一個 A 咖 B 咖 C 咖，把它的總編輯換掉。就覺得，這是什麼媒體呀！雖然大家都知道，可是把你換掉你還不敢講真話。」

不敢講真話，是記者圈普遍的現象，但正是周富美從小到大最看不慣的事。她討厭大人世界的虛偽，長大後卻身處在充斥著謊言和奉承的職場裡。因此，周富美表示，除了媒體環境外，挫折感還來自於整體記者的不自覺，「記者不尊重自己的專業，只會任勞任怨當勞工，沒有爭取自己的權利。」

就像當初她被《自由時報》批准辭呈的那天，周富美在部落格大刺刺寫著「雙十國慶，《自由》獻上『報魂』大禮」。她說，「沒有記者敢這樣寫。」

有話直說會倒大楣的道理誰都懂，「可能我不夠聰明，聰明的人都會搏扶搖而直上，然後乖乖去聽長官說的話，可是，那樣活著有什麼意思？」自稱「不夠聰明」的周富美，八年的記者生涯，她自認活得清醒且對得起自己。

離開《自由時報》後，海闊天空

2007 年離開《自由》後，她曾經找尋其他媒體的工作機會。周富美承認，過去的陰霾的確成為她日後找工作時的阻礙。但她也不斷思考，「環境已經是這麼爛了，還要再進去攪和嗎？然後再當一次第一線記者從頭開始跑……是否有其他出路的可能性。」

雖然還沒理出頭緒，但《苦勞網》早一步找上周富美，邀請她擔任特約記者。在《苦勞網》的日子，周富美過得很愉快。「我認識到，居然有這一群人，這一群傻瓜，在無怨無悔地，為自己的新聞理想付出。雖然說它的品質可能有一點良莠不齊，絕對是有可能的，但是我看到另外一個世界、新聞實踐的可能性。」

她愈來愈能理解，不一定在媒體工作才是最好的。「如果我在媒體工作，我就不會認識《苦勞網》。」周富美更透露，「我是在離開《自由時報》後才知道什麼叫《苦勞網》。」

周富美自承，自從認識獨立媒體之後，發覺他們不僅跟民眾站在一起，並且能寫出更真實的聲音，使她學會更謙卑，也交到更多的朋友。

我以前在所謂的新聞科系、在主流媒體裡面，就像一朵溫室的花朵，被《自由時報》這個大招牌保護得好好的，我根本不知道那些新聞對象如何伺候記者。但是當我離開之後，真正的朋友就出現了。

而且你只要在主流媒體，肯定每一個記者都會有大頭症的時候：「我是《自由時報》耶，怎樣！」肯定會有這種時候。你再怎麼樣自省的記者都有那種被無冕王的光環迷惑的時候。你告訴我你沒有、一輩子沒有，我相信你，但是我懷疑你。因為我自己就迷失過呀(笑)。所以我每天都要把自己頭上的光環拿下來收在口袋裡面，偶爾一

天偶然想起打開口袋，還會覺得閃閃發亮！

當光環不再的時候，恰好是周富美結識這群《苦勞網》好朋友的開始。於是，她慢慢認識什麼叫 web2.0，什麼叫公民記者，什麼叫獨立媒體。雖然在那段時間也曾短暫到育成基金會工作，但她終究還是回到了寫字的生活。「因為生命的節奏都不一樣，」周富美說。

因此，她摸索出自己目前的新身分——自由新聞工作者，以接案維生。「我不用天天跑新聞，我可以寫評論，可以寫專題，或是寫書摘，我什麼都可以寫，」她描述自己目前的工作概況。

周富美接的稿件，範圍不僅在台灣，還有境外媒體，像是對岸以敢言見稱的《南方周末》，以及同屬南方報業集團的《南都周刊》，皆是廣東報章具指標性意義的媒體。「血友愛滋患者在台灣」一文，正是她近期刊載於《南都周刊》的作品。²⁷她說，「眼界就不只是在台灣，覺得還滿開心的。還認識一些香港獨立媒體的朋友，還有中國大陸沿海的公民記者，還有獨立新聞的記者。」

此外她也寫書，寫女性視障者的故事《媚力新視界》²⁸、為律師作傳《林穆嚴：謙和樂仁 律師之光》²⁹。被問及稿費多少，「很少啦！」她笑答，「我的收入不及過去的二分之一，但是我的快樂比過去還要多了一分之二。」就像破籠而出的鳥兒一樣，周富美離開《自由時報》後，反而得到了真正的「自由」。

總結周富美的收入來源，她接稿，但稿件不再以新聞報導為主，同時，她善用多年來累積的文字專業，結合自己對弱勢族群的關懷，用「作家」的角色重新出發，一如之前出版的《時間的病》，或是以視障者為主題的《媚力新視界》。

換言之，不管她是抱持解釋者意理的「記者」，還是直接以文字訴諸關懷的「作家」，辭職後的周富美，她在兩種不同的角色上，更自由自在地實踐其揭露、

²⁷ 「血友愛滋患者在台灣」一文可參見：http://www.nbweekly.com/Print/Article/9485_0.shtml

²⁸ 參見博客來書籍介紹：<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438048>

²⁹ 參見博客來書籍介紹：<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419943>

幫助弱勢處境的理念。另一方面，在賺錢維生上，她亦組合了新聞專業與文字著作，成為一名文字工作者。

「未來，是獨立媒體發聲的時代。」

對於獨立記者的未來，她樂觀預測，「未來，是獨立媒體發聲的時代，因為人們不再相信，所謂主流媒體報導的真實。」

我以前在墨西哥採訪世界愛滋病大會的時候，遇到一個採訪愛滋新聞 14 年的醫藥記者，他都是 freelance。別人有這樣的生存環境，我覺得台灣雖然不是很健全，但是還是有可能。只是看你敢不敢去要，敢不敢去走這條路，還是有可能實踐呀！

對於當前台灣獨立記者面臨的困難，周富美認為，團結起來成立一個工會是必要的。「當前的環境不夠健全，組織工會有助於環境的健全，還有政策等方面都可以透過工會發散給會員。並且，當獨立記者享有勞健保之後，就有了基本的保障。」但是她指著自己說，「我現在沒有加勞健保耶，因為我懶。」

勞健保只是為了符合我們目前國內的法規，就算沒有勞健保，你現在開始當(按：獨立記者)也是可以呀，就看你意志夠不夠堅強。對呀我覺得很多人怕東怕西：「你沒有穩定的工作，你要小心什麼什麼的…」你聽那些三姑六婆講，沒有被嚇死，可能你自己都已經先暈了。你有沒有自信，你想不想要做，才是最重要的。你要真的了解你自己真的想幹嘛，在新聞產製這一塊，你的定位在哪裡。

如同周富美目前接的案子，有些是依賴以前的人脈，或是因為自己的文字專

業而得來的工作機會。「也有可能是它突然掉下來給你，」她笑著說。不擔憂維生困難的她認為，「你不用擔心未來在哪裡，而是看你敢不敢踏出那一步。」

而身為台灣記者協會常務執行委員的她，趁著 2007 年《苦勞網》得到《卓越新聞獎》「社會公器」獎項後，她在 2008 年順勢提議修改章程，讓網路媒體的記者也能加入記協。周富美解釋，「因為以前記協就是，你必須要在大型的機構工作過、在媒體工作過，你才可以加入。」但她認為，「如果《苦勞網》都不可以被認可的話，那還有什麼媒體可以被認可？」

「這件事情我覺得也是一個進步啦，」周富美欣慰地說。

「不再是花盆裡的花朵；而是大地上的小草。」

2006 年，周富美聽從《聯合報》同業的建議，在 udn 網路城邦成立個人部落格。她表示，開設部落格的初衷是爲了讓愛滋寶寶的故事被更多人看到，但她笑說，後來反而寫了很多自己的故事。

成立部落格至今已滿三年，周富美的身分也從記者變成自由新聞工作者，但她始終不考慮轉換部落格的屬性，還是單純把這裡視爲心情抒發的園地。「像別人一樣搞一個部落格寫新聞啊……」周富美自剖，「我目前不會想成立這樣的獨立媒體，因為我知道自己不會去天天經營它。可是我知道，我只要從事寫作這條路就是正確的。」

被問及部落格廣告的可能性時，周富美的回答亦是如此。「部落格廣告當然也很好，但有時候有點吵，很花俏，不過也是一個趨勢囉！但是我不想，現階段不想，等以後我成立什麼公司吧。」

話鋒一轉，她順帶一提部落格名稱的由來——「如果你需要愛」。她解釋，

每個人都需要愛對不對，你希不希望別人愛你，當然希望對不對。

可是，在你希望別人愛你之前，你要先愛別人。你要先懂得付出呀

，不然怎麼會有收穫？當然那個愛跟愛滋有關，如果你需要愛，你來看看這群愛滋寶寶，他們沒有人愛，需要你的付出。

周富美強調，付出的時候絕對不能要求收穫。但是這些付出，無形中會對自己有所回報。「可是這一個旅程有多久？」她自問自答，「在我的 life lesson 裡面，在我的人生功課裡面，是十年。」

環評事件後，我兩年來找了六個律師不理我，很多理由：「對不起我認識你們總編，我是他的好朋友，不能幫你打官司。」這個人還是我們記協的顧問，記協的法律顧問。他說「我不想破壞和他的關係，你另請高明好了。」你說我那個時候會不會很挫折？當然會呀！結果幫我承攬的律師是誰你知道嗎？是十年前我採訪血友愛滋病時，認識的那位打義務官司的律師。世界又繞一圈回來了，只有他願意幫我接案。而且他說我們打官司要有創意！我們幫你告別的。所以我現在是告當初對我施暴的人，不是告環保署長，不是告《自由時報》。

對周富美而言，2009，是個奇妙的一年。「在對的時間、在對的時候遇見對的人。」她用這句話來說明自己這一年來的經歷。十年前她採訪血友愛滋認識的律師，在去年與她重逢後主動幫忙打官司，使之前陷入泥淖的勞資糾紛重見曙光。更讓她不敢相信的是，她在一場愛滋寶寶的採訪活動裡巧遇前環保署長陳重信。

2009 年 6 月我去義光教會採訪。那一天剛好是義光教會的環境主

日。³⁰我是為了採訪愛滋寶寶來的，我也不知道那一天是環境主日，結果我遇到環保署長在義光教會做禮拜。我那時候看到他，我整個人就呆掉。我那時就看著陳重信，他不敢叫我，我就一直看著他離開。我當時很想跟他說，我們都是一樣的。他可以發公文，不准我踏進環保署的門，可是上帝不會阻止我進入祂的大門。在這裡，陳重信再也不能阻止我了，我們平起平坐。公平與正義就在那個時候被彰顯，我覺得。那個時候我就不會再有那麼多的怨懟。

於是，她終於放下對過去那些事情的怨懟，學著更謙卑。而「謙卑」，也正是她經歷辭職風波、成為獨立記者後得到的體悟。「因為以前就是溫室的花朵啊。」周富美說，「當我沒有那些光環後，採訪對象會跟我說『謝謝再聯絡』，肯定是呀！」

因此她深深感受到，「新聞是一時的，友情是一輩子的。」真正的朋友也是在她最困頓的時候出現。去年那些奇妙的經歷也讓她了解，那是上帝要教導她的功課。「所以我離開媒體之後反而更謙卑，」周富美說。因此，謙卑地面對採訪對象，感謝那些從她辭職後不吝伸出援手、提供接案工作機會的朋友，正是周富美成為獨立記者以來的工作心態轉變。

「如果你需要愛，你必須要先付出。」當初開設部落格時，她是為了愛滋寶寶而取了這個名字，如今她是真真切切地體驗這份愛的回饋。「現在的我，不再是花盆裡的花朵；而是大地上的小草。」周富美說，「我的腰更彎，更貼近這片土壤，更懂得付出，而且海闊天空任遨遊。」

寫作：生命中最美好的禮物

對於未來，周富美說，以後再回到媒體也不是不可能，只是不曉得會是什麼

³⁰ 周富美解釋，「義光教會每個禮拜都有個主題，當時 6/5 剛好是地球憲章，所以那個禮拜叫做環境主日，就是說我們要遵守這個地球憲章，然後要保護地球，做一個宣示，表示義光教會的弟兄姊妹們都要去保護環境。」（摘錄自訪談逐字稿）

時候。「什麼時候都有可能發生，只是我最近不想。」她嘆一口氣，「**我最近有自己想做的事情，就是放輕鬆，過去十年我已經太累了，我想要休息一下。**」

然而，若有機會重回媒體，她不再固執地死守醫藥記者的路。「你叫我跑財經也可以，我以前打死都不願意，現在 ok。雖然財經要從頭學起，但記者就是有這種本事。」她感嘆，「我覺得我以前對自己設限太多，只要跑醫藥，但後來覺得太狹隘了，發覺走的路太窄。」

但是她也不願意重回電視。「電視不會想，除非做專題，跑 daily 我就不要。跑 daily 磨損太快，沒有必要把自己的青春浪費在電視新聞的磨損上。」周富美強調，「我還是比較希望經營文字的深度。」

經歷過去的風波，重新在公民媒體看到另一片天空後，現在的周富美認為，「記者應該是全方位的，我期許自己做一個全方位的新聞人。」由於過去的媒體經歷，讓她對於廣播、平面和電視的新聞操作並不陌生，未來，她計畫學習網路傳播，補足自己對一塊新領域的不足。

而在寫作上，她表示，今年設計的主題是要寫評論。「一個記者應該是全方位的，所以我不再只是寫報導，我想去寫評論。」喜歡寫作的周富美說，「即使沒有投稿到報社去，我覺得也是要練筆呀、磨筆，磨自己的筆。」

說到磨筆，一路走來她的工作都跟文字有關。「寫字是我天生的熱愛，絕對是老天給我的恩賜，是我生命的禮物。」她不忘打趣，「不是每個人都像我這麼愛寫。」她強調，「也不是每個人都有寫的能力喔，真的，不是每個人都有寫的熱情，跟寫的動力。」

無論遭遇了什麼挫折，周富美堅持，「不管酸甜苦辣，它都是我生命中最美味的一碗酸辣湯，而且是**生命中最美好的禮物**，我會一直寫寫到死的那一天。」

懷抱著這樣的熱情，以及對記者工作的期許。36 歲的她，積累更多的能量後，生命中另一段美好時光，才剛要開始。

第四節 綜合分析

本章第一到第三節以生命故事的方式，讓三位受訪者敘說各自的記者職涯歷程：從如何進入媒體、確立新聞志向，一直到離開媒體後，如何維持目前的獨立記者生活。爲了捕捉受訪者敘說時的思維脈絡，本文在前三節係以完整呈現三位記者的職涯故事爲主，避免研究者主觀介入其敘說時的自我理解，直至本節再從整體故事的脈絡中，進一步詮釋分析敘說內容裡的意義。

但敘說故事畢竟仍是很主觀的詮釋過程，故事亦透過研究者與研究對象訪談的互動中共同建構完成，而各個受訪者的職涯歷程也有其異同。是故，爲了比較三位受訪者的記者職涯圖像，以及配合第一章提出的兩大研究問題，本節的詮釋分析分爲兩方面：記者職涯與新聞專業意理、自由新聞工作者的維生方式與勞動樣貌。

在「記者職涯與新聞專業意理」中，是藉此分析三位受訪者從敘說中所呈現出的專業意理內涵，並以 Weaver & Wilhot 對新聞專業意理的分類爲基礎，討論他們代表的記者類型，以及影響各自專業理念形塑的不同原因。另一方面，在「自由新聞工作者的維生方式與勞動樣貌」上，本文先援引 Handy 提出的組合式工作觀點，分析三人各自選擇的維生策略，再比較他們在勞動處境上所遭遇的不同阻礙。

壹、記者職涯與新聞專業意理

一、江一豪：從「對立型」記者到「社運工作者」

在三位訪問者當中，江一豪的主流媒體資歷最短。回顧他一路走來的記者歷程，可從中了解他對記者角色看法的轉變。不是新聞科系畢業的江一豪，最初對記者的想像是出自於他對勞工議題的關注，因此認爲當記者是從事社會實踐的途徑——「想要爲工人做點事」。而他甚至也坦言，當記者本身亦能成爲自己的個

人成就。

但經過《話題》雜誌、《苦勞網》和《蘋果日報》的歷練後，江一豪對記者角色的看法，已有逐步的改變。尤其是他採訪及參與社會運動的經驗，更影響其在專業意理上的形構與實踐。

一開始被《話題》雜誌社錄取，完成他想當記者的夢想，是一種自我實現的完成；而《話題》賦予的自由採訪空間，也讓他有機會深入採訪、報導那些弱勢議題和藍領勞工世界。此時的他，在專業意理上抱持著「解釋者」信念，欲揭發社會不平等的全部真實。

然而，對勞工議題了解愈多，了解報導所能發揮的影響力有限，讓他愈來愈不滿足於自己作為記者的角色。尤其之後在《苦勞網》經歷的東菱抗爭、到香港採訪 WTO 見識到南韓農民的抗爭能量後，這兩次報導社會運動的經驗對江一豪而言，是對新聞專業的重新反省，亦是對自身角色的反思。

在新聞專業上，喜歡報導勞工議題的江一豪，在採訪東菱員工的過程中，卻發現自己對工人語言的不熟悉。儘管江一豪還是能完成報導，但仍然覺得自己做得不夠多，並羨慕帶領東菱員工抗爭的社運組織者林子文。因此，另一方面在記者角色上，他也對自身職務產生質疑，困惑於記者與社運工作者的不同角色，何者更能實際幫助弱勢勞工。

因此，在《苦勞網》時期，江一豪抱持的專業意理，已逐漸從「解釋者」轉往「對立者」。雖然他當時仍是一位站在抗爭外頭的旁觀者，但是他不僅以報導揭發抗爭的事實，也以「關廠抗爭紀念冊」的文字圖片記錄，幫助東菱員工抗爭。是故，不論在報導寫作和角色份際上，他雖然還不是社運團體的一份子，但已清楚定位自身為東菱員工發聲、反對政府決策的「對立者」報導角色。

當歷經東菱抗爭事件的江一豪，又一次地在香港 WTO 抗爭現場上被南韓農民積極、有組織的社運模式啟發後，他便毅然決然地暫別記者生涯，以搬家工人的新身分重新開始。此後，他不再是一個處於藍領世界之外的旁觀者，開始親身

體驗工人生活的勞動心酸，為日後的報導積累更多能量。比較特別的是，這兩次影響江一豪記者生涯甚大的關鍵採訪事件，是在他任職於《苦勞網》時期。《苦勞網》作為一個社會運動公民媒體的性質，也為身在其中的江一豪，開啓更多對記者、對社運的想像和視野。

成為搬家工人的江一豪，也曾再回到主流媒體再當記者，卻只在《蘋果日報》待了兩個月。投身藍領生活後的他，一旦重拾記者工作，對於記者作為「對立者」角色的想法只會更加堅定，只想報導自己感興趣的小人物勞動生活，欲藉由報導發揮影響力；因此無法與《蘋果日報》要求的情慾主題做出任何妥協。和報社理念不合的他，於是離開《蘋果》，回歸搬家工作，並持續在《苦勞網》擔任特約記者。

相較於江一豪和《蘋果日報》的短暫交會，他與《苦勞網》的緣份就像是志同道合般的持久延續。這樣的分別顯現了他對主流、商業媒體的失望，並且堅持自己的報導原則，不輕易棄守。

若從新聞專業意理的角度來分析，江一豪對小人物、勞工……報導主題的堅持，甚至直接以搬家工作維生，不僅呼應他最初欲為勞工發聲的初衷，也可看出他對於揭露社會階層不平等事實的堅持，以及他慢慢從「解釋者」蛻變為「對立者」的記者角色。亦即，他不只是揭露事實，還企圖以報導作為社會實踐、改變社會不平等的工具，並且不再只將記者視為一份帶來收入的工作。而從他只在《蘋果日報》待了兩個月的過程也說明了，這樣的新聞專業理念顯然與商業媒體的獲利考量相牴觸。

終於，他抱持的「對立者」新聞專業意理、以及在搬家勞動中對藍領生活的體悟，最後在三鶯部落裡具體實踐。

實際參與三鶯部落抗爭的江一豪，他為三鶯部落寫的報導——「拆了我還是要回來」、「預知三鶯記事」——不僅是用文字對外發聲，更作為輔助他從事抗爭行動的武器，是以報導來輔佐行動。而江一豪捍衛三鶯部落的報導立場不僅與政府的

拆遷政策相左，同時，他更跨越了旁觀者的界線，成為三鶯部落自救會顧問，將理念化諸於實際行動，成為一名帶頭反對政府的「對立者」記者。亦即，他不僅藉由報導批評政府，更主動介入抗爭，從事社運行動來扭轉政府拆遷決策。

因此，在新聞專業意理上，江一豪做為「對立者」角色的理念型塑，乃於三鶯部落的抗爭場域裡真正實踐。離開主流媒體後，他以獨立記者的身分逐漸走向社會運動的參與者。換言之，他不僅用報導來表達對政策的反對，更用實際行動來聲援。參與三鶯抗爭的社運經驗，因而造就他在新聞專業意理上的轉變，從一位「對立者」的記者，轉而成為一位「社運工作者」。

另一方面，在新聞寫作上，江一豪以「傳聲筒」和「共謀者」來比喻自己撰寫新聞的特色，這樣的比喻也呼應了新聞學理中「鼓吹者」、「參與者」的意涵。亦即，他是為弱勢發言的「傳聲筒」，清楚定位自己是為弱勢發聲，更邀請三鶯部落的居民們一起「參與」來寫新聞。而他甚至在採訪時，用提問讓居民反思自身的處境，再藉由陪伴他們，幫助三鶯居民以自己的力量站起來，這點正是江一豪過去採訪時未曾做到的部分。

離開媒體後，拋開主流媒體記者的頭銜，他以獨立記者的身分，對訪問對象不僅是觀察、報導，完成報導後仍持續陪伴、付出關懷，甚至使訪問對象的狀況獲得改善。以三鶯抗爭為例，江一豪的新聞專業實踐方式，不僅以報導批評政府拆遷政策，對三鶯居民的同情與關懷，也讓他用實際行動力行抗爭，成為社運組織者。

綜上所述，使江一豪從「對立型」記者轉向「社運組織者」的關鍵採訪經驗，是東菱和香港 WTO 韓農抗爭的社會運動採訪經歷，而從事搬家工作也使他一腳踏進陌生的藍領世界，但直到三鶯部落抗爭時，他才真正成為領導抗爭的掌舵者了。這些過程的影響，不斷形塑江一豪對記者角色的看法——從揭露事實的解釋者，進一步成為用報導反對政策的對立者，甚至站在抗爭最前線，統籌指揮。如今，在《苦勞網》及個人部落格發表新聞的他，記者工作不再是他維生的職業；

作為公民記者的江一豪，將理念灌諸於報導中，當作其與社會對話的連繫。

嚴格來說，江一豪的主流媒體記者經歷僅僅一年十個月，離開《蘋果日報》後，在《苦勞網》發表新聞的數量亦不多產。他最大的目標仍是社會實踐的推動，例如參與三鶯部落抗爭，實際從事社會運動。因此，對於江一豪的新聞專業意理的形塑與實踐，本文將他歸類於從「對立型」記者變成「社運工作者」的專業意理演變過程。

二、朱淑娟：從「資訊傳佈者」至「解釋者」

朱淑娟在三位獨立記者裡資歷最資深。和江一豪一樣，她也非新聞科系出身。畢業後因緣際會在《聯合報》系工作，直至 36 歲時才改行當記者。當她離開《聯合報》之際，已具有十一年的記者資歷。也因此，她所抱持的新聞專業意理之形塑與演變，大多體現於《聯合報》的工作生涯中。

在路線經歷上，她從最初的電子資訊線，轉換到環境線。對朱淑娟來說，形塑其新聞專業意理的主要時期，正是在她改跑環境線之後。因為最初在電子資訊線，她採訪產品發表記者會，然後將產品資訊傳達給閱聽眾，是扮演一個「資訊傳佈者」的角色。然而，採訪環境線不僅需要重新累積環境知識，她也因為與公部門環保署的接觸中，才真正體驗到記者在監督政府與人情意理上的為難之處。

例如她在揭露阿瑪斯號油汙案內幕的過程中，感受到記者角色與消息來源／採訪對象介於監督與朋友間的微妙關係，甚或是新聞揭露後對消息來源造成的影響或傷害。而當她身處在一場場公聽會或抗議現場中，朱淑娟也學習如何按捺對環保團體和抗議民眾的同情，力求持平報導，還原事件真相。

所以，經由環境線的歷練後，朱淑娟學習如何掌握監督政府的角色份際，以及壓抑對污染受害居民的同情，從原本的「資訊傳佈者」角色，轉而成為一名監督政府、報導環境污染真相的「解釋者」記者類型。

換言之，她認為記者應當與消息來源（無論是抗議團體或公部門）保持距離，以便公允地分析與報導事實，例如揭露污染事實或政府部門處置失當的真相。而

這也正是朱淑娟對記者角色的看法：分析、揭露事實，但不涉入政策制定、不參與環保團體抗議或決策過程，謹守「解釋者」的報導身分；而非像江一豪一樣，屬於介入抗爭的「對立者」記者角色。

雖然她也會感到憤恨和挫折，例如她揭發六輕超量用水的事實後，最後被經濟部四兩撥千金地以「台塑已提出變更用水」為由，對台塑一毛錢都不罰。或是她在《聯合報》後期時，對中科四期議題的窮追不捨，辛苦寫出的報導卻往往落得無法見報的命運。但朱淑娟最後選擇以抽離和觀察的角度來看待，而這樣的立場也使她沒有成為一名參與抗議活動、反對政府決策的「對立型」記者。

儘管她辭職後，不再受限於長官的要求或版面的限制，以獨立記者的身分更能盡情報導；但她不會因此與環保團體走得更近。和從前在《聯合報》不同的是，由於少了版面限制，她可以讓抗議團體在新聞篇幅上有充分發聲的權利。另外，若欲加上個人觀點的抒發或自己的現場觀察時，她獨創以「記者注」的方式標明之。如此一來，在新聞寫作上，她不僅涵納多方觀點，更能藉此呈現事件的多元面貌，再加上自己的個人分析。而這也著實實踐了「解釋者」專業意理的意涵。

另外，她與其他兩位獨立記者的另一項不同之處，則是她辭職前待在《聯合報》的十一年記者資歷。這段時間她從生澀到資深，形塑其專業意理的同時，卻也同步經歷了報社每況愈下的慘澹營運、記者角色的隨之低落，以及環境新聞愈益不獲重視。

朱淑娟曾坦言，到了後期，愈來愈懶得跟主管爭環境新聞的版面，甚至也轉而尋找容易被登出的軟性新聞。然而，已屬資深記者的她對現況感到無力，對於多年來所形塑的專業標準——揭露與分析的解釋者意理，更是一項打擊。認為自己「無法再做一位真正的記者」的朱淑娟因此心灰意冷，選擇辭職，並利用網路平台成立「環境報導」部落格，繼續做一位「真正的記者」。

矢志報導環境新聞的朱淑娟，離開媒體後以一人之力獨立報導新聞，但仍將「環境報導」部落格定位為「媒體」，並堅守專業環境記者的崗位，持續追蹤報

導在《聯合報》工作時不被主管重視的中科議題。是故，她的部落格好比是電子版的報紙，成為環境新聞的另類發聲管道。因而，不管是身於商業媒體的囿限中，或是處在獨立媒體的自由空間裡，她對於環境新聞所堅持的報導原則，在專業意理的歸類上已顯現為「解釋者」的記者類型。

是故，從朱淑娟的記者職涯歷程，以及從中呈現出的新聞專業意理演變過程，本研究將她歸類於從「資訊傳佈者」至「解釋者」的記者類型。而朱淑娟與江一豪分別作為「解釋者」與「社運工作者」的不同身分，在角色實踐上也因此有所不同。江一豪是將記者理念付諸於三鶯抗爭，以報導輔佐自己所親身實踐的社會運動。而朱淑娟乃堅持記者報導角色，她的角色實踐便是用一篇篇的新聞報導來守護環境。與江一豪相同的是，他們同樣都在主流媒體之外，以獨立記者的身分關注於不同的實踐領域，尋求突圍、發聲的可能。

三、周富美：介於「解釋者」與「對立者」之間

周富美的背景和其他兩位訪問對象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她是新聞科系出身，而且從小就渴望與文字為舞，大四便確立志向要當個醫藥記者。不過，她雖然志向確立得早，卻未因此走得一帆風順。

周富美多舛的媒體經歷自《勁報》開始，她得到第一份專題記者的工作，更因為一次採訪經歷而開啟她和血友愛滋病患李錦章的相識。但之後因報社停刊，她被轉派至同集團旗下的《中天》新聞台任職。然而，在《中天》工作未及兩年，又因內部人事鬥爭，無端遭到波及的她，被無預警開除。

及至她考取《自由時報》時，終能實現專職醫藥記者的理想，她和《自由》的情誼卻在五年後因環評事件而吵鬧收場。雖然遭逢記者生涯的重大挫折，但離職後的周富美，卻也因而看清記者理念在主流媒體裡的不被尊重和難以實現。

總體來說，周富美在主流媒體闖蕩八年的媒體經歷，她的記者理念一開始是基於對醫藥線的堅持，立志採訪醫藥議題。在《勁報》時期因為採訪李錦章，因而開啟她對弱勢病患人權的關懷。換言之，在專業意理形構過程中，周富美因為

與採訪對象李錦章的接觸，使她從醫藥領域的眾多議題中，更為聚焦於愛滋病患、愛滋寶寶等權益伸張。換言之，就關懷倫理的概念而言，她藉由實際與採訪對象接觸後，產生對於人的關懷情感，因而影響其記者專業意理的內涵形塑。因此，在報導主題與關懷重心上，周富美開始從「議題」，轉而延伸到「人」身上，而這也正是她在專業意理上的重要演變。

同時，從周富美的新聞實踐方式可得知，她對血友愛滋病患以寫書或報導的方式，為弱勢病患人權發聲。或是她寫信給家扶中心建議獎助金的合理發放，以及為了讓復興航空不讓殘障人士登機的新聞上版面，不惜與主管槓上等作為，不僅只是批評社福團體的資源分配與報社內部政策，實則是源於她對弱勢處境的關懷和同情。這樣的理念與報導方式，也和她與採訪對象接觸而產生的情感與責任息息相關。

然而，儘管周富美對採訪對象有其個人關懷，但是她與訪問對象的關係，又不全然地一味涉入而失去了記者應有的界線。雖然曾坦言自己有過度熱心的缺點，同情弱勢團體處境也時常協助幫忙；但生理心理不斷產生的疲憊也提醒她，記者始終不是急難救助的負責單位，而是扮演以報導揭露事實、促成相關政策討論的監督與轉介角色。

因此，在專業意理的內涵上，由於周富美面對著同情弱勢與公正客觀的複雜矛盾，她因此在「解釋者」與「對立者」中遊走。一方面，她努力以調查報導揭露、分析事實。心態上雖欲為弱勢發聲，但在實際新聞操作上，仍盡量維持和訪問對象的角色份際，是為「解釋者」意理的展現。另一方面，她也將自己對弱勢團體的關懷，以記者身份之外的方式實踐，例如以作家角色撰寫《時間的病》，真正「介入」其中，為血友愛滋病患發聲，藉此影響外界與政府對相關議題的重視。因此，她是以作家身分實踐「對立者」意理內涵。

又如在環評事件裡，周富美拒絕閉門審議、捍衛資訊公開，因此與環署政風室官員發生肢體衝突。傷痕累累的她最後還被其他記者批評為「不夠優雅」、「為

何不用筆來修理他」，但她的回應是，「記者的筆怎麼可以拿來修理人家？你拿來修理人家，你還配當記者嗎？」儘管不滿環保署，就算遭逢最難堪的採訪經驗；她仍然不會將這種情緒寫入報導中，對記者的角色定位有著明確的界定。

從《自由時報》離職後，儘管周富美也曾到社福團體工作，從報導者轉換到實際從事急難救助的角色；但她還是待不久，她仍然喜歡處在記者的那一端，以「解釋者」的身分，撰寫社會中亟待援助的弱勢群體，然後再以志工或作家的身分默默提供協助。就像她在《時間的病》裡直接為李錦章發聲一樣，而在《媚力新視界》一書，她也為視障者寫出動人的故事。

換言之，雖然形塑周富美新聞專業意理的關鍵，源自於她與採訪對象的互動，影響其寫作方式與報導主題，但她沒有逾越記者角色的份際。離開媒體後，身兼記者、作家兩種角色的她，透過文字寫出不同風格的文章。不管是記者或作家，她在這兩種角色都透露出對人的關懷情感。

離開媒體後的周富美，和江一豪、朱淑娟相比，她發表新聞的頻率較少，不像江一豪直接以社運者的角色，參與、報導抗爭，亦不同於朱淑娟努力做為一位報導環境新聞的公民記者。反之，周富美在報導新聞之外也開始寫書，逐漸轉型成一位文字工作者。亦即，她是個抱持著「解釋者」意理的「記者」，也是以文字訴諸關懷的「作家」。

是故，轉而成為獨立記者的周富美，在新聞專業意理的實踐上，仍然是一個她口中的「寫字的人」——化身為記者與作家的雙重角色——同樣都以「文字」作為她持續關懷弱勢的實踐武器。這也讓她一路走來的新聞專業意理內涵與屬性，不僅是一位從「議題」轉向「人」的解釋型記者，擁有雙重身分的她也具有更多實踐的可能。

貳、自由新聞工作者的維生方式與勞動樣貌

一、江一豪：結合「新聞」與「他業」的組合型工作

目前的江一豪，不再是主流媒體受雇員工，而是公民媒體《苦勞網》的無酬特約記者。維持他繼續採訪的經濟來源，是他平日從事的搬家工作；而他在勞工生活裡體驗到的藍領勞動，又從而豐富了自己的寫作視野和採訪經驗。換言之，新聞工作對他而言，已經不是經濟取得的來源，他也並非以接案寫稿的方式賺取收入。

以維生方式來看，江一豪的收入來自於無關記者本業的搬家工作。但由於群力搬家的「勞動合作社」性質，作為搬家工人的他，同樣是以「跑單幫」的方式接案工作，而非如同一般搬家公司的固定作業。因此，這樣的彈性接案使得他的工作時間充滿彈性，不是朝九晚五，擁有其他時間來寫新聞，或是到三鶯部落討論組織抗爭事宜。

另一方面，群力搬家「人人都是頭家」理念，使他離開《蘋果》後，江一豪不僅是獨立於主流媒體之外寫報導，也是自主於大型搬家公司之外跑單幫過活。本文於第二章曾闡述 Handy（1998）提及的「組合型工作」概念，來形容自由工作者的生活。而江一豪身兼搬家工人、公民記者，與三鶯部落自救會顧問的三種身分，也「組合」了他目前的生活方式。

自由工作意味著「自僱」，雖然這樣的工作形式有其不確定性，但他卻也因此保留了自身對記者工作的興趣、對三鶯抗爭組織（即從事社會實踐）的熱誠，以及從事支撐其生活金錢所需的搬家工作。換言之，江一豪的生活組合了「新聞」與「他業」（無關新聞本業的搬家），這樣的生活方式也讓他在理想與現實裡取得平衡，賺取金錢也同時得到成就感。

而江一豪這樣的組合型工作，生活費依靠搬家工作，但接案形式的跑單幫，與獨立記者接稿維生的處境亦有雷同之處。文化勞動者（如：自由新聞工作者）接案時受限於自身聲譽多寡，或是必須依賴過去人脈給予的支援，才能得到寫稿的工作機會。

同樣地，江一豪和其他搬家工人共同成立的群力搬家，性質上屬於個體戶組

織的他們，缺少大型搬家公司的既有客源和老字號招牌優勢。因此必須透過客戶一個接著一個的口耳相傳，讓消費者了解「勞動合作社」的理念，才能將群力搬家塑造為一個被消費者信賴的新品牌。亦即，這種接案式的搬家工作，雖然不涉及文化勞動，但皆屬自由工作領域裡的「自僱」形式，故遭逢類似的勞動處境。

而在勞動樣貌上，作為搬家工人，江一豪的收入與從前在《蘋果日報》的薪水差距甚遠。但是這樣一個不再有老闆的自僱式生活，相較於過去他所服務的康福搬家，現在的他，擺脫以前經歷的規訓空間，賺取的薪水也用不著再交給老闆。因為在群力，人人都是頭家，賺取所得平均分配，因此，江一豪的收入比以前在康福時多，勞健保方面則與過去沒有太大的不同。

同時，作為獨立記者，江一豪的新聞專業仍藉由《苦勞網》的發表平台和個人部落格作為發聲管道。他還是拿起攝影機、敲打鍵盤，寫出自己想分享給社會的新聞作品，例如三鶯部落的抗爭與部落內部的點點滴滴，以延續其對社會階層不平等的關懷。然而，相較於主流媒體記者，獨立記者身分的「妾身未明」，沒有一個某某媒體記者的頭銜，也因此不時在採訪時受到刁難。

江一豪因而表示，在勞健保的保障上，可以用「靠行」（例如：加入一般職業公會）來解決。但新聞自由對獨立記者造成採訪上的阻礙，他認為，這是記者離開主流媒體後，在採訪寫稿時面臨的最大難題。

而雖然他將個人部落格當作新聞發表的平台，但目前尚未以部落格做為獨立記者生涯長遠規劃的打算。這是基於他選擇的自由工作組合，是仰賴搬家與新聞專業的結合——以搬家維生，以新聞專業來實踐其報導勞動、弱勢階層的理想。因此對於自由新聞工作者的未來，例如以網路媒體、部落格刊載新聞作為營運獲利模式，這不是江一豪目前最關切的事項。

笑稱不懂得如何賺錢的他，在其記者生涯規劃裡，「獲利」、「營運」並不占據太過重要的角色。而江一豪身兼記者、搬家工人、與三鶯部落自救會顧問的三種身分，從維生方式到三鶯部落的抗爭參與，從裡到外皆實踐其為弱勢、為勞工

發聲，改善社會不平等的理念。

二、朱淑娟：以「新聞專業」為主的組合型工作

不像江一豪以另一種新聞專業以外的工作賺錢維生，朱淑娟辭職後，仍然以接稿的形式維持生計。十一年的記者資歷所累積的新聞專業、個人聲望和人脈，讓她得到源源不絕的接案機會，甚至應接不暇地頻頻推辭。換言之，朱淑娟的維生方式仍與新聞專業有關，亦即，身為獨立記者的朱淑娟，不僅能夠自由報導，也從報導中賺取收入。

因而，依照上述 Handy「組合型工作」的觀點來看，朱淑娟的工作組合是以新聞專業為主幹，再往下找尋與新聞有關的不同接案機會。從上節的故事敘說中得知，朱淑娟主要的接案來源是《台灣環境資訊中心》、低碳生活部落格以及《公視》我們的島，此外也在各社大兼課、或者到學校演講。

大抵來說，她的接案內容不僅大多和新聞工作相關，內容主題也堅持以環境為主。因此，她所做的工作不僅支撐其採訪所需，是收入來源，也是自身的興趣與熱誠所在。就算目前的收入和過去相差甚遠，但也至少不虞匱乏。從維生的角度來看，朱淑娟選擇以接案為主的生存策略，顯然打下初步的基礎。

而從本文於文獻探討中，針對文化勞動所做的分析可得知，約聘創意工作者在文化勞動場域裡尋找工作機會時，勞動酬賞與接案機會深受工作者自身聲譽、才氣等市場價值的影響。朱淑娟能夠藉由新聞專業接案寫稿維生，也和她多年來擁有的專業知識、人脈和個人聲望等資本有關，因而為自己離職後的獨立記者生涯累積了穩固的後盾。

並且，她用以發表新聞作品的環境報導部落格、facebook、peopo 公民新聞平台，無形中也成為一個宣傳的管道，一方面使更多人藉此更認識、更欣賞她寫的報導之後，再回饋給朱淑娟更多的採訪機會。另一方面，這也塑立了朱淑娟專司報導環境新聞，及其作為獨立記者的個人品牌形象。

朱淑娟也了解自己具有的優勢。她十一年的記者資歷在報社的栽培下成長，

多年來的專業累積，因而成就她以「環境記者」為標誌的專業形象。然而目前的報社環境與朱淑娟當時的狀況已經不同，新進記者鮮少有機會長期經營自己的路線，不時必須代班、換線，支援其他新聞路線。換言之，若後輩記者欲仿效朱淑娟，複製其生存策略，尚須加強固定領域的新聞專業累積與路線人脈的建立，才能在離職後得以接稿維生。

另一方面，關於勞動處境方面，朱淑娟和江一豪一樣，都不認為勞健保是自己脫離主流媒體的羽翼後，獨立記者所面臨到的最大困難。身為《環資》特約記者的朱淑娟，藉由「靠行」，以《環資》為老闆（即所屬媒體）的方式解決勞保的問題。至於健保方面，她則是自行前往區公所掛保。

並且，由於環保署曾因為朱淑娟報導中科四期的新聞，與朱淑娟鬧得不太愉快，因而質疑她的記者身分——「是以什麼身分在採訪新聞」。這讓她認為，新聞自由的爭取對獨立記者來說非常重要。

以《環資》特約記者名義採訪新聞的朱淑娟，常見到公民記者被擋在環保署外頭，無法入內採訪。然而，目前除了立法院需要換證（記者證）之外，事實上並沒有法條明文限制，只有主流媒體記者才得以進入公部門採訪。朱淑娟因此主張，公民記者其實是有權利到各部會採訪；然而她這樣的看法卻和現況不同，這點也可看出公民記者的採訪權仍需積極爭取。

作為個體戶的獨立記者，朱淑娟認為，除了新聞自由的保障之外，收入亦是維持自由新聞工作者生涯的重大挑戰。表面上來看，她的接案工作源源不絕；但朱淑娟坦承，就連她自己也要承受著每個月收入的不穩定。這是因為接案性質的組合型工作，雖然不用每天通車趕上班，沒有固定的例行公事；但工作量情況常常大起大落，也許幸運接到許多工作很忙碌，但也會面臨接不到工作、坐吃山空的窘境（Handy，1998）。

朱淑娟目前是用多個接案來源的收入，組合出每個月的薪水。照她的說法是，每個月都能夠賺到「基本工資以上」的錢，但每個月的收入都不穩定。不過，

她試著不去看每個月的收入起伏；而是把眼光放遠，計算一年能夠賺多少錢，反倒讓心情更篤定踏實。而這也看出朱淑娟從領取固定薪水的受雇工作者，轉換為自由工作者之後，自身在心態上的調適與轉換。

去年朱淑娟獲得華文部落格「年度訊息觀點」首獎，她一人身兼編、採、寫，藉由部落格傳遞環境新聞的另類觀點，終於獲得肯定。身為獨立記者的朱淑娟，目前仍堅持藉由新聞專業接案維生的模式，將報導刊載於部落格中，讓自己的部落格成為環境新聞的發聲平台。因而，現階段她並不考慮在部落格接受任何的贊助或廣告，或是將之轉型為營利模式、增加個人收入。這樣的態度是為了確保獨立媒體的「獨立」精神。

綜上所述，以獨立記者為「志業」也為「職業」的朱淑娟，將一篇篇的環境報導藉由部落格的平台傳遞，使環境新聞突破主流媒體單一窗口。並且也以接案方式作為自己獨立門戶後的生存策略，組合而成的接案工作也多與其新聞專業相關。

相較於江一豪以社運行動實踐其新聞理念，用新聞專業之外的搬家工作賺錢維生；朱淑娟選擇在辭職後同樣發揮新聞專業，以多種接案工作組合來賺取收入。兩人的維生方式雖然有所不同，但也同樣承受著收入不若以往的落差，呈現雷同的勞動樣貌。對於投入獨立記者生涯未滿一年的朱淑娟來說，關於收入，仍然是個且戰且走，尚未有明確答案，卻必須積極面對的問題。

三、周富美：結合「新聞」與「文字工作」的組合型生活

相較於江一豪以搬家維生、朱淑娟以接案報導的方式維持獨立記者的生活，周富美的維生方式則是以文字工作為主。她接稿，如《南方周末》、《南都周刊》，她也寫書，當起作家，一樣用自己擅長的文字做為餬口的工具。

換言之，雖然周富美與朱淑娟同樣以接案報導維生，但朱淑娟的接稿範圍是以新聞工作為主，尤其是與環境議題相關；周富美則偏向廣泛的文字工作。以 Handy 提出的組合型工作概念來看，周富美的工作組合以文字為主，涵納不同類

型，如新聞報導、書籍著作。她的角色兼具記者和作家，甚至是去樂生院當志工，因此也是本文訪問的三位獨立記者中，工作組合最多元的一位。

並且，在周富美的工作組合中，她可以靠寫稿、出書賺錢，同時也做一毛錢也領不到的志工工作，但每樣工作她都是真心喜歡。她認為這樣的生活，自僱且自由。

從單純報導的記者，變成一個多元的文字工作者，是周富美目前選擇的維生模式。離職後她寫新聞的數量雖然減少，但新聞主題與報導類型卻更加多元（例如：影評、書摘），寫作的空間更為遼闊，只不過收入也比過去少了一半。

同樣地，和江一豪與朱淑娟一樣，物質慾望不大的她，享受目前自由自在的生活，淡然看待辭職後收入和採訪機會的減少。對於目前的接稿機會來源，她認為除了透過以前的人脈介紹之外，還得一併仰賴自身擁有的專業累積。換言之，雖然文化勞動場域裡對名氣、才氣的著重，但周富美認為，專業知識同樣是獨立記者尋求工作機會時掌握的重要利器，二者實為相輔相成。

在自由新聞工作者的勞動處境上，周富美是三位訪問者當中，對獨立記者組工會一事的態度最為積極。她表示，當前自由新聞工作者面臨的難題（例如：收入、新聞自由），可透過工會集體互助的方式，對內蒐集各方困難，集結對外表達心聲。

不過，雖然她認同集體力量的重要，仍強調一切事在人為。甚至連勞健保都沒加入的她，認為自身的決心和意志力勝過於一切。因為，誠然組織工會有助於獨立記者勞動條件的改善，但自己的意志力夠不夠堅強，才是維持自由新聞工作者報導生涯的關鍵。「**你不用擔心未來在哪裡，而是看你敢不敢踏出那一步。**」這是周富美對獨立記者未來的看法，也彰顯自由新聞工作者個性積極，即知即行的一面。

由於周富美經歷八年風風雨雨、波折頻起的記者生涯，離職兩年後的她，心態上顯得較為淡定。雖然認同獨立媒體的理念和前景，卻不像朱淑娟以獨立記者

的身分熱切報導環境新聞，也未如江一豪一樣投身於社會運動的場域裡。維持自僱生活時間最久的她，目前只想好好休息。然而，和其他兩人一樣，這三位獨立記者都在各自自由的報導生活裡，遭遇同樣不穩定的收入處境。

而目前只把部落格當作心情抒發管道的周富美，雖然認同部落格廣告是一個趨勢，但她自己仍想將網誌單純地營造為一片寫作的園地，與江、朱兩人將部落格作為新聞發表平台的作法不同。她與其他兩人在網路個人媒體的不同發揮，也彰顯周富美目前以廣泛文字工作為主的角色定位與維生方式，不再只將作品侷限於新聞領域，因而擴大了獨立「記者」角色的多元可能性。這樣的可能性是否會擴大為自由新聞工作者未來可能賴以維生的生存策略，是本研究對周富美目前職涯發展的另一種觀察方向。

以上整理了三位受訪者的職涯歷程，從中分析出他們在新聞專業意理內涵上的形成與演變，分別是：從「對立型」記者到「社運工作者」的江一豪、從「資訊傳佈者」到「解釋者」的朱淑娟，以及周富美從醫藥「議題」延伸至「人」的關懷。

而他們辭職後對於維生方式的不同選擇，在工作上呈現出的組合型生活樣貌——不管是謹守新聞領域、納入（他業）搬家專長，或轉往多元文字領域的不同工作組合——也與他們自身對專業意理的信念息息相關。同時，雖然他們從事的實踐作為不甚相同，但同樣面臨類似的勞動處境，不過三人仍然對現況甘之如飴，珍惜所擁有的獨立報導空間。

本文將於第五章結論部分，回答本文提出的兩大研究問題。探索本文研究的三位獨立記者，在新聞專業意理上的形成與演變。尤其探討三人在客觀工作環境的轉換下（組織雇員 vs. 獨立記者），在「參與者」意理上的不同理念實踐。另一方面，本文也從三位受訪者離職後選擇的不同組合型工作，探討自由新聞工作者如何在維生、與維持獨立報導空間之間，尋求兩相權衡之下的可能出路。

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與討論

本文於第四章研究詮釋，從三位受訪者敘說的記者職涯圖像中，已分析出他們在專業意理上的演變與不同實踐，以及目前從事的不同組合型工作。而在本章結論裡，將根據第一章提出的兩大研究問題，分為專業意理、自由新聞工作者維生策略與未來發展三面向，就本研究的發現回答並討論之。

壹、自由新聞工作者的專業意理

第一個研究問題是，從組織雇員到獨立記者，自由新聞工作者的專業意理如何形成與演變？

依據第二章對專業意理的定義——「記者對於媒介功能及記者角色的信念系統，而這樣的信念系統是經過一段長時間的培養，內化為其製作新聞的指引。」

本文藉由三位獨立記者的自我敘說，從其長時期的媒體職涯歷程中，理解他們所抱持的報導理念與記者角色。這三位獨立記者的共同點是，他們過去皆服務於主流媒體、並且自願或非自願地離開媒體。雖然這是本文對研究對象選取的預設標準，但研究結果也發現，他們另一個共同點是對於媒介功能的看法——認同媒體扮演社會公器與監督政府的功能角色。

就以他們共同對媒體功能的認知而言，再加上本文以「媒介功能與記者角色」作為專業意理的定義，本文發現，三位研究對象皆屬於「參與型」記者，非單純以一位中立報導者的姿態傳達事實；但是基於個人關懷領域與報導立場，三人「參與」新聞事件的程度各有不同。因此本研究援引 Weaver & Wilhot 對「參與者」的進一步區分，透過「解釋者」與「對立者」的概念，更細緻描述三人如何不同地實踐「參與者」意理。並且再從三人的記者職涯歷程裡，找尋影響與形塑他們

在專業意理上的演變因素。

首先，在各自記者職業路徑（career path）的開端上，三人成為記者的起源各不相同。江一豪是受到簡錫堦與鄭村棋辯論的啟發，接著被「往事只能回味」紀錄片裡抗爭勞工的場景撼動，因而希望藉由當記者來實踐其為勞工發聲的理念。周富美則是就讀新聞科系，在學校訓練與個人熱愛寫文章的雙重影響下，因此培養出對新聞工作的興趣，以醫藥記者為目標。36歲才當記者的朱淑娟，工管系畢業後，在《聯晚》長期從事行銷企劃與程式設計的工作，卻在離職前夕，因黃年欣賞她在報系刊物裡發表的文章，於是建議她轉當記者。她因此以電子資訊線記者身分，開始新生涯。

換言之，三人分別受到不同因素的刺激，例如演講和紀錄片的啟發、學校教育的訓練，或是職場主管的拔擢，這些因素因此成為各自進入媒體工作的契機，同時亦形塑其對記者的初步想像。而他們踏入媒體職場後，不同媒體工作環境的轉換、調線，或經歷的採訪經驗等因素，也強化或改變其原本的報導領域或記者信念。

研究發現，欲揭發社會不平等的江一豪，在《話題》雜誌時，即開始不斷採訪勞工與相關議題，是其累積新聞專業與理念實踐的基礎。而當他經歷工作環境轉換，到《苦勞網》任職後，採訪社運的經驗是促使他反省記者角色的關鍵。他開始不甘心只是站在抗爭外圍的報導者，渴望與群眾一起參與抗爭。在專業意理上，江一豪因此逐步從《話題》時期之「解釋者」揭發社會不平等真相的角色，在報導立場與實際行動方面轉向「對立者」意理，亦即，他不僅報導與參與社運，更渴望從事社會改革，真正改變社會被壓迫者的弱勢處境。

朱淑娟則因轉調環境線，成為她專業意理內涵轉化的關鍵——從一位報導電子產品資訊的「資訊傳佈者」角色，轉而採訪公部門環保署、環保團體，與污染所在地居民。在監督政府與同情弱勢的兩難下，她逐漸形塑其分析、揭露事實的「解釋者」專業意理。亦即，她不會介入、參與環保團體抗爭，也與公部門保持

監督與仰賴其新聞線索提供的微妙關係。因此在角色份際上，相較於江一豪選擇直接與群眾站在一起，朱淑娟爲了實踐其揭露與分析新聞事實的理念，故與採訪對象保持一定距離。

周富美在組織雇員時期的重要關鍵轉捩點，是她在《勁報》時期採訪血友愛滋病患李錦章，使她在報導上從原本身處的醫藥「議題」領域中，更爲聚焦、延伸至對於「人」的關懷。換言之，她從採訪經驗中產生與李錦章之間的情感與責任聯繫，讓她因此寫愛滋報導，呼籲外界重視愛滋病患的醫療人權和弱勢處境。是故，採訪李錦章的經驗成爲改變與形塑周富美專業意理理念的關鍵。同時，在專業意理的實踐角色上，同情弱勢的她仍以善盡記者報導職責爲主，不踰越扮演社福團體的急難救助角色，並選擇用志工身分付出關心。也就是說，在報導實踐上，她是以「解釋者」的理念揭露弱勢病患的處境，再藉由新聞的影響力幫助他們，而非直接介入社福團體的支援體系中。

比較三人的專業意理屬性，研究發現，江一豪傾向爲「對立者」，他將自我角色定義爲「爲勞工發聲」，把記者定位爲社會改革的工具。而周富美介於「解釋者」與「對立者」之間，在角色上她與受訪對象關係密切，熱心地幫忙解決他們的困難。但在報導上，她雖重視弱勢的聲音，不過仍期許自己以寫文章尋找對策的形式來分析事實。相較於江、周兩人，朱淑娟則屬於「解釋者」的記者角色，主張記者必須和受訪者、團體保持距離，在採訪及寫作上著重其公允的態度。她雖承認自己的報導仍會存有主觀意見，但基本上她是以揭露事實而非介入現場的方式報導新聞。

總體而言，本文研究結果顯示，儘管三位受訪者的專業意理實踐角色具有「解釋者」與「對立者」的不同區分，體現於報導寫作、與受訪者的關係，以及角色份際上，三者皆有其不同專業態度。然而，其實他們的報導立場與個人理念同屬「參與者」意理，對於媒介監督政府的職責抱持相同的看法，也不全然謹守中立客觀的記者角色。本文亦發現，雖然三人的新聞專業意理內涵不甚相同，但最後

他們從媒體離開的原因，卻也與其共同抱持的「參與者」意理密切相關。

想要採訪小人物勞動心酸的江一豪，他的報導理念與《蘋果》對於「人間異語」專欄規劃的情慾主題相違。欲為勞工發聲的他，顯然這個訴求很難在《蘋果》裡實現。而他不僅寫報導，還想要改變或幫助弱勢處境等作為，實則超越了記者單純報導事件的身分，也讓他在商業媒體裡深感有志難伸。

朱淑娟則是在《聯合報》歷經了報業黃金年代的衰退，不景氣的媒體環境也同時壓縮了環境新聞的空間，例如中科議題因此往往落得無法見報的命運。已屬資深記者的她對現況感到無力，無法再以報導揭露環境汙染真相的朱淑娟，因此心灰意冷地離開。

周富美的離開起因於她在環評事件中與環保署的衝突，她自認對新聞自由和資訊公開的堅持沒錯，不滿被報社轉調內勤而選擇辭職。但在環評事件之前，她報導醫藥議題和弱勢團體的單純心念，或是欲揭露社福團體資源分配不公作為報導主題等作為，也常與報社內部營利考量的政策相抵觸。

因此，雖然觸發三人離開媒體的關鍵事件各有不同，但是參與者意理在主流媒體發揮空間的壓縮，是他們選擇出走的共同因素。尤其對於珍視新聞專業的三人來說，組織目標與個人專業標準的拉扯，成為身在媒體內部的他們最感無奈的處境。

雖然三人抱持的參與型專業意理無法在商業媒體裡實現，但辭職後他們成為自由工作者，以獨立記者的身分為公民媒體、獨立媒體寫稿，發表個人著作，或是透過在部落格發表新聞的方式，仍然繼續實踐其「解釋者」或「對立者」的新聞理念。

本文因此認為，參與者意理在商業媒體與獨立媒體中實踐的難易，亦與現今媒體營利至上的經營政策有關。新聞專業的實踐戰場故有逐漸轉移至獨立媒體的態勢，新聞工作者復以「獨立記者」的角色，繼續延續其記者生涯。

而從組織雇員到獨立記者的記者生涯轉換，也讓三人在各自專業意理的演變

上，呈現出不同面貌。江一豪從「對立者」進一步轉換到「社運工作者」的角色，直接涉入三鶯抗爭行動，反對政府拆遷政策。朱淑娟則同樣扮演「解釋者」記者角色，不再有所謂大報記者的包袱，且仍然堅持自己不是誰的代言人。並藉由獨立記者的角色，更能實踐其監督政府、報導環境的理念。而她同時也讓環保團體的聲音有更公允的版面呈現，使環境事件或抗爭展現多元的真實面貌。最後，介於「解釋者」與「對立者」之間的周富美，則是持續以文字的方式表露其對於「人」的關懷，身兼記者與作家——透過報導與著作——分別以報導實踐其揭露弱勢處境的理念，也寫文章深刻描繪弱勢群體的心聲。

是故，三人從組織雇員到獨立記者，職涯歷程裡經歷的關鍵事件（工作單位轉換、調線，或採訪經驗），以及媒體環境（主流 vs. 獨立）與工作形式（他雇 vs. 自僱）的轉換，形塑了三人今日所抱持的專業意理內涵。若將參與者意理視為一光譜，解釋者與對立者分處於光譜兩端，則三人在此光譜中所處的不同位置，距離對立者一端的或近或遠，皆與今日所扮演的不同實踐角色息息相關。並且，三人在專業意理上的不同演變，雖然是基於個人的激進手段選擇；但三者關懷的不同報導領域，與個人理念，亦影響各自對其記者角色位置的確認與作為。

然而相同的是，三人都追求其理念體現於新聞報導上的純粹真實，例如江一豪對於社會階層被壓迫者之真實處境的探究、朱淑娟對於環境事件中各方聲音（公部門與抗議團體）的呈現與分析，抑或是周富美對於弱勢族群的關懷與報導，在在都影響三人一路走來的記者職涯歷程，因而呈現出相似的經歷——從主流媒體出走，透露出類似的理想——揭露社會真實的參與者意理內涵。

貳、自由新聞工作者的維生策略

本文第二個研究問題是，**實踐新聞專業意理的過程中，自由新聞工作者離開媒體後的維生方式與勞動樣貌為何？**

在維生方式上，本文發現，三位受訪者從受雇員工轉為自僱身分，由於不再

擁有每個月薪水的固定入帳，因此必須自力尋求多種工作維生。研究結果亦顯示，本文從三位受訪者維生工作中所拼湊出的組合面貌，對於理解獨立記者領域的自由工作類型與自僱生活探討上有其參考價值。

江一豪的維生方式，是靠無關記者本業的搬家工作。而身兼《苦勞網》特約記者、三鶯部落自救會顧問，與搬家工人的他，他的自僱形態是結合了「新聞」與「他業」（即新聞本業之外）的組合型生活。在他的工作組合中，有些可以賺錢，如搬家；有些是基於個人興趣和責任，如記者，或參與三鶯部落抗爭。相同的是，這三者都是他的熱誠所在，賺取金錢也獲得成就感，工作更不再是固定的例行公事；然而也同時充滿彈性和不確定性。

相較之下，朱淑娟的維生方式，則一樣是仰賴新聞專業尋找接案工作機會。換言之，在她的工作組合中，主幹是新聞專業，再往下延伸至相同類型的不同接案工作，例如：《台灣環境資訊中心》、低碳生活部落格以及《公視》我們的島。並且她同樣都以特約記者的身分，為這些單位採訪寫稿，賺取收入。同時，這些接案工作的另一個共同點，是皆以環境議題為主。這是朱淑娟的個人堅持，也使她從事以「新聞專業」為主的組合型工作，不僅成為其收入來源，更是自身的熱誠和關心所在。

周富美的維生樣貌，是結合了「新聞」與「文字工作」的組合型生活。她以特約記者的身分寫稿，撰寫她所關懷的血友愛滋主題，例如她發表於《南都周刊》的新聞作品「血友愛滋患者在台灣」。和江一豪相同的是，她也同樣具有《苦勞網》特約記者的身分，雖然目前寫稿沒有任何薪水，但是可針對文章形式自由發揮。另一方面，她也是一位作家，寫書賺錢，書寫她所關懷的弱勢主題。是故，周富美的工作組合裡充滿不同類型的文字工作，有些能賺錢，有些則否，但她同樣都在這些組合工作中獲得自僱的自由和熱誠。

自由工作者從事的組合型工作，不僅工作內容與時間彈性，也讓賺錢兼具熱誠與成就感，這樣的自僱生活顯然挑戰了現代社會對於工作的既定想像。然而，

組合型工作備受質疑的是，自由工作者是否真能藉此維生？本文研究發現，擺脫組織雇員的固定工作模式、取得組合工作主導權，進而賴以維生的前提，其實與獨立記者過去的工作歷練和專業累積有關。

江一豪雖以搬家工人一職維生，但他曾經是爲了想體驗藍領勞動生活，才毅然轉行到康福搬家公司任職。因此，江一豪任職於《蘋果》前，在康福工作的他已擁有新聞與搬家兩種專業技能，是故，當他從《蘋果》離職後，因而重拾搬家工作並藉此維生。先前於康福的工作經驗也讓他了解，在搬家領域中，「靠行」體制如何剝削旗下勞工的金錢與勞動力。是故，他號召並連同其他工人共同成立「群力搬家」。也就是說，「群力」不再有靠行制度下的「老闆」存在，而是以「個體戶」的形式「接案」搬家，收入所得也平均分配。因此，獨立維生前擁有搬家經歷的江一豪，不僅藉由創立「群力」實踐其勞動合作社的理想，亦因此得以維生。

朱淑娟從《聯合報》辭職前，更擁有十一年的記者資歷，其中包含了八年的環境線歷練，實爲一名資深的環境記者。因此，她過去的媒體經歷所累積的新聞專業、個人聲望與人脈，也讓她之所以能夠藉由「新聞專業」爲主的組合型工作維生。換言之，就文化勞動者具有的資本而言，她在自身聲譽、才氣等市場價值上握有優勢，不管是外在口碑形象或是內在自我專業內涵，皆是她多年來的耕耘成果。

周富美在《自由時報》時期，爲李錦章撰寫的《時間的病》一書，於 2004 年出版。是故，在離職前，她已擁有出版寫書的經驗。另一方面，總計八年的媒體記者生涯，也累積其在醫藥領域上的專業優勢，以及新聞專業與文字寫作上的技能掌握。因此，離職後她兼具記者與作家的雙重身分，亦即仰賴「新聞」與「文字工作」的組合型生活維生，這樣的維生方式實則與她自身的出書經驗與文字領域的專業累積有關。

換言之，三人今日的組合型工作模式皆與她們過去的工作歷練與專業技能相

關，並且因而藉此維生。然而，在勞動樣貌上，三人亦有所面臨的工作難題。

江一豪和其他搬家工人共同經營的群力搬家，「人人都是頭家」的概念類似於自僱工作意涵。由於少了「康福」這塊耳熟能詳的招牌，是故，與自由工作者一樣，「群力」在接案時也面臨到「聲譽」的考驗，因而必須藉由自我宣傳和舊客戶的口碑推薦，以重新塑造、累積自身的聲譽資本。

同樣地，儘管朱淑娟在接案上不虞匱乏，但她仍極力形塑其個人品牌形象，例如在個人部落格、facebook，和 peopo 公民新聞平台上作為其宣傳管道，藉此讓更多人認識她。2009 年她得到全球華文部落格「年度最佳訊息觀點」首獎，也因而讓她經營的「環境報導」部落格更為人知曉。從她的例子裡可發現，獨立記者掌握的聲譽資本，以及自身的個人品牌形象，與其接案機會的多寡，猶有相關。

周富美於醫藥線多年的耕耘，使她形塑其醫藥記者的專業形象。雖然她最後是為捍衛新聞自由的理念而離職，但她也為此結識了《苦勞網》，擔任其特約記者。並以《苦勞網》為基礎，進一步認識其他獨立媒體與公民媒體，從而獲得寫稿機會。三人中維持自僱生活最久的她，維生方式以廣泛文字工作為主，工作組合最多元。本文發現，周富美的多元工作組合除了是本身興趣所致，同時也與她這些年來的人脈累積有關。不管是她對醫藥領域的持續報導，或者是多元的書寫主題（如：影評、書摘），從中積累的經驗與專業又得以再往外尋覓更多接稿、寫書工作。

換言之，在獨立記者尋覓工作機會的勞動樣貌中，專業知識與聲譽資本乃為相輔相成。本文的三位研究對象，分別在工作歷練、專業累積（無論是新聞或他業）、個人品牌三方面，互有其掌握的優勢所在。三人至今的自僱生涯雖然在收入上與過去的記者薪水相距甚大，但目前仍可維生。然而，三位受訪者各自以組合工作為主的維生模式，是否能「長久」經營其獨立記者工作生涯？本文認為，若欲號召更多主流媒體的記者投入獨立報導，或者是讓有志於新聞工作的學生有

另一項記者生涯選擇，目前研究結果所得出的維生模式，由於係仰賴三位受訪記者過去的專業累積與個人聲譽，恐無法普及於沒有主流媒體經驗，但欲以獨立記者為生的有志之士。

是故，本文接下來將討論自由新聞工作者如何拓展目前的接案規模，甚至開創新的維生途徑之可能性。而這不僅是為了減低「入行門檻」，擴大自由新聞工作領域；更是促使獨立記者能在新聞理想與經濟現實中取得平衡，使他們雖不為五斗米折腰，但也過得不虞匱乏，從而繼續延續其報導生涯。

就本文選取的三位獨立記者而言，雖然其維生模式各有不同，但三人其實都藉由網路平台（例如：部落格或公民媒體網站）發表新聞。而他們另一個共同點，則是皆擁有個人部落格。不過三人使用部落格的方式有所差異：江一豪和朱淑娟是將部落格作為新聞作品的發聲管道，周富美則純粹以網誌形式抒發心事。但不論如何，自由新聞工作者藉由網路平台發聲的方式已是一項趨勢。並且，正因為網路的影響性不可小覷，如何藉由經營部落格、營利賺取收入，亦是自由新聞工作者未來維生模式的可能途徑。

一如本文於第二章提及的伊拉克青年 **Salam Pax**，身處戰爭所在地巴格達的他，透過部落格傳達美伊戰事下的另類、在地觀點，迅速攫取世界各地「網民」的關注。換言之，經由網路平台呈現的新聞，雖然缺少主流媒體組織運作和實體版面呈現，但卻同樣具有高度影響性和能見度的潛能。而自由新聞工作者如何藉由此影響性、營利維生，本文同樣於第二章介紹過的美國知名部落客 **Joshua Marshall**，他更親身實踐如何藉此營利。

Marshall 經營個人新聞事業的方式，是直接透過部落格賺取收入。他的收入來源仰賴部落格廣告和讀者捐募，藉由收入所得，不僅得以維持其採訪所需，也進而擴大成立一個小型的新聞工作室，目前共有七位記者一同報導新聞，讓部落格的新聞來源更加豐富且深入。

然而，同樣擁有個人部落格的三位受訪記者，對於像 **Marshall** 一樣，藉由經

營部落格、營利賺取收入的未來發展，都沒有類似的生涯規劃。朱淑娟更擔憂，一旦部落格轉型為營利經營，會侵害記者自由報導的獨立精神。不過她曾於訪談中透露，未來也欲聘請助理協助部落格建置，以及影音新聞後製處理。但這些聘請費用，她坦言，仍是得自掏腰包買單。

相較而言，不排斥廣告收益的 Marshall，則是利用此收入擴展部落格的新聞平台，聘請記者，從事更多的採訪計畫。當然，部落格營利是否有損於獨立記者的專業自主報導權利，是另外一項討論的課題。但 Marshall 的確是因廣告收入來支撐其採訪所需，從而提升部落格新聞品質，爭取讀者的信賴，也同時再得到讀者回饋以金錢上的支持。

是故，本文認為，對於本研究的三位獨立記者而言，若欲讓自身收入更穩定，擴大個人新聞事業的規模，以及其新聞意理實踐的影響性，Masrshall 透過部落格營利的例子，可作為三人未來維生規劃的參考。並且，對於沒有媒體經驗的公民記者來說，為了彌補此歷練欠缺，可思考如何運用部落格網路傳播的影響力，藉由一篇篇新聞的發布，來塑造其個人品牌及專業形象。如此一來，不僅能藉此累積其聲譽資本，尋求接案機會，再藉由廣告營利，拓展維生模式。

自由新聞工作者實踐專業意理的過程中，除了遭遇維生模式的挑戰外，另一方面，不再是主流媒體組織雇員的新聞工作者，尚須面對獨立記者採訪時身分的認定問題，而此一困境亦關係於獨立記者的報導生涯維持。尤其是跑公部門新聞時，持有一張記者證的效力，就是一紙入內採訪證的許可。而能否入內採訪，對於抱持著參與者意理、愈挖掘事實真相的獨立記者來說，是他們能否繼續發揮、實踐專業意理的關鍵。

身為《環資》特約記者的朱淑娟，相較於江、周二人，她最常前往公部門採訪。因為環保署不滿朱淑娟針對中科四期環評的報導，曾質疑她的記者身分，甚至向 NCC 詢問《環資》的媒體性質。雖然朱淑娟最後藉由「靠行」——以《環資》為所屬媒體——的方式解決身分上的疑慮，更自行備妥《環資》特約記者的

名片，得以順利採訪公部門機關與環評會議。但獨立記者，或是整體公民記者採訪權的伸張，仍是有待解決的問題。

據朱淑娟回憶，當時 NCC 回應環保署對《環資》媒體性質的質疑時，曾做如下表示，「媒體的定義很廣泛，只要有在自己的部落格或網站發表文章，就可以稱為記者，並不需要來 NCC 登記說他是媒體還是記者。」

其實，公民記者採訪權的議題可回溯至 2007 年 2 月，當時 NCC 主委蘇永欽同意發給輔大學生林靖堂一張記者證，同意他採訪 NCC 的記者會。但後來 NCC 根本沒製作採訪證，回覆林靖堂說沒有「記者證」這種東西，只讓他以行政人員的名片進場。所謂全台第一張公民記者證，最終只是口說（蘇永欽承諾）無憑（仍然沒有一紙記者證的證明）（黃詩凱，2007：33）。

然而，目前絕大多數政府機構並未製發特定採訪證件給記者；而是以各媒體機構的識別證，作為放行與否的依據。多數長期主跑相同路線的記者，甚至不主動佩帶證件，照樣出入自如。這也是因為官員熟悉主流媒體記者，因而對現場記者會的提問狀況較能掌握。相對而言，若開放所位公民記者和部落客來採訪，則擔心會有意外狀況發生，同時也可能增加行政成本（同上引）。

但朱淑娟認為，在整體公部門的採訪體系中，除了立法院之外，沒有條文明文規定，只有主流媒體記者才擁有採訪權，才得以入內採訪。顯然，政府資訊公開法的尚未完備，是造成官方機構對主流記者採訪視為慣例的主因，甚至目前仍由官方自行決定誰能擁有採訪權或記者證。再加上公部門對網路社群之概念和特性的認知不足，以及不想打破慣例，避免節外生枝的心態，亦使公民記者採訪官方機構時頻頻受挫。

江一豪和周富美由於採訪路線與朱淑娟不同，他們在公部門體系之外，較少遭遇到記者身分的質疑問題。然而，三人同樣認為，離開媒體後的他們，採訪時的受限，無疑是其繼續實踐專業意理的阻礙。因此，新聞自由的爭取，是當前自由新聞工作者面臨的挑戰，甚至也是整體公民記者必須集結爭取的權益。

綜上所述，在自由新聞工作者維生模式的建立上，三位受訪者目前透過不同形式的組合作維生，接案機會的多寡與其自身擁有的技藝、聲譽資本息息相關。然而，相較於如何拓展目前的接案規模、開創新的維生途徑等面向；他們反而更擔憂的是新聞自由的受限，亦即未來可能遭遇的採訪受阻情形。但大致來說，三位獨立記者的勞動樣貌皆呈現出單打獨鬥的個體戶維生模式。對此，本文也將於第參部分進一步討論自由新聞工作領域的未來發展：一方面探討自由新聞工作者對於過往傳播者研究、以及專業意理理論所造成的影響。另一方面亦介紹英國自由新聞工作者如何以集體組織的形式保障其勞動權益，藉此進一步思考獨立記者生涯發展的另一種可能形式。

參、自由新聞工作者的未來發展

在第壹部分自由新聞工作者的專業意理討論中，已深入分析三位獨立記者的專業意理角色。研究結果顯示，根據專業意理的定義——對於媒介功能與記者角色之信念系統——作歸類，他們皆屬「參與者」角色。換言之，三人都欲經由報導以揭露事件真相，加入記者的個人詮釋，甚或藉此改變社會不平等現狀。

同時，一如 Weaver & Wilhoit (1986) 將「參與者」細分為「解釋者」與「對立者」，本文除了發現三位受訪者皆屬於「參與型」記者，也從他們不同的報導理念與實踐作為，發掘出「參與者」的角色內涵存在著差異。儘管如此，Weaver & Wilhoit 的研究結果卻發現，「對立者」並非記者採納的主要角色；「資訊傳佈者」才是多數新聞工作者普遍抱持的角色觀。

然而，本文研究結果顯示，相較於「中立者」或「資訊傳佈者」，三位獨立記者反而皆擁有不同程度的「對立型」記者特質。例如從「對立者」進一步成為「社運工作者」的江一豪，他不僅藉由報導批評政府對三鶯部落的拆遷決策，更介入其中，組織居民一同發動抗爭；不再只是一位記者角色。又如介於「解釋者」與「對立者」之間的周富美，有時選擇對弱勢處境深入調查與報導，有時是以實

際行動幫助採訪對象。三人當中，雖然朱淑娟謹守「解釋者」意理，但是她對於環境議題（例如：中科四期）長期地關注報導，也的確促使外界逐漸關切中科造成的諸多問題。換言之，儘管過去的研究結果認為，「中立者」是多數記者普遍傾向的角色觀；但本文針對自由新聞工作者，所總結出的不同「參與者」實踐類型，顯然與以往的專業意理研究發現有所不同。

事實上，過去對於「專業意理」的討論，研究的記者對象與本文著重的獨立記者並不相同。因為，過往多針對於不同採訪領域（如：外交、政治），或不同媒介記者（如報紙、電視）的職業角色差異。而這些研究的共同點為——他們皆是處於媒介組織的新聞工作者。

也就是說，以往對於專業意理的探討，是針對「媒介組織」中的傳播者，並多以記者呈現新聞的方式（即量化方法），來評斷其專業意理。例如 Weaver & Wilhoit 是以專業價值、工作條件等作為指標，進行量化分析。然而，當記者脫離媒介組織後，「獨立記者」與「媒介組織記者」的工作條件已有不同，並且二者對於報導內容的主導權亦有所差異。換言之，當自由新聞工作者的概念愈益普及，並且有機會成為記者生涯的另一種選擇後，對於傳播者的研究範疇而言（例如本文聚焦的專業意理，或者是記者的角色行為），有必要再擴及於「獨立記者」的角色內涵。

並且，尤其本文並非以過去普遍使用的量化方法來研究專業意理，而是藉由記者的個人敘說來探討報導背後，其自身所抱持之理念與目的。因此，在自由新聞工作者的角色研究上，本文因而更能理解獨立記者的新聞理念與專業實踐。換言之，研究結果不僅補足了過往專業意理研究對於此記者類型的欠缺，亦補充了既有「參與者」理論分類上的角色內涵。

同時，由於本文歸結出三位從主流媒體出走的受訪者，皆為「參與者」記者類型。離開的理由雖然各有不同，但皆與他們共同抱持的「參與者」意理密切相關。這樣的發現除了顯示出「參與者」意理在主流媒體裡窒礙難行，也彰顯了獨

立媒體的工作環境、以及自僱式的勞動條件，提供「參與型」記者更多實踐理念的空間。然而，目前的新聞傳播教育基本上仍以培養媒體組織記者為目標，教授的傳播者理論（如：專業意理）亦多以媒體工作者為研究對象。本文因而認為，當記者生涯已有更多想像和發展的空間，有志於新聞工作的學生有可能以獨立記者做為未來從業選擇，學校教育因此有必要對此作出因應，將自由新聞工作者的培養涵納至記者的養成教育中。如此一來，新聞系所學生不僅得以擺脫組織雇員的束縛，亦有機會直接以獨立記者的身分開展記者生涯。

而自由新聞工作領域的擴大，除了仰賴學校教育對獨立記者的培養，獨立記者自身也必須有能力維持生活。本文研究的三位受訪者，目前以組合工作的方式賺取收入，尚足以維生；但仍須增加收入來源，以長久維持獨立記者生涯。在本章節第貳部份自由新聞工作維生探討與未來展望上，本文對於獨立記者個人方面的維生建議，已提出部落格營利的發展形式。而研究者欲進一步探究的是，是否有可能透過自由新聞工作者群體力量的集結，共同維護其勞動權益，並進而思考獨立記者勞動困境的解決之道。

以英國為例，英國全國記者協會 National union of Journalists (NUJ) 附設的自由工作者分支部門 (Freelance branch)，可作為台灣獨立記者未來集結爭取權益的參考。NUJ 附設的自由工作者部門 (freelance branch)³¹，針對英國各地、各領域的自由工作者，提供平台和聯繫、互動管道，讓他們在網路成立相關組織，例如 NUJ London Freelance Branch、³²TV Freelancers.....³³皆屬之。藉此討論其遭遇的問題、分享工作資訊，並共同捍衛勞動合約和薪酬的福利保障。換言之，英國的自由新聞工作者組織，是設置於其整體記者組織之下，會員來自於廣播、電視、報紙、雜誌等領域，工作性質包含記者、作家、編輯、攝影、插畫等。是故，與媒體相關的自由工作者，因而能藉此凝聚群體力量，不再是孤軍奮戰。

³¹ 網頁參考：<http://www.nuj.org.uk/innerPagenuj.html?docid=300>

³² 網址為：<http://media.gn.apc.org/lfb/index.html>

³³ 網址為：<http://www.tvfreelancers.org.uk/>

相較於英國，台灣自由工作者的集結組織，除了持續醞釀推動的創作者職業工會之外，目前已成立的紀錄片工會則涵納編導、攝影、剪接等成員，藉由工會的成立解決勞健保的福利保障問題，再以集體力量向資方提出平等的拍片契約、成立接案平台，以保障紀錄片工作者的勞動權益（梁玉芳，2007.7.2）。

因此，本文認為，自由新聞工作者的組織集結是未來的趨勢。雖然三位受訪記者目前的維生方式仍可維持基本開銷，但若從個人接案方式，轉為透過群體力量成立接案平台，如此一來，不僅可增加工作機會，亦能增強自身與資方談判的實力，保障其於不固定雇傭關係中的權益保障。並且，一旦新聞接案工作機會增加，亦可使獨立記者的組合維生形式更為多元，並專注於新聞專業上的發揮。

就江一豪而言，雖然他是以結合新聞與它業（搬家）的方式賺取收入，目前成立的群力搬家，也是其自身對於勞動合作社的理念實踐；但他對未來是否持續以搬家過活的維生規劃，保留改變的空間。所以，若江一豪最後選擇以新聞專業找尋接案工作賺取收入時，接案機會的多寡，關係於他是否能繼續維持其獨立記者生涯。

綜上所述，針對自由新聞工作者的未來生涯發展，本文認為，必須透過個人經營與群體力量雙管齊下，是解決目前收入與工作困境的關鍵。換言之，一方面在個人維生模式上，可透過個人網路媒體的經營，增加收入來源。另一方面亦以群體力量促成接案平台的成立、維護其勞動權益，並爭取新聞自由保障範圍的擴大。而當個人維生模式擴大後，再加上群體力量的號召，進而推動制度或權利上的法律修訂，自由新聞工作者的未來前景才更有長久延續並壯大的可能。

第二節 研究貢獻與限制

壹、研究貢獻

一、台灣自由新聞工作者開創的維生模式

本文對於自由新聞工作者維生方式的探究，採取 Handy 提出的「組合式工作」觀點，分析三位研究對象的維生組合模式。由於 Handy 對於自由工作的看法，乃基於其身處的英國生活脈絡與條件，所醞釀出的概念與未來願景。除了情境脈絡不同，自由工作領域的廣闊，也使得同屬自僱、但性質不同的接案工作者，呈現出相同或相異的勞動面貌。

因此，本文對於自由工作維生模式的貢獻在於，第一，援引 Handy 的論點，觀察台灣與英國，甚至歐美等國在自由工作領域上的發展差異。第二，本文研究對象發展出的不同工作組合模式，除了回應 Handy 對於自僱生活的想像外，三位獨立記者中，朱淑娟與周富美依賴新聞與文字專業接案維生的方式，亦能補充文化勞動於自由工作領域中的勞動面貌，進一步將 Handy 提出的自由工作概念，聚焦於文化勞動的組合工作類型及工作者的勞動處境。而三人對於專業累積、聲譽，與個人品牌的重視，也正是接案工作者面臨的普遍問題。

再者，維生模式如何透過個體戶的集體力量，進一步擴大接案機會與工作組合，是本文對於台灣獨立記者維生模式的建議。一如英美自由新聞工作者目前透過網路平台，以工作媒合的方式，為自由工作者尋找可能的工作機會。台灣尚無以自由工作者為主的求職平台，本文認為這是未來的發展趨勢，不僅能藉此集合自僱工作者的力量，亦可拓展更多接案可能性和維生途徑。另一方面，獨立記者如何藉由網路個人媒體的經營賺取收入、支撐採訪所需，例如設置部落格廣告或向讀者募款，也是自由新聞工作者未來維生的另一種經營模式。

而本文研究的獨立記者以新聞、無關新聞本業、或者文字領域的方式尋找工作機會，藉以維持生活和採訪所需，目前生活也仍不虞匱乏。因此，他們的維生方式不僅可讓其他自由新聞工作者參考學習，也可作為未來研究者，針對文化勞動者於自由工作領域中的參考案例。

二、開啓個人新聞事業的想像

本文以個體戶式的獨立記者作為研究對象，且他們皆擁有從組織雇員到獨立

報導的職涯經歷。本篇研究中，也呈現了三位獨立記者離開媒體後，如何透過個人部落格、擔任公民媒體特約記者，或者是以個人著作來持續關懷社會的實踐作為。尤其是朱淑娟以媒體規格成立的「環境報導」部落格，她對於版面配置、新聞書寫體例的要求，報導環境議題的深入與專業，讓部落格的新聞影響性擴大，也暗示出個人新聞事業具有突圍「主流媒體」，掌握議題發聲權的可能性。

目前多數研究對於個人新聞事業的探討，多以公民記者為主。本文以從主流媒體離職的獨立記者作為研究對象，同時側重於他們仍然持續關懷社會、監督政府的實踐角色。不僅見證其如何以獨立記者的身分展開新生涯，亦為主流媒體記者的未來規劃開啓一條新途徑。並且，如何透過網路媒體平台（個人部落格或公民媒體）作為個人新聞事業的發聲與實踐管道，本文三位獨立記者的維生與經營模式可供參考，本研究結果也能作為台灣草根媒體圖像裡的其中一環。

三、選擇敘事研究方法，更能理解記者專業意理的個人選擇。

本文採用的生命史研究取向與敘事研究方法，透過受訪者的個人敘說，以理解及敘述研究對象的記者職涯圖像，並分析三人在不同工作環境與角色轉換下，各自發展出的因應策略、實踐作為，及其專業意理上的演變。

但是，由於過去對於專業意理的研究大多根據記者報導呈現的方式，並採量化方法以歸類記者不同的意理類型。對此，本文認為，「資訊傳佈者」、「解釋者」與「對立者」的分別除了與報導方式有關，但記者在報導背後的個人理念與目的，是以上這三項專業意理分類中，所未言明的部分。

是故，本文透過記者的自我敘說，著重理解研究對象在報導背後蘊含的個人選擇，以及各自的媒體歷程如何影響其專業意理的內涵與形塑。換言之，雖然本文將三位獨立記者的專業意理演變過程，以上述三項專業意理分類歸納之；但所採用的敘事研究方法，卻更著重理解記者的意理選擇過程，如此也讓三項專業意理跳脫理論分類，進一步展現於三位獨立記者的職涯故事中。

因而，本文從記者個人敘說中，除了分析詮釋他們各自扮演的專業意理角色

外，也彰顯其在角色中的實踐位置，亦即他們面對身分與工作環境的轉換下，如何在專業心態與因應策略展現能動性與主體性，也能藉此彌補過去專業意理研究上的不足。

貳、研究限制

本文採用的生命史研究取向與敘說分析方法，由於依賴研究對象的自我敘說與生涯回溯，在故事真實上猶有疑慮。爲了彌補此一限制，本文透過訪談逐字稿、受訪者個人報導與著作、以及新聞事件報導，交叉審核比對受訪者的說法。並在文中描述受訪者提及事件的客觀背景，儘可能一併呈現事件相關人士的陳述，補足上述的可能缺失。

並且，也因爲本文研究呈現立基於研究對象的主觀經驗陳述，所得結果因此無法似量化研究一樣，推論至其他個案。然而，專業意理的內涵除了只是概念化爲問卷題目，量化分析出結果之外；研究對象的個人生命經驗，其如何面對客觀環境的改變、以及其主觀對此採取的應對方式與態度轉變，是本文採用敘事研究的重要意義。換言之，若只是同樣以問卷分析受訪者的專業意理，再根據先前的理論分類歸納之，並無法看出研究對象在專業意理形塑過程中展現的能動性與主體性。

另一方面，在研究對象背景與工作模式的選取上，由於本文聚焦於從主流媒體離開的記者，如何透過獨立記者的身分展開新生涯，同時亦著重於他們持續監督政府、關懷社會等報導實踐作爲。因此本文挑選研究對象的標準，是以擁有「主流媒體從業背景」與「公民／獨立媒體特約記者身分」的有無，排除了其他同屬自由新聞工作領域，但不符合本文研究旨趣的自由新聞工作者。不過，由於辭職後與主流媒體分道揚鑣，選擇繼續擔任公民／獨立媒體的記者們，必須承受現實經濟上的考驗，再加上此領域的工作樣貌仍有待進一步了解；本研究找尋受訪者時故遭遇不少阻礙，致使研究對象較爲欠缺。

然而，本文採取生命史研究途徑與敘事研究方法，乃著重於對小樣本作集中而深入的探討。雖然有著研究樣本不大的限制，但 Riessman (2008: 156) 認為，精彩和長久的理論，往往是對少數個案進行仔細地觀察，從中累積而發展出來。研究者由於從這三案例的訪談中，得到豐富的個案資料，故加強對訪問對象敘事描述的比重，探索及描述其實踐新聞專業意理的理念選擇。同時並進行個案間的相互比較，以便對這群自由新聞工作領域中的獨特個體做深入研究，使三人的職業生涯面貌更為突出。

此外，必須特別強調的是，由於研究者的研究關懷初衷，是爲了了解——「從主流媒體出走後」的記者，如何在商業領域之外，繼續實踐其新聞理念。」因而捨去自由新聞工作領域的另一群工作者樣貌。但這不意味著本文認為，獨立記者必須擁有主流媒體工作經驗。並且，目前三位受訪記者對於技藝、聲譽資本的仰賴，也非能完全複製到整體自由新聞工作領域中。

因此，爲了更加了解自由新聞工作範疇的整體圖像，本文建議，未來研究可再針對其他不同背景與工作類型的自由新聞工作者，進行比較分析。例如有些是從來沒有主流媒體經驗的部落客，而有些則是主流媒體特約記者。從他們不同工作背景與維生模式的相互比較（如：不同資本、和社會網絡的異同），可了解其有無媒體經驗對於接案工作和專業累積的影響，乃至於拓展出「組合式工作」之外的其他分析可能，並探究其專業角色觀。同時，若能與本文針對獨立記者的研究結果交相參照，亦可讓自由工作領域的維生樣貌更為完整。另一方面，從法律制度的觀點研究自由新聞工作者的勞動問題，也是後續的研究途徑。例如探討勞健保福利政策對非固定雇傭關係者的涵納，並挑戰既定的職業類別，尋求增設自由工作行業的可行性，使其亦擁有組織工會的權利。

最後，本文對於自由新聞工作者專業意理的探究，乃是從研究對象自主流媒體轉往獨立報導的記者職涯歷程中，進行分析詮釋。研究發現，三人同樣抱持的「參與者」意理，在商業媒體中窒礙難行，反倒能在獨立報導中實踐。並且，他

們三人選擇用離職來表彰自身的專業信念（即參與者意理），也顯現出依附於組織的媒體記者角色，不是記者實踐場域的唯一選擇。然而，專業意理研究仍有必要持續探討各種不同工作形式的自由新聞工作者，以了解獨立記者的不同新聞理念。

另一方面，目前仍有一群記者選擇繼續在商業媒體內，在組織營利至上的編採環境中，極力以寫作技巧、主題選取，與主管溝通或者斡旋等方式，匍匐從事其媒體突圍的諸種可能。是故，參與者意理如何在商業媒體中發揮？抱持此種意理的記者，在媒體組織中的心態掙扎與實踐表現為何？他們的作法與本文研究對象相比，也可作為更進一步的細緻對照。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 丁興祥、張慈宜、賴誠斌等譯（2002）。《生命史與心理傳記學—理論與方法的探究》。台北：遠流。（原書 Runyan, W.M.(1982). *Life histories and psychobiography: explorations in theory and metho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王勇智、鄧明宇譯（2008）。《敘說分析》，台北：五南。（原書 Riessman, Catherine K.[1993]. *Narrative Analysis*. Boston : Sage Publications.）
- 王玉樹、張勵德、陳嘉恩（2007 年 9 月 21 日）。〈荒謬 環署開惡例 封殺記者採訪〉，《蘋果日報》。上網日期：2007 年 9 月 21 日，取自 http://1-apple.com.tw/apple/index.cfm?Fuseaction=Article&Sec_ID=5&ShowDate=20070921&NewsType=twapple&Loc=TP&Art_ID=3837253
- 王尹軒（2007 年 8 月 11 日）。〈限制採訪 環保署長權力忒大〉，《工商時報》，B2 版。
- 王健壯（2004 年 12 月 18 日）。〈部落格進城了〉，《中國時報》，第 E7 版。
- 王麗雲（2000）。〈自傳/傳記/生命史在教育研究上的應用〉，中正大學教育研究所編《質的研究方法》，頁 265-306。高雄：麗文文化。
- 卞中佩（2007 年 8 月 11 日）。〈環保署暴力驅離記者 環團：環評戒嚴〉。上網日期：2007 年 8 月 11 日，取自：<http://www.coolcloud.org.tw/node/6630>
- 田志剛（2001）。《新聞記者與消息來源互動關係之研究——以台南市議會記者與議員為例》。中山大學傳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朱淑娟（2009 年 12 月 27 日）。〈部落格的媒體突圍〉。上網日期：2009 年 12 月 28 日，取自 http://shuchuan7.blogspot.com/2009/12/blog-post_28.html
- 朱淑娟（2009 年 10 月 14 日）。〈中科四期二林園區環評初審過關，環評承諾不容打迷糊仗〉。上網日期：2009 年 10 月 14 日，取自 http://shuchuan7.blogspot.com/2009/10/blog-post_4395.html

- 朱淑娟（2009 年 10 月 14 日）。〈環保署中科獻身記〉。上網日期：2009 年 10 月 14 日，取自 http://shuchuan7.blogspot.com/2009/10/blog-post_14.html
- 朱淑娟（2009 年 5 月 4 日）。〈當媒體不再報導真相〉。上網日期：2009 年 5 月 4 日，取自 http://shuchuan7.blogspot.com/2009/05/blog-post_05.html
- 江一豪（2009 年 4 月 29 日）。〈林子文敗訴了！（一）〉。上網日期：2009 年 4 月 29 日，取自 <http://blog.chinatimes.com/laborpower/archive/2009/04/29/399833.html>
- 江一豪（2008 年 12 月）。〈試探媒體的界限 擴大抵抗的可能〉。上網日期：2008 年 12 月 17 日，取自 <http://blog.chinatimes.com/laborpower/archive/2008/12/17/360199.html>
- 江一豪（2008 年 4 月 22 日）。〈那天，我要把自己買回來（上）〉，《苦勞網》。上網日期：2008 年 6 月 13 日，取自 <http://www.coolcloud.org.tw/node/22276>
- 江一豪（2008 年 4 月 9 日）。〈拆了，我還是要回來(上)〉，《苦勞網》。上網日期：2008 年 6 月 6 日，取自 <http://www.coolcloud.org.tw/node/21917>
- 吳芝儀譯（2008）。《敘事研究：閱讀、分析與詮釋》，嘉義：濤石文化。（原書 Lieblich, A., Tuval-Mashiach, R., & Zilber, T. [1998]. *Narrative Research: Reading,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California : Sage Publications.）
- 吳貞儀譯（2006）。《搖滾記: Bob Dylan 自傳》，台北：大塊。（原書 Dylan, Bob.[2005].*Chronicles: Volume One*.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呂美慧（1998）。〈從攻城到圍城：一位邊緣教師之生命史敘說研究〉，《花蓮教育大學學報》，26：77-99。
- 李金銓（主編）（2008）。《文人論政：民國知識份子與報刊》。台北：政大。
- 李金銓（1998）。《大眾傳播理論》。台北：三民書局。
- 李祖舜（2004）。《擺盪在政治與專業之間：報紙政治記者對新聞實務與專業角色的認知》。政治大學新聞學系碩士在職專班論文。
- 李錦章、周富美（2004）。《時間的病》。台北：印書小舖。

何榮幸、黃哲斌(2009 年 1 月 24 日)。<〈公民記者 搬家工江一豪 一人媒體發聲〉，《中國時報》，A6 版。

林昶宏、劉昌德(2009.07)。<〈公部門的影視外包勞動：台灣紀錄片產製與創作者勞動條件調查〉，「2009 年中華傳播學會年會」論文。台灣，新竹。

林靜梅、陳柏諭(2007 年 9 月 17 日)。<〈台東都蘭灣開發案 文化遺址危機〉。上網日期：2009 年 9 月 22 日，取自：<http://www.coolcloud.org.tw/node/46729>

林富美(2006)。<〈新聞商品化對專業勞動產製權力的影響〉，《台灣新聞工作者與藝人：解析市場經濟下的文化勞動》，頁 127-171。台北：秀威。

林富美(2006)。<〈當新聞記者成為名嘴：名聲、專業與勞動商品化的探討〉，《新聞學研究》，88：43-81。

林照真(2006)。<《記者，你為什麼不反叛：調查報導的構想與實現》。台北：天下。

周富美(2007 年 10 月 9 日)。<〈雙十國慶，自由獻上「報魂」大禮！〉。上網日期：2007 年 10 月 9 日，取自 <http://blog.udn.com/choufumei/1287610>

周富美(2007 年 9 月 17 日)。<〈環評大會垂簾聽政？要求落實資訊公開！〉。上網日期：2007 年 9 月 17 日，取自 <http://blog.udn.com/choufumei/1238972>

周富美(2007 年 8 月 13 日)。<〈我有一個夢〉。上網日期：2007 年 8 月 13 日，取自 <http://blog.udn.com/choufumei/1155589>

周富美(2007 年 8 月 10 日)。<〈今天的心情〉。上網日期：2007 年 8 月 10 日，取自 http://blog.udn.com/choufumei/1150380?f_ORDER_BY=ASC&

周富美(2006 年 8 月 31 日)。<〈給家扶博士生的一封信〉。上網日期：2006 年 8 月 31 日，取自
http://city.udn.com/v1/blog/article/article.jsp?uid=choufumei&f_ART_ID=425596

周易正(2003 年 10 月 26 日)。<〈個人日誌，全球發聲——Blog 個人網路誌正在迅速蔓延〉，《中國時報》，第 B3 版。

周旭華譯（1997）。《變動的年代：從不確定中創造新願景》，台北：天下文化。
（原書 Handy, Charles B. [1996]. *Beyond certainty: the changing worlds of organizations*.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Press.）

易禹昕、徐沛然（2009年9月22日）。〈創作者欲組職業工會 勞委會不予增列職業類別〉。上網日期：2009年9月22日，取自：
<http://www.coolcloud.org.tw/node/46729>

施純菁譯（1998）。《組織寓言：韓第給管理者的21個觀點》，台北：天下文化。
（原書 Handy, Charles B. [1990]. *Inside Organizations: 21 Ideas for Managers*. London: BBC Books.）

施致平（1991）。《記者專業意理與新聞製作流程對體育新聞報導之影響》。師範大學體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胡幼慧、姚美華（1996）。〈質性研究的分析與寫成〉，胡幼慧（編），《質性研究——理論、方法與本土女性研究實例》，頁159-170。台北：巨流。

師瓊璐（1999）。《跨越生命的長河——三位國小女性教師的生命史研究》。台東師範學院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文強（2009）。《新聞工作者與媒體組織的互動》。台北：秀威。

張鳳婷（2007）。《傾聽生命之歌——儲備教師的生命敘說》。台東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旻（1999年9月）。〈勁報，夠勁嗎？兩大報「夾殺」 通路大車拚〉，《目擊者雙月刊》，13，31-35。

張之華主編（1999）。《中國新聞事業史文選（公元724年—1995年）》。北京：中國人民大學。

張舒斐（1997）。《電視新聞記者專業價值觀之研究》。銘傳大學傳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思穎（2010年2月）。〈運送友善 公平分享 工人自主——群力搬家合作社發起人江一豪〉。上網日期：2010年2月28日，取自
<http://mepopedia.com/forum/read.php?121,4355>

陳威任（2009 年 12 月 27 日）。〈江一豪遭判拘役 不改抗爭訴求〉，《台灣立報》。
上網日期：2009 年 12 月 27 日，取自
<http://n.yam.com/lihpao/garden/200912/20091227422954.html>

陳順孝（2005 年 11 月）。〈為何寫？寫什麼？怎麼寫？——公民新聞的主題、材料和語言〉。上網日期：2005 年 11 月 19 日，取自：
<http://ashaw.org/2005/11/post.html>

陳俊雄（2005 年 8 月 18 日）。〈東菱電子員工九年駐廠抗爭 落幕〉，《中國時報》，C1 版。

畢恆達（1996）。〈詮釋學與質性研究〉，胡幼慧（編），《質性研究——理論、方法與本土女性研究實例》，頁 27-44。台北：巨流。

康萃婷（2002）。《天人之際：將團少年之生命史研究》。中正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莊雅涵（2009 年 7 月 21 日）。〈自組合作社 公平分享勞動成果——江一豪和他的搬家合夥人〉，《自由時報》。上網日期：2007 年 7 月 21 日，取自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9/new/jul/21/today-work1.html>

梁玉芳（2007 年 7 月 2 日）。〈工會相挺拍紀錄片 何必典當自己〉，《聯合報》，A6 版。

黃順星（2007）。《記者的重量：台灣政治新聞記者的想像與實作 1980—2005》。世新大學新聞研究所博士論文。

黃慧敏（2007 年 10 月 9 日）。〈自由時報發聲明同意辭職 周富美無法接受〉，《中央社》。上網日期：2007 年 10 月 9 日，取自「中央社新聞剪報資料庫」
<http://210.69.89.181/CNA/do/www/ReadDocument?from=fullText&docId=3962426>

黃詩凱（2007 年 3 月）。〈全台第一張「公民記者證」？〉，《目擊者雙月刊》，57：33。

黃月純（2001）。〈生命史研究在成人教育上的應用〉，《成人教育學刊》，5：219-247。

- 黃瑞琴（1991）。質的教育研究方法。台北：心理。
- 黃新生（1990）。《媒介批評：理論與方法》。台北：五南。
- 游明儀（2003）。《新聞談話性節目的內容分析暨其節目中記者專業意理實踐之研究：以新聞駭客 News98 為例》。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程嘉文（2007 年 8 月 11 日）。〈新環委開會 環評告別式相隨〉，《聯合報》，A6 版。
- 楊志弘（1991）。《台灣地區報社總編輯職業角色之研究》。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管嫫媛（2008）。《台灣 1980 年代《自立晚報》社會運動線記者的專業意理形成與實踐》。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熊同鑫（2001）。〈窺、潰、餽：我與生命史研究相遇的心靈起伏〉，《應用心理研究》，12：107-131。
- 潘東傑譯（2002）。《大象與跳蚤：預見組織與個人的未來》，台北：天下遠見。（原書 Handy, Charles B. [2001]. *The elephant and the flea looking backwards to the future*. London : Hutchinson.）
- 鄭宏斌（2007）。《台灣報社地方記者組織溝通滿意、專業性、工作滿意之關聯性研究》。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蔡士敏（2008）。《自立事件核心記者的生命故事》。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蔡瑞君（2002）。《傾聽我們的聲音--三位國小教師的自我生涯歷程敘說分析》。花蓮師範學院多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 劉昌德（2004）。〈科技與文化工作者：網路與相關數位科技對台灣漫畫家勞動過程的影響〉，《傳播管理研究》，4(1)，69-96。
- 蕭蘋（1989）。《環保記者專業意理及其影響因素之研究》。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錢永祥等譯（1991）。《學術與政治：韋伯選集(I)》，台北：遠流。(原書 Weber, Max.[1989] Max Weber's "science as a vocation", Peter Lassman, Irving Velody, and Herminio Martins (Eds.). Boston : Unwin Hyman.)

韓香芸（1992）。《電視新聞從業人員個人特質與專業取向之關聯性研究》。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謝文華（2006 年 11 月 12 日）。〈時間的病 血友愛滋患 抗病血淚史〉，《自由時報》。上網日期：2006 年 11 月 12 日，取自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6/new/nov/12/today-life7.htm>

英文部分

Cohen, B. C. (1963). *The press and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ohen, N. (2008.02.25). Blogger, sans pajamas, rakes muck and a prize. *New York Times*, 26(3), 287-295. Retrieved February 25, 2008, from http://www.nytimes.com/2008/02/25/business/media/25marshall.html?_r=1

Denzin, N. K. (1989). *Interpretive biograph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Egger, R. (1994) . Biographical Research in Adult Education, in the proceedings of *Conference on Life Histories and Learning*. University of Sussex.

Gubrium, J.F. & Holstein, J.A. (1995). Biographical work and new ethnography. in Josselson, R. & Lieblich, A. (Ed.) *Interpreting experience: The narrative study of life*.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Goodson, I. F. (1998). Storying the self: Life politics and the study. In W. F. Pinar (Ed.), *Curriculum: Toward new identities* (pp.3-20).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Inc.

Hitchcock, G. and Hughes, D. (1989). *Research and the teacher: A qualitative introduction to school-based research*. London: Routledge.

Johnstone, John W.C. and Edward J. S. and William W. B. (1976). *The news peopl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Polkinghorne, Donald E.(1995).Narrative configuration in qualitative analy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Studies in Education*,8(1),5-23.
- Ryan, B. (1992). *Making capital from culture: the corporate form of capitalist culture production*.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 Simpson J.A. & Weiner E.S.C. (Eds.). (1989).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2nd ed., Vol. 6, p. 16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tone,I.F. (2000, July) ° A word about myself. Retrieved from <http://www.ifstone.org/biography.php>
- Skinner,B.F. (1953) . *Science and human behavior*. New York: Macmillan.
- Tenore,M.J.(2009, September 29). Journalists leave full-time jobs to work for Texas Tribune, embrace uncertainty.*Poynter Online*.Retrieved September 29, 2009, from <http://www.poynter.org/column.asp?id=101&aid=170570>
- Weaver, D.H. and Wilhoit, G. C. (1986). *The American journalist: A portrait of U.S. news people and their work*.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附錄一：訪談題綱

江一豪採訪題綱

一、專業意理形塑過程：組織雇員

- ◎出生背景、家庭狀況、個性、求學過程、媒體經歷
- ◎什麼時候開始想當記者？最初對記者的想像是什麼？
- ◎是什麼樣的原因讓你開始關注勞工問題和社運改革？
- ◎你的第一份記者工作是開始於《話題》雜誌社，為什麼選這間雜誌社，而不是其他更大規模的媒體？
- ◎可否請您談一下在《話題》雜誌社的工作經歷，尤其對於非新聞科班出生的你，如何適應第一份記者工作（ex.採訪、寫作）？
- ◎又是什麼原因讓你之後決定到《苦勞網》工作？
- ◎您接受《中國時報》採訪時曾說，「當你心中開始出現應該為工人做點事時，覺得當記者是最快的改革方式」。而《苦勞網》正是一個社運媒體，所以當你真的成為一位社運媒體記者後，您認為記者能實踐多大程度的社會改革？
- ◎在《苦勞網》工作期間，為什麼你同時也在康福搬家公司，當記者，也當搬家工人？
- ◎當你真的「下海」體驗「勞動人生」，對於工人、對於勞動的生活愈清楚，對於勞工議題的採訪經歷也愈豐富後，你對於「勞工記者」的看法為何？你覺得自己身為記者的角色可以為工人做些什麼？
- ◎為什麼之後轉往《蘋果日報》工作？以及到「人間異語」的專欄？
- ◎在《蘋果日報》只待了兩個月，您認為《蘋果日報》的工作型態為何，你最不適應的地方是什麼？
- ◎回顧這三年多的媒體記者生涯（ex.是採訪寫稿、工作環境，或同事相處），與自己原先的想像有何不同？

◎那三年多來，印象最深刻的採訪經驗是什麼？是否有哪些採訪報導是自己很滿意的？最大的成就感和挫折感是什麼？

離開

◎何時以及為什麼選擇離開《蘋果日報》？決定辭職的心情為何？有何阻力和助力？整體的新聞環境，以及自己抱持的新聞專業理想，對於您離開的決定有什麼影響？

◎為什麼不願意換到其他媒體工作，或是完全離開媒體；而是選擇用搬家賺取生活所需，以不受雇於主流媒體的身分繼續從事新聞工作？

二、專業意理形塑過程：自由新聞工作者

◎從媒體記者變成一位自由新聞工作者，在實際採訪上和過去有何不同？遭遇哪些新的阻礙？

◎在新聞報導上，您的寫作方針和以前有什麼不同？

◎對於新聞主題的選擇，以及與採訪對象的相處，和以前有什麼不同？

◎你覺得自己在角色上和媒體記者有何不同？作為一位公民記者後，覺得自身在採訪上有什麼轉變？有無印象特別深刻的新聞？

◎您在「傳聲筒」這篇文章裡用「傳聲筒」和「共謀者」一詞來說明自己與採訪對象的關係。您是如何形成這樣的新聞專理念？而當採訪對象的傳聲筒，為他們做點事，這是否意味著，當記者採訪「弱勢」、「勞工」等議題時，您認為記者應該與受訪者站在同一邊？並且無法藉由所謂中立客觀的新聞專業意理，來傳達受訪者的心聲？

◎你從一位報導者的角色，深入參與三鶯部落的事件，甚至後來成為三鶯部落自救會的顧問。拋開一個中立客觀的媒體工作者角色，並親自參與他們的抗爭，這和過去你以旁觀者角色報導新聞有什麼不同？

◎去年你以「人與土地的故事」系列報導入圍第七屆卓越新聞獎，為你帶來最大的肯定是什麼？

營運模式／生存策略

◎您目前以搬家工人的身分賺取生活費用，也擔任《苦勞網》無給職特約記者，並將報導同時放在自己「生活，就是抗爭」的部落格裡。您是否會考慮將目前報導的新聞作為營利之用？您對於部落格廣告的看法為何？

◎您在部落格裡和讀者的互動如何？有希望增加自己部落格的能見度嗎？

◎目前您以搬家工人維生，工作狀況如何？足以維持生活與採訪所需嗎？對未來的維生方式有什麼規劃？

◎若要維持自由新聞工作者的工作生涯，您認為目前最欠缺什麼保障？

◎日前一群文化、藝術工作者向台北市勞工局提出申請，希望能增加「創作者」職業類別，成立「創作者職業工會」。您對創作者職業工會的看法為何？

總結

◎身為一位自由新聞工作者須具備什麼條件？您認為這是記者生涯的另一種選擇嗎？

◎辭職至今，現在如何評價當初辭職的決定？是否會想重新回到媒體工作？無法擁有一份固定薪水的工作，是否會後悔？

◎當初離開主流媒體時所堅持的新聞理念與對記者角色的認知，經過自由新聞工作者的洗禮後，有何改變？

◎一路走來覺得新聞工作對自己生命的意義為何？

朱淑娟訪談題綱

一、專業意理形塑過程：組織雇員

◎出生背景、家庭狀況、個性、求學過程、媒體經歷

◎什麼樣的機緣到《聯合報》工作？一開始擔任的是什麼職務？

◎您是在 36 歲時改行當記者，在這之前有想過要當記者嗎？對於記者最初的想像是什麼？

◎當記者後，您最初接觸的是「電子產業」線，後來才改跑「環境新聞」，可否請您敘述這段路線轉換過程的經歷？以及對您造成的影響？

◎改跑「環境新聞」後，您一做就是 8 年，這 8 年來您對環境新聞如何從陌生到熟稔，可否請您回憶這段過程？

◎您印象最深刻的採訪經驗是什麼？有哪些採訪報導是自己很滿意的？

◎作為一名環保記者，參與公聽會、自救會等採訪現場時，您寫報導時如何拿捏新聞專業與個人情感的平衡？多年來的採訪經驗，面對一場場官方和民眾資訊不對等的公聽會或抗議場面，您和受訪者的關係如何？您對受訪者的態度如何影響妳對記者角色的認知？

◎您如何看待中立客觀的報導？您在部落格寫到「那種各打 50 大板的所謂平衡我也做不出來」，在聯合報任職時是否曾遇過對公平客觀意理兩難的情況？是否曾經想過不願意只是個報導者，而是個參與者？

◎您於今年五月發表《當媒體不再報導真相》這篇文章，也引起廣大的迴響。您在聯合報任職時，是否曾經深受置入性行銷所苦，您當時的感受如何？您認為這對記者造成最大的影響是什麼？

◎您對於「環境記者」的角色看法是什麼？您對新聞專業抱持什麼理想？

◎您如何看待環境新聞在主流媒體裡的定位、受限，與突破？

◎這段媒體工作經驗（ex.採訪寫稿、工作環境，或同事相處），與自己原先的想像有何不同？

◎媒體工作生涯裡，最大的成就感和挫折感是什麼？

離開

◎何時以及為什麼選擇離開《聯合報》？整體的新聞環境，以及自己的新聞專業理想，對於您離開的決定有什麼影響？

◎為何選擇成為自由新聞工作者，而不是其他行業？或是就此離開媒體工作？

◎決定辭職時的心情為何？有何阻力或助力？

二、專業意理形塑過程：自由新聞工作者

◎從媒體記者變成一位自由新聞工作者，在實際採訪上和過去有何不同？遭遇哪些新的阻礙？

◎在新聞報導上，您的寫作方針和過去在《聯合報》時有什麼不同？

◎對於新聞主題的選擇，以及與採訪對象的相處，和以前有什麼不同？

◎在角色上和媒體記者有何不同？這半年多來覺得自己在採訪上有什麼轉變？有無印象特別深刻的新聞？

◎您認為之前在聯合報的工作經歷，累積了哪些歷練和專業，有利於之後自己能夠以自由新聞工作者的身份跑新聞？

維生模式／勞動樣貌

◎辭職後你成立「環境報導」部落格，您如何增加自己部落格的能見度？如何和讀者互動？

◎您入圍第五屆全球華人部落格大獎，你怎麼看待自己的入圍？

◎您將報導的新聞放在自己的部落格裡，也授權台灣環境資訊中心、苦勞網無償使用，在自由報導的前提下，是否會考慮將這些新聞作為營利之用？您對於部落格廣告的看法為何？

◎目前的工作以及收入狀況如何？除了採訪新聞，在網站上發表之外，在維持生計上有什麼其他方式，以支持自己的採訪生活所需？或者對未來的維生方式有任何規劃？

- ◎辭職後在社會福利（勞健保）的保障上，遭遇了哪些困難？
- ◎若要維持自由新聞工作者的工作生涯，您認為目前最欠缺什麼保障？
- ◎日前一群文化、藝術工作者向台北市勞工局提出申請，希望能增加「創作者」職業類別，成立「創作者職業工會」。您對創作者職業工會的看法為何？

總結

- ◎身為一位自由新聞工作者須具備什麼條件？您認為這是記者生涯的另一種選擇嗎？
- ◎辭職至今已經半年多，現在如何評價當初辭職的決定？是否會想重新回到媒體工作？無法擁有一份固定薪水的工作，是否會後悔？
- ◎當初離開主流媒體時所堅持的新聞理念與對記者角色的認知，經過自由新聞工作者的洗禮後，有何改變？
- ◎一路走來覺得新聞工作對自己生命的意義為何？

周富美訪談題綱

一、專業意理形塑過程：組織雇員

- ◎出生背景、家庭狀況、個性、求學過程、媒體經歷
- ◎為什麼當初會念文化大學新聞系？什麼時候開始想當記者，最初對記者的想像是什麼？
- ◎您曾經在文章裡提及，自己在大四畢業前，許下心願想當資深的醫療記者。可否說明這段過程，以及為什麼選定以醫療線為目標？
- ◎大學畢業後您應徵民生報失敗，兩年後被勁報錄取擔任專題記者。想請您說明中間這段過程的經歷，是做了哪些事情讓自己得以順利當上記者。
- ◎您的媒體經歷開始於勁報的專題記者，接著是中天電視台的執行企劃，後來則擔任自由時報記者。這三者之間的轉換過程為何？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轉換？

◎在勁報跑醫療新聞專題時，您第一位採訪的愛滋病患，就是《時間的病》裡面的主角李錦章。因緣際會和他認識後，影響了你自己的人生規劃，包括念研究所、寫血友愛滋相關論文，也寫書拍攝紀錄片。可否請您說明這段認識的過程？

◎作為一位醫療記者，您不只是報導紀錄，也持續關心訪問對象。您和受訪者的關係如何？您認為一個記者的角色能為他們做些什麼？醫療線採訪不免常看到生與死，或者是一些無法立即改變的弱勢團體處境，每次面對或看到這些無力或傷感的畫面，您如何調適自己的心情？

◎您如何看待中立客觀的報導？是否曾想過不願意只是個報導者，而是社福或社運團體的一員，成為一個參與者？

離開

◎2007 年八月、九月發生環保署抗議事件那時，您才改跑環保署不久，為什麼會從醫療轉到環境線？還沒發生那件事之前，改跑環保署是否有讓你不適應的地方？

◎如果方便的話，可否請您簡單敘述那兩次在環保署發生的事件經過？

◎那次事件使報社將您轉調內勤，然後妳遞辭呈，報社從不承認收到您的辭呈，再到批准。兩年多後，您怎麼回頭看這段過程？包括你怎麼看待記者跟社運團體走太近這個質疑、自己先提辭呈的做法，以及記者勞動權的爭取。

◎您當時離開自由時報的心情為何？為什麼不願意換到其他媒體工作，或是完全離開媒體？

◎這段媒體工作經驗（ex.採訪寫稿、工作環境，或同事相處），與自己原先的想像有何不同？印象最深刻的採訪經驗是什麼？有哪些採訪報導是自己很滿意的？最大的成就感和挫折感是什麼？

二、專業意理形塑過程：自由新聞工作者

◎離開自由時報後，您目前是苦勞網特約記者，您認為自己在採訪、寫作，與訪問對象的關係，和從前有什麼不同？

◎卸下主流媒體記者的職務後，參與樂生、公督盟等社運，這和從前採訪社運議題有何不同？

◎以獨立記者的身分採訪後，有無印象特別深刻的採訪經歷？

◎這兩年多來您在苦勞網寫新聞、參與蔡崇隆《油症—與毒共存》的文字撰寫，擔任記協的常務執行委員，公民監督國會聯盟的公共事務部主任，以及卓越新聞獎基金會的記者。而《時間的病》也在這段期間翻譯為英文版，紀錄片也剪輯完成、公開放映。您如何看待自己辭職後的這段經歷？

維生模式／勞動樣貌

◎目前的維生方式為何？工作狀況不再擁有一個固定的雇傭關係和工資之後，您遭遇了哪些困境？辭職後在社會福利（勞健保）的保障上，遭遇了哪些困難？

◎若要維持自由新聞工作者的工作生涯，您認為目前最欠缺什麼保障？

◎日前一群文化、藝術工作者向台北市勞工局提出申請，希望能增加「創作者」職業類別，成立「創作者職業工會」。您對創作者職業工會的看法為何？

◎您的部落格是在什麼時候成立，是否考慮將自己的部落格轉型，放入自己獨立報導的新聞，或者是部落格廣告的經營形式？

總結

◎身為一位自由新聞工作者須具備什麼條件？您認為這是記者生涯的另一種選擇嗎？

◎是否會想重新回到媒體工作？無法擁有一份固定薪水的工作，是否會後悔？

◎當初離開主流媒體時所堅持的新聞理念與對記者角色的認知，經過這兩年作為獨立記者的經驗與角色轉換後，有何改變？

◎一路走來覺得新聞工作對自己生命的意義為何？

附錄二：訪談時間地點

受訪者	訪談日期	訪談地點	訪談長度
江一豪	2009.12.15	捷運麟光站附近 麥當勞	一小時二十五分
	2009.12.17	捷運麟光站附近 公園	一小時五分
朱淑娟	2009.12.18	捷運忠孝敦化站 附近星巴克	兩小時十二分
周富美	2010.01.17	公館瑪莎胡同咖 啡館	兩小時十七分



附錄三：受訪者大事紀

江一豪大事紀

時間	社會背景	記者個人生命經歷	備註（重大紀事）
1947	二二八事件		
(五〇年代白色恐怖)			
1960	九月雷震案：自由主義、 組黨運動受挫		
1966			
1969	中央民意代表選舉		
1970	台獨聯盟成立		
1971	十月退出聯合國		
1972			
1977	鄉土文學論戰 十一月中壢事件		
1978	台美斷交		
1979	六月八十年代雜誌 （其後二十三種黨外雜誌，統獨兩大系統） 八月美麗島雜誌 十二月美麗島事件	出生	3 月雷震過世 8 月《八十年代》 刊載〈雷震・胡 適與中國民主黨 ——記近代台灣 民主運動的一段 歷史並悼念雷震 先生〉
1980	二月林宅血案、 三月美麗島軍法大審		
1982	《婦女新知》雜誌社成立		
1983	黨外編聯會成立（黨外雜誌）		
1984	黨外公政會 十月江南案 十一月美洲中時停刊		
1985	二月十信事件		

	六月民眾日報被處分（李旺台） 公害環保風潮楊憲宏		
1986	機場事件 九月民進黨成立		
1987	解嚴，開放大陸探親 《新新聞》創刊 中時工會事件		
1988	解除報禁、聯晚創刊 赴大陸採訪案宣判無罪 五二〇農運→楊渡		
1989	首都早報創刊（1990年停刊） 太平洋日報、環球日報曇花一現		
1990	野百合學運 (1990.3.16~3.22)		
1991	徐瑞希事件		
1992	二月退報運動，五月立法院通過刑法一百條修正案		
1993	自由時報賓士黃金促銷成功		
1994	地下電台風潮、 自立事件、 九〇一遊行	畢業於芳和國中	
1995	記協 三退聯盟成立 民視取得第四家無線電視台		
1997		畢業於復興高中	《目擊者》雙月刊創刊
1998			
1999	自立早報停刊 九二一地震		
2000	三月政黨輪替		
2001	六月中時裁中南編 自立晚報停刊	畢業於中央大學中文系，同年入伍。	

2002			
2003	五月蘋果日報在台發行	退伍 《話題雜誌》記者	無盟改組，成立 「媒體改造學社」
2004			12/24 中時報系集團收購中視、中廣、中影等「三中」，加上中天，成為跨媒體集團
2005	中晚停刊	《苦勞網》記者	12 月 WTO 部長級會議於香港召開，世界各地的民間、社運各團體在香港集結抗議。
2006	華視公共化、民生報停刊	康福搬家工人	
2007	趙少康入主中廣，中廣音樂網 2 月停播	《蘋果日報》記者 與友人合創「群力搬家」，專職搬家工人	
2008	中時裁員/十一月易主	2 月 首度採訪台北縣三鶯部落，當時三鶯部落遭到縣府強制拆遷 11 月 以三鶯部落自救會顧問的身分，帶領族人一同對外表達反迫遷的理念 12 月 以「人與土地的故事」系列報導入圍第七屆卓越新聞獎	
2009		1 月 第一屆三鶯部落抗爭尾牙 2 月 率同三鶯居民，為即將被拆遷的「撒烏瓦知部落」走上街頭抗議	

		12 月 由於「撒烏瓦知部落」的抗議行動違反集遊法，江一豪被法院以「首謀非法集會不解散」罪，被判拘役 10 天，得易科新台幣 1 萬元。	
2010		1 月 第二屆三鶯部落抗爭尾牙	

朱淑娟大事紀

時間	社會背景	記者個人生命經歷	備註（重大紀事）
1947	二二八事件		
(五0年代白色恐怖)			
1960	九月雷震案：自由主義、組黨運動受挫		
1962		出生	
1969	中央民意代表選舉		
1970	台獨聯盟成立		
1971	十月退出聯合國		
1972			
1977	鄉土文學論戰 十一月中壢事件		
1978	台美斷交		
1979	六月八十年代雜誌 （其後二十三種黨外雜誌，統獨兩大系統） 八月美麗島雜誌 十二月美麗島事件		3 月雷震過世 8 月《八十年代》刊載〈雷震・胡適與中國民主黨——記近代台灣民主運動的一段歷史並悼念雷震先生〉
1980	二月林宅血案、 三月美麗島軍法大審	畢業於十信工商	
1982	《婦女新知》雜誌社成		

	立		
1983	黨外編聯會成立（黨外雜誌）	畢業於台北商專二專夜間部會計統計科	
1984	黨外公政會 十月江南案 十一月美洲中時停刊		
1985	二月十信事件 六月民眾日報被處分（李旺台） 公害環保風潮楊憲宏		
1986	機場事件 九月民進黨成立	7 月 畢業於台灣科技大學 8 月 《經濟日報》工商記者	
1987	解嚴，開放大陸探親 《新新聞》創刊 中時工會事件		
1988	解除報禁、聯晚創刊 赴大陸採訪案宣判無罪 五二〇農運→楊渡	在《聯晚》任職於程式設計	
1989	首都早報創刊（1990 年停刊） 太平洋日報、環球日報曇花一現		
1990	野百合學運 (1990.3.16~3.22)		
1991	徐瑞希事件		
1992	二月退報運動，五月立法院通過刑法一百條修正案		
1993	自由時報賓士黃金促銷成功		
1994	地下電台風潮、 自立事件、 九〇一遊行	從美返台，回到《聯晚》 後改任行銷企劃	
1995	記協 三退聯盟成立 民視取得第四家無線電視台		

1997			《目擊者》雙月刊 創刊
1998		《聯合報》電子資訊記者	
1999	自立早報停刊 九二一地震		
2000	三月政黨輪替		
2001	六月中時裁中南編 自立晚報停刊	12 月 改跑環保線	
2002	阿瑪斯號事件		
2003	五月蘋果日報在台發行		無盟改組，成立 「媒體改造學社」
2004			12/24 中時報系集團收購中視、中廣、中影等「三中」，加上中天，成為跨媒體集團
2005	中晚停刊		12 月 WTO 部長級會議於香港召開，世界各地的民間、社運各團體在香港集結抗議。
2006	華視公共化、 民生報停刊		
2007	趙少康入主中廣，中廣音樂網 2 月停播		
2008	中時裁員/十一月易主	以「洗衣精補充包竟比桶裝貴」奪得「消費者權益報導獎」佳作	
2009		2 月 辭職 4 月 開設「環境報導」部落格 5 月 「當媒體不再報導真相」一文獲廣大迴響 12 月 獲頒「2009 全球華文部落格大獎——年度最佳訊息觀點」	

2010			
------	--	--	--

周富美大事紀

時間	社會背景	記者個人生命經歷	備註（重大紀事）
1947	二二八事件		
（五0年代白色恐怖）			
1960	九月雷震案：自由主義、 組黨運動受挫		
1969	中央民意代表選舉		
1970	台獨聯盟成立		
1971	十月退出聯合國		
1973		出生	
1977	鄉土文學論戰 十一月中壢事件		
1978	台美斷交		
1979	六月八十年代雜誌 （其後二十三種黨外雜誌，統獨兩大系統） 八月美麗島雜誌 十二月美麗島事件		3 月雷震過世 8 月《八十年代》 刊載〈雷震・胡 適與中國民主黨 ——記近代台灣 民主運動的一段 歷史並悼念雷震 先生〉
1980	二月林宅血案、 三月美麗島軍法大審		
1982	《婦女新知》雜誌社成立		
1983	黨外編聯會成立（黨外雜誌）		
1984	黨外公政會 十月江南案 十一月美洲中時停刊		
1985	二月十信事件 六月民眾日報被處分（李旺台）		

	公害環保風潮楊憲宏		
1986	機場事件 九月民進黨成立		
1987	解嚴，開放大陸探親 《新新聞》創刊 中時工會事件		
1988	解除報禁、聯晚創刊 赴大陸採訪案宣判無罪 五二〇農運→楊渡		
1989	首都早報創刊（1990 年停刊） 太平洋日報、環球日報曇花一現		
1990	野百合學運 (1990.3.16~3.22)		
1991	徐瑞希事件		
1992	二月退報運動，五月立法院通過刑法一百條修正案		
1993	自由時報賓士黃金促銷成功	畢業於松山商職國貿科	
1994	地下電台風潮、 自立事件、 九〇一遊行		
1995	記協 三退聯盟成立 民視取得第四家無線電視台		
1997		畢業於文化大學新聞系 應徵《民生報》失敗	《目擊者》雙月刊 創刊
1998			
1999	自立早報停刊 九二一地震	《勁報》專題記者 初識李錦章	
2000	三月政黨輪替	中天電視台執行企劃	
2001	六月中時裁中南編 自立晚報停刊	考取北醫醫學人文所	
2002		《自由時報》醫藥記者	
2003	五月蘋果日報在台發行		無盟改組，成立

			「媒體改造學社」
2004		1 月 李錦章過世 10 月《時間的病》出版	12/24 中時報系集團收購中視、中廣、中影等「三中」，加上中天，成為跨媒體集團
2005	中晚停刊	論文完成—《台灣地區血友病患與血友愛滋病患生病經驗》	12 月 WTO 部長級會議於香港召開，世界各地的民間、社運各團體在香港集結抗議。
2006	華視公共化、民生報停刊		
2007	趙少康入主中廣，中廣音樂網 2 月停播	8/10 第一次環評衝突 9/17 第二次環評衝突 9/19 環署發函給報社及記協，禁止她再入內採訪 9/25 轉調內勤 9/27 寄辭呈 10/9 《自由》批准辭呈 12/1《時間的病》紀錄片首映	
2008	中時裁員/十一月易主	《時間的病》英文版	
2009			
2010			